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20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二十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封面题字：舒 同

封面设计：马少展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二十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5.2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60,000册

书号11310·27 定价 1.45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文 献

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聂荣臻(1)

回 忆 录

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肖劲光(27)

忆长征中的红军干部团……宋任穷(64)

塞北抗日回顾……高克林(99)

港九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战斗历程……张子燮(117)

专 题 资 料

英明的战略决策, 卓越的指挥艺术……罗焕章(143)

——抗战初期中央军委指挥八路军战略展开

晋察冀边区土地政策的发展和实施效果……成汉昌(160)

日 记 摘 登

陈中日记(摘录)……《陈中日记》编辑组编(186)

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三九年一月)

聂荣臻

(一) 目前中日战争形势的估计与任务

A、中日战争的三种论者

(1)速胜论——急躁病，忽视敌我力量，现已放弃了。

(2)亡国论——汪精卫反共逃跑，帮助敌人，为其阴谋工具。

(3)持久胜敌论——目前一般的一致观点是厉行这种主张，目前会用持久战是不生问题的。

B、中日战争的三个阶段

今天处于第一阶段至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中，我尚未能停止敌之进攻，未入相持阶段。敌之战略，初为速决，

*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是晋察冀边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于1939年1月成立，并召开全边区党代表大会。

忽视我国人民力量，并企图威胁我国政府投降，但敌今天出乎意外地失败了。

在我持久抗战之下，敌亦被迫而采取长期战，处被动地位，但敌人仍无时无刻不想迅速结束战争。

过去南京、徐州失守后，敌均谋结束战争；后来事实使他们失望，故现敌信心已不高。据日俘虏日记中皆称武汉失守战争亦不会停止，而武汉失陷时敌之庆祝亦不如前之热烈。

因而敌人极力从我国内部找汉奸，谋在政治上结束战争。但国共两党、全体人民都一致反对妥协、投降。敌在政治上阴谋已不得逞，故目前敌仍将继续战略进攻，尽其残余力量，利用国际矛盾。估计敌今后的进攻有限度。

我持久战，敌欲应付，先要破坏我国际外援，故集中力量谋切断安南、西北陆路之交通线，并谋打通粤汉，向海南岛进攻。运输力量最便利而大者为海运，故敌近集中力量于此。

国际形势：

英国动摇不定，企图维持现状，恐惧战争，多方感受威胁，对远东问题不积极；美国军事准备须一九四〇年才能完成，力量不足；法对中欧、东欧问题多无暇顾及，不得不忍受目前苦恼。故敌可能乘国际弱点，南断我安南之交通线。敌前曾一度以兵舰欲公开驶入安南，虽遭法国制止，但敌之阴谋仍未停止。同时敌对西北进攻兵力增加日多，对粤汉路亦将继续进攻，或局部进攻，或全面同进，因敌尚有余力。

但敌对南方海口进攻，主要靠海军，对西北、粤汉主要靠陆军。敌欲实现其计划，则必须用庞大兵力，然敌兵力现已将用至极大限度，四肢伸直，已无多余力了，故可能于此时转入相持局面。

同时敌在继续进攻中亦可能遭受挫折。当敌于深入时，在进攻路上，其距离必长，则空隙必增多，而便利我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敌挫折亦可能引起相持局面的到来。

另一方面，敌可能控制华中，集中兵力以向西北。惟一般说来，敌一年来所表现的兵力不够，对长距离之西北及粤汉仅点、线控制即须大兵力，此其困难也。故相持阶段实可能迅速到来。

今后在相持阶段中，敌难在战略上达其目的，但欲建立广大地区之统治，从点、线向面运动，作“面之占领”，或完成进攻计划后，集中兵力逐渐部分肃清。以其交通工具之优点，虽此有较大可能，但困难之处实际甚大。首先，伪军伪政权难以建立，欲靠其自己兵力，事实上又不可能。且敌无大的军事中心，我游击战争又广泛开展，敌仍难于制胜。

故我目前任务在停止敌之进攻，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无论敌以何种方式巩固、扩大其占领区及统治，但此斗争必残酷艰苦。此时我主要以游击战与运动战消耗敌人，准备我之力量反攻，而游击战更为重要。游击战对正规战为辅助，战略上处次要地位，不能解决战争，最后仍须靠正规机械兵团决战。惟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尤其是第二阶

段，游击战实处更重要战略地位。最近蒋委员长对游击战的划分与领导、配备皆表示其注意。盖亦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反攻取得胜利。故第二阶段，游击战实处主要地位。

(二) 坚持华北抗战与八路军

A、坚持华北抗战意义

我已坚持华北抗战十几个个月了。一年前，这一坚持华北抗战的口号，许多人尚无信心；今天由于事实的证明，人们都已有了信心。

我党及八路军对华北始终坚决坚持抗战，自参战以来皆如此。首先我即决定巩固山西阵地，以坚持华北抗战，虽在部署上最初大家信心仍不高。

但华北实极重要，如不能坚持下去，则持久战形势将随之而变化。即保卫西北，如无华北之坚持抗战，亦不可能。因为事实上：

(1) 由于坚持华北抗战，牵制了敌五——十师团的兵力。

(2) 使敌无力巩固其后方与阵地以前进，只占据着点、线，冒险向前。

(3) 使敌不能利用华北财源以进攻华中、华南。敌在城市中只能抢去马桶、烂铁等，别无所获。敌在华北财政上实陷入万分困难。

(4) 使敌不能扩大其伪组织，敌在名义上能统治的也只有五十二县。

(5)使敌不能组织大量伪军,可能为伪军的均不敢去,以至于不肯去。兼之各地之伪军动摇、反正,敌对伪军亦无信心了。

(6)使华北广大土地仍属我版图。

(7)我却利用了华北大量人力、财力、物力于抗战。过去国内怕直、鲁、豫为敌人所占,我将无可出之兵,实则我仍组织了大量游击队。华北人力仍未用尽,仍可大量动员。

B、由于敌点、线之占领而被划分了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势

晋西北、冀鲁豫、晋东南、晋察冀现已成为许多抗日根据地,而华南、华中亦有,今后更将继续发展新的。

这些区域,各自不同。晋西北有晋绥军、八路军、东北军,政权属山西省府。

晋西南有八路军、晋绥军、中央军,政权亦属山西省府。

冀鲁豫有八路军、东北军、中央军,政权属原有各省府。

晋察冀有晋绥军、八路军,政权属边区政府。

这些游击区中无一无八路军,且皆由八路军开辟、支持而成,在政治上,一般都还进步。(山西)虽有摩擦,但现在是日渐减少。冀鲁豫等地顽固分子很多,摩擦亦相当多。今后敌后之根据地愈扩大,摩擦当愈增加,但由于今后战争的残酷,亦可能减少,这是不平衡的。即以此区为例,各分区情形亦不平衡。但我边区由国民政府批准,坚

持与敌作战，将继续由敌人手中夺回更广大土地；将来收复故国，各省仍归各省旧辖，绝不能割据。若为发财升官，则必使根据地坍台。此区人民负担较其他区域为轻。我区在坚持华北抗战中有极重要意义，不容许旧的坏制度继续发生。现蒋委座已派大员到华北处理摩擦问题，将有分解。我们工作实无一不可对人言者，我区诚是华北抗战的中心。

以战绩言，我八路军自平型关以后，大小千余战，此区亦数百战，最积极负责于抗战，敌之损失可知。

出征来第一次之平型关战斗，在世界上都闻名；粉碎敌人九路围攻等，使全国军队战术有了改革。我们始终是以自己战斗的实例为人先导。

而我军区对敌后之游击战争活动诱导作用尤为重要，以实际行动为全国借鉴。所谓由整化零等游击战术实并不易(由零可化为无)，如甚易，则八路已不值钱了。敌人把我游击战术作研究而谋歼灭我之对策，但是机械的。游击战术实不易把握。

在政治上，八路军为中共路线坚决执行者，团结互助精神使不仅主张而且行动上取得了友党友军的敬服而得成效。

(三) 敌继续战略进攻与华北抗战

敌进攻形势有三种可能

(1) 西北进攻必然而且已具体化了。“扫荡”华北，巩

固后方，这是敌一贯不放松的政策。以此可减少其进攻西北时后方之威胁，因我之威胁力现已较前更增大了。

(2) 驱逐我远离交通线。这一可能在晋东南、冀中现正进行。但敌必须用大兵力来控制交通线两旁之城镇，这是敌之难处。

(3) 占领许多城市，不但军事而且政治上亦以之为发号施令之中心和据点，以便深入进攻。

但无论如何，敌必对我有所动作，以备向西北进攻，对冀中进攻即其计划之一部分。将来在相持阶段中，敌必谋肃清华北，虽未必以主力来攻，但必另抽调部分大兵力来“扫荡”，故今后环境必将更残酷。我们必须坚持这一阶段，以备转入反攻阶段。巩固华北以坚持下去，将来必最有利。但这一坚持是最艰苦的：

- ① 根据地会分裂成小块；
- ② 地区会缩小，点、线会增多；
- ③ 要拉来拉去的苦战。

(四) 晋察冀边区在抗战中的地位

A、晋察冀边区的形成，一般地与其他地区一样，是在战争中形成的。

但主要的，我军出征以前即抱定决心，即使雁门关失守，仍要依太行山脉而建立根据地，支持抗战，有计划地留下干部队伍，估计到此区可能发展形势，规定了任务，故有决心与信心。

此区的特点是：

(1) 处于敌之后方，且是深远的后方；

(2) 是国防的最前线；

(3) 处三省交通要道，政治上复杂，如晋东北、冀中、察南皆然；

(4) 为华北铁道网的中心，华北除道清路^①外，我军区皆能连及；

(5) 紧邻华北各主要城市，如平、津、太、石、保等。

这说明了此区之特殊困难环境，但同时亦表示其特殊重要性。它又成为其他根据地之枢纽：与晋西北隔同蒲配合；与晋东南隔正太夹攻配合；与冀中隔平汉而配合；与冀东则隔北宁路与之配合。如无此种配合，则冀中、冀东之突出必成孤立。以此区言，四面有敌人，但同时四面亦皆有配合。

在政权上说，亦曾为敌后全国唯一统一战线的政府；在敌后创根据地言，此且为先导者，其他区域皆以此为模范；对其他根据地言，此区亦不啻为统一战线实验区，无论在政权、政策等各方面皆如是。

B、边区是抗日根据地

(1) 何谓根据地？依靠地区之人力、物力以支持抗战者。

根据地随地形而有各种分别。

^① 道清路在河南境内，由道口经新乡至清化镇。

地形为根据地造成之一条件，但基本上是人条件——建立在广大人力的基础上。最具体的是靠正确政策以团结人力，这即统一战线的政策，成为决定的因素。

根据地的重要，是无庸解释的，八路军同志对此问题了解最为深刻。

(2)根据地的建立有必要，有可能，但也不易。如：

- ①在敌占得长久、统治力较巩固处建立较难；
- ②友军友党共占处，因政治上不一致等，亦不易。

(3)这一边区抗日根据地建立原因

客观上，有许多便利的条件：

①政权旧的瓦解，新的，我与敌要争着接替，而敌又未巩固；

②失望、悲观、顽固分子的逃走，故我能以新姿态出现；

③军队的组织，由于大战场可以打扫，收得了武器，并得到了退军残破棉衣穿上；

主观上：

①坚持统一战线，以抗日之鲜明旗帜组织军队、民众；

②同志们的努力、艰苦工作，找枪，组织武装及群众；

③一开始就坚决以根据地的目标布置工作，虽然很困难，但这决定了我们主观上努力的方向与工作态度和计划。

(4)边区政权与工作

①边区政府乃统一战线政权，许多人的误解都是不对的：

①以为系八路军的，故一方面也重视，一方面也冷淡。

②以为是共产党的，如外国人买邮花，这固然是还未能了解真相，但这总是好意的。敌伪则以为五台乃共产党大本营。

③阎主任说是他的，但我们不争论。我们说它是统一战线的，属第二战区领导，执行统一战线政策。

②在敌后方政权的重要。这对建立根据地甚重要，是抗战的重要武器，我们同志有不正确了解：

①苏维埃生活过来的同志，知道政权重要，但觉不如苏维埃好，带消极态度；

②没过政权生活者，被政府压迫的人，仍有觉得政权不好的观念，有成见；

③以为今天天下属我们，对统一战线把握不紧。

这些都是不会好好运用政权武器的。实则政权有重要意义：

①与汉奸政权尖锐对立，即在游击区也有游击政权；

②维系人民心理，团结在中国政府之下，保持社会安宁，人民交粮上税，都向我政府来；

③成为抗战政策实施者；

④成为合法的有力武器。

(5) 抗战与财政

财政是普遍的困难问题，不但边区，而且全国。此地

当家，尤其不易。当初合理负担的执行并不彻底，对统一战线又不好。然在开始也解决了一些问题，唯非正确解决财政办法，故要坚决执行“统筹统支”政策。至于打汉奸的办法，有人妄想以此解决财政问题，则更危险，使敌区人民与我尖锐对立，助敌人建立对我的封锁线。更有企图多发钞票以解决财政，则更为错误。我之政策是：

- ① 整理必要税收（田赋）；
- ② 政府发行公债和发动缴公粮。

这是正规的政策，把握了统一战线，应帮助政府完成之。虽然我有此项办法，但我财政仍属困难，尤其是在敌进攻之下。

（6）经济政策

去年春耕时垦了荒地，少种棉花，增加了粮食。统制了贸易，虽裕民公司办理未尽善，但也有作用。减租减息改善了民生。

今后应当：

- ① 加紧手工业生产；
- ② 注意家畜经济。

（7）货币问题

敌欲以发伪钞来统制华北，我应坚决肃清伪钞，改良发钞技术，以巩固我之金融。

（8）边区各级政府人员及其机构

人员积极负责，一般尚称廉洁，耐艰苦，有游击决心，相当民主化。但民主生活尚差，应加紧反贪污斗争，实行区村民主运动。

(9) 自卫队工作

为普遍基本的人民武装，代替了旧日的公安局、警察局，负起了捍卫边区的作用。但在组织训练、执行任务上，仍患不科学的形式主义。干部等都不行，在敌进攻紧急时随坚壁清野而溜之大吉。我们今后应加紧整顿和改进，使为巩固我后方最可靠的力量，为游击部队之后备军，并为征兵制的基础。

(10) 文化教育

文化事业一年来相当发达，报纸、刊物有五十二种之多。报馆在战争中没有被打坍，报纸在群众中有威信。现文化人从后方源源而来，今后有大发展前途。但组织性差，普遍深入不够，发行工作更差，这都是组织工作上的缺点。今后应以有利条件来广泛、深入地开展文化教育工作。

(11) 党的工作

一般的有很多成绩，但晋东北至今还较差。冀西的发展很有基础，冀中也有大的发展。但党的发展还落于客观需要之后，且不普遍，不平衡，有些可以大发展的，实际上却很不够。

同时，组织生活与教育都很缺乏。农民的家庭保守观念非常之浓厚，调动不易，还没有无产阶级化，更说不上无产阶级的先锋了。一般党的常识许多支部都还不了解，就是党的工作较好的地区也是如此。虽然很多地方党与边区创立历史一样长，但很多地方总是不能建立，这是领导恶劣的结果。如晋东北区，党的落后或谓系“山西人落后”，但此语不通，长期工作的结果是应该能够开展的，“民气”

等条件是不足以为工作不发展的理由的，主要的是由于主观方面的原因。有些同志性如牛皮，总打不起劲来，对政权、群众等各方面关系缺乏正确的见解。如对政权态度，总认为政权是不好的东西，因而放松其工作。我们今天有民众运动等条件，可以改善政权各方面工作，冲破一切障碍。主要的是我们没有去做，并不是真有什么大障碍而不能工作，完全是由于群众运动领导的不够。故在敌进攻中，晋东北表现出坍台现象。

一年多来，在党的干部方面，提拔了很大的数量，而一般从党校出去的同志都能起模范作用。

(12) 民运工作

一年来已打下初步基础，并建立了各级民运机关。如工、农、妇、青各种群众组织均已树立基础，对抗日部队的动员与帮助上，在财政经济动员上，收到很大成绩。它保证了政府许多工作与政策的执行。妇女们对于缝纫等工作，都是很可观的。

但今日无论哪一种群众工作上，基础都还不很巩固，政治、组织生活上也差，故整个群众运动不能表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冀中似乎朝气较强，但冀西各地朝气都差。

因此，目前必须抓紧教育与组织生活，同时许多必要的群众斗争必须积极发动，在抗日之下，抓紧各种正当的斗争，开展群众运动，保证人民已得的利益，与许多顽固势力作斗争。减租减息有些地方不彻底实行，应发动斗争，保证民生的改善。对区村政权必须发动普选运动，刷洗顽

固分子，开展民主运动，帮助政府保证民主权利。

(13) 青年工作

边区青年并不落后，落后的是青年工作。部队中青年占半数以上，青年踊跃参加部队，广大青年知识分子都到部队中去。但乡村中还有极大量的农村青年尚未能很好组织起来。目前党已经具体规定了青年工作的方针。在我们边区，目前最主要的是青抗先的组织，它在地方上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因它是半武装的英勇的青年群众组织，在政治上、文化上、军事上都会迅速进步。这又是动员青年上前线最好的方式。只就动员广大青年上前线这一点说，青抗先已是重要的工作。十八至二十五岁的青年，就北方人说，体格已强，易接受教育，且易成干部。同时即以青年组织工作言，亦应以抗先队为中心，以最活跃的形式把广大青年组织起来。目前可能在抗大分校中建立抗先干部训练班。另一方面，首先我们要从部队中抽出一些青年干部，在各分区抽出以从事组织地方抗先队的工作。

目前日本帝国主义正与我争夺青年，到处搜罗、逮捕青年送回它国内，并对儿童同样施行麻醉；故我们应与敌人争夺青年。青年工作最易进一步开展，目前工作不佳，乃主观努力的不够。

(五) 八路军在边区

八路军是边区的创造者，无八路军则无边区：

(1) 在边区创造了党，发展了党。

(2)开展了群众运动。

(3)扩大了八路军本身。在群众运动中建立了许多新部队，这是特点。这里说明了它不仅扩大，而且扩大的都是好的质量。

(4)造就了许多干部，后方送来些，自己培养了许多，基本上是解决了干部问题。

(5)坚决执行党的路线。

(6)一年来在军事上的收获。一周年纪念时，统计有四三四次（大小）战斗，敌伤亡达一三九九〇名。这表示我对战争之负责与积极活动。在去年青纱帐时期，我不断袭击敌人，予敌重大打击，故有此次大围攻。此次战斗合计以前不下七百余次。

(7)我军区过去一贯为配合主力而战，这是战略上非常重要的：①敌初下太原时，受了我们的牵制与打击；②我配合了晋东南，粉碎了敌对晋东南九路围攻；③我“二九”平汉出击，配合了正规主力军的津浦大战；④保卫徐州战斗中，我亦给敌兵力相当大的牵制；⑤保卫武汉中，我们发动了“七七”的总进攻，敌主要交通干线被我大肆破坏，更重要的是挺进冀东。

我们的收获还不在简单的数目字上，而是在战略的意义上，为着战略的需要，我们坚决行动。今后我们要更有计划地服从战略任务而作战。

(8)粉碎了伪组织，争取了伪军。七千余县的版图皆从伪组织手中夺回。伪军大量反正，可能当汉奸的部队不敢当伪军。这都是很大的收获。

(9)保持了广大的富源。

(10)在国际上收到很大影响与声誉。如卡尔逊氏、两个英国工党党员来此后印象极佳。

(11)在国内更有重大影响，並告诉了广大国人在敌后坚持游击战的可能与重要。

(六)边区基本粉碎了敌之围攻及其经验

敌围攻边区已多次，都是局部的企图予我打击，占领个别城市。此次围攻与前不同，敌将进攻军区意义与武汉相比，企图“扫荡”边区，在军事上动员了很大力量，但结果不仅未达目的，且敌反受大打击，官员损失、伤亡达七千余人（路透社估计），阎主任电称为万余人。虽敌占得数据点，且不会放弃，因敌配合其进攻大西北中，必将继续进攻冀中，晋东南（中条山），各地亦正相持战斗。

此次敌深入我区有五联队，周围兵力合计约五、六万人。先占涞源、五台、曲阳、灵丘为据点。当时我估计敌将由东西合击，裂我为南北两块，进入山地“清剿”。

但我有计划地最初抗退，继而诱敌深入，正面撒开，敌扑一空。我军转包之侧后、先收回阜平，后歼敌于河口、阳明堡、高门等役，在战略上极有意义，指挥动作艺术，终于将敌击败。这里的经验是：

敌以大兵力四面八方围攻，其战略上甚慎重，不明情况不轻入。在此种情况下，精神上最易处于被动。过去我不断进攻敌人，处处处于主动，但在敌对我大围攻中，往往

在精神上易处于被动。此时主要是不为敌所迷，坚定自己方针，下决心争取主动，向敌威胁我最大处集中力量，以打开局面。必须放弃处还是要放弃，不了解者要向其解释，并从经验上使其明白，以事实说服他们。自己抱定计划决心，无特殊情况变化，绝不受影响或动摇。

此次在整个战略上说，我有一定计划，故终于在基本上粉碎了敌之围攻。

在战术上说：

①证明了敌以大联队深入山地，离开了主要铁路线，人马供养必须后方联络，如将其后路切断，以打击孤立深入之敌，必易得胜。

②证明了山地大部队不易展开，此敌我共同之条件。如巧妙运用，坚决前后堵截，向中作猛烈之短兵突击，绝不要据险而守。险要处应以小队作不规则之游击动作，以迷惑敌人。此种战术我未充分利用。不要机械地以教条主义的、战术主义的眼光，要按不规则的地形，以特种战术战胜敌人。

③证明了夜袭的战斗应常用。只要有决心，常能成功。如高门夜袭，常获大胜。

④扰乱之动作有作用。

⑤伏击，如阳明堡之战，皆能完满成功。

战术上结论是：采过于正规者不甚有利，而正规中之特种战斗易于成功。

在此次围攻中，命令的执行，指挥的统一，都是可嘉的，多有模范。如河口之役，相差只十分钟，如执行命令

之部队不坚决，则不行。

群众工作在坚壁清野中很彻底。敌人必须以大骡队拖给养、子弹，易于我之打击、消灭。

反围攻中的政权工作，一般起了作用，县以上都能坚持工作。

总括来说，此次反围攻中各方面都有进步的收获。但此次缺点也不少：

①部分干部缺乏战略眼光，迷于局部，只看到自己。

②干部有些掌握不住部队，使用部队能力差。有的部队放出去不知何去，收不回，这是不能掌握；有的部队抓在手里不会用，总喊兵力不够，这是不知使用。

③侦察工作不好。如敌骡队渡河看错，认为是骑兵；高洪口敌到不知，警戒疏忽。

④通讯联络我工具并不少，有些不知掌握无线电，以致作战时不能运用电话。归政府指挥时不灵。

⑤群众工作配合上不够。接近战区，动员人力、勤务极困难。

⑥区村政权差，军事化的指挥没有。

⑦自卫队松懈，便利汉奸活动。但汉奸实不十分厉害，主要是自卫队没有坚决执行任务，自己解除了自己武装。

⑧动员工作，过去战争动员会是不合适的。我们今天一切都为了战争，都为了进行动员工作。并不是在敌人大举进攻时才算是战争，故不应在战争时取消了一切政权工作而滥组动员委员会总揽一切，只有与政权配合，加强战时动员工作。至于带突击性质的战时动员组织，是必要的。

⑨宣传工作在此时虽然做了许多，报纸坚持出版，起了作用，但发行工作过于差了，支部动员不出人来任发行工作。

这些是提出的几点缺点，须要纠正的。

(七)关于冀中的平原游击战 与冀东的挺进游击战

冀中乃边区之一部分，但冀中因系平原，较有特殊之处。

冀中一年来收有很大成绩，过去也保持有长期党的基础，故能胜利地完成工作而有今日。但自其成立以来，有许多困难条件：①敌占区多；②干部少；③八路军未到；④地方各种势力复杂。但经艰苦工作后，有大收获，充实了整个边区内容。

这里简单只说平原战问题。过去我们都在山地作战，但我们一致认为平原有建立游击根据地之可能，事实上也已证明，但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优点是：①村庄多；②道路多；③人口多；④资源多。这几点是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开展，如群众工作的开展，人力动员，部队扩大，财政支持，皆得极大之益。党以基干支队为骨干，统一改造了杂色部队，並坚持了统一战线，以适当方式争取了其他地方武装及联庄等。党建立了基础並有进步，涌现出有朝气的新干部。党政军干部在群众中有高的威信，这就具备了优越条件，与去年大不相同。

其缺点，即平原之特点：①便敌机械化兵团的运动；②便敌大兵力的展开。但总的方面，我的优点仍多：敌之路仍不如我之路多；敌不见得有路都能走，我却到处可走；以零散小游击队到处可走，便于运动；利用村庄隐蔽，且因此而伤亡特少，比光山中暴露之伤亡更少。这证明平原地不易受损失，这在地形上说是有其优点，虽然敌之进攻、运输容易，坚壁清野较难，不易孤立、围困敌人，但人力、物力动员容易，不以大兵团作战而以游击战与之对抗，仍然是有利的。故平原游击战能坚持将不成问题。

敌是否能集大兵“扫荡”冀中呢？可能，但敌并不愿以大的战略上的主力以攻游击队而致疲惫，同时敌更不能完全以兵力控制于平原村庄。事实上，敌至今仍只以守备部队向冀中进攻，只能控制几个城市，不能大规模“扫荡”，只能继续“游击”而图建立伪政权，作长期的计划。而我仍控制广大乡村，与敌坚持游击战，这在基本上不会有大问题。虽然我大兵力此时转移困难，但小兵力继续分散活动，划小指挥单位（分区），毫无问题。

今后转入相持阶段，敌我情况变化，而我从锻炼中坚强，仍可坚持，虽不必死困于平原，但可来去拉锯式作战，作外线活动。部队要更富于游动性，执行最高度的游击战术。

同时，一年来我们未遇最困难环境，今后入残酷阶段，部队量上可能缩小，减员会多，而这决定于我之工作以巩固之，而质量上必会提高。这一残酷过程不可免，绝不能因此而悲观。要主观努力，最有保证地使部队有高度的游

击力。敌对东北之编村等统治方式，在冀中应用尚非其时。我已有基础，故不能即用东北经验，且冀中目前非孤立，乃与全华北相互联系，敌不能集中兵力，故我们不能减低冀中平原游击战之信心。

冀东挺进游击，在去年青纱帐时出动，此乃党一定之计划，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并与东北义勇军打通，取得联系。由此战略决定，我取得了胜利，有下面的成绩：在保卫武汉的战略意义上，得战役之胜利；摧毁敌伪统治，收复县份；与地方党及武装配合，发动暴动以牵制敌北宁路兵力，并吸引关外兵力，声浪达全国及世界，有极伟大意义。此次胜利应有足够估计。但此胜利未好好巩固起来，因：

①敌抓我弱点，不停地进攻，不予我有立足之机会，致挺进支队始终都在极残酷环境下活动；

②地方武装纪律很坏，有些是“抗日发财”者，结果部队坍台；

③虽是山地，但敌交通已成，便于进攻。且在主观上，兵力有限，不能对敌之进攻，予以有力、决定意义之战斗以打击之，使敌受挫而乘机立足；地方党及武装未能掌握新部队，领导未能有保证。

建立根据地不是很容易的，尤以敌统治已久之地；必须长期性，不是一下子可建立的，一切准备与决心要有坚决继续创造之精神，为长期持久战计划之一部分。

最后总结几句。边区已成为抗日根据地，各方面都已打下了相当的基础。这根据地之创立而有今日的成功，是

由于：

①以民族自卫战争的旗帜动员了全边区人民进行抗战；

②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具体规定统一战线一切政策，团结了全边区人民；

③一年来的斗争，不仅就局部分开看，而且即就整个的看，都是在战略上统一指挥行动之下，故每一动作皆有其战略意义；

④八路军在华北影响大，便利领导；

⑤有着广大人民拥护，根据地建立于广大人民心中；

⑥全边区党、干部努力、牺牲之结果；

⑦运用党的方针及过去长期经验，发扬用于今日统一战线环境中，如军政民各方工作，皆苏维埃经验之发扬。

但我们尚未能说已充分巩固了，相反，还须各方面工作更巩固已得的成绩，将边区展开出去。在统一战线上，不仅与友党友军合作，更及社会各阶层的统一战线，使政策适于全边区全体人民要求而团结之不断与敌斗争，在斗争中锻炼人民，使认识党之领导正确，坚持持久战，最后战胜敌人。

(八)今后边区环境与任务

A、边区今后环境与整个华北环境同，但它是最突出、最前线，故不管敌今后继续战略进攻或转入相持阶段，都绝不会放松我们，而是首先要向我开刀。如对冀中进攻，

亦即进攻边区之一部分。目前这一阶段乃最紧张之环境，晋东南等亦然。此皆所谓敌之“扫荡”华北计划。敌兵力已开始移动，但尚未有足够主力，不能即抽其战略主力来此。故边区相持阶段已到来。敌扩大点和线，而未能扩为面，足与我相持。

此情势与过去不同，但游击战争仍可继续开展无疑。故我应立即准备并希望敌增兵来，直至牵制其主力，此乃我之任务。将来如群众配合得好，可孤立其据点，在青纱帐再起及水涨时而夺回城市，这是可能的。

B、我在华北与一年前不同。一年前党给我们的任务乃单独支持华北，现第二阶段将到，华北各地力量更要增强，巩固阵地以准备反攻，故我已非单独突出的了。

C、争取相持阶段到来中，主要斗争方式是游击战争，故要：

- (1)以游击战持久；
- (2)以游击战消耗敌人；
- (3)以锻炼和加强自己准备反攻。

此时，党、民运、政权工作皆应适合新环境，一切为了巩固根据地，为了战争，不必加任何注解。毛泽东同志过去每在战前，必先派干部深入各地工作，名曰“布置战场”。我们今天已布置好了，现在主要是巩固。

D、部队本身，如系在群众抗战中动员起来，①质量一般好；②战士皆亲见敌之残暴，有决心保卫家乡，英勇非无目的；③部队有一年多斗争历史，皆可称为老战士了，军事、政治上有初步基础；④党的基础有保证。

故现在要：

(1)充实现有单位，紧缩和健全机关，不必增多。“头大脚小”、“小脚胖婆娘”加上“肿脚病”是要不得的。

(2)要正规化去打游击，这是进步的。组织和训练、指挥都要有正规化观念，今后打游击更有保证能掌握住。今日尚有游击主义习气者，这是要不得，大的游击战争不是小的游击队所可担任的。

(3)军事教育上，过去不十分统一，各自为政，不合适。有偏重形式的，有超出范围的。我们要着重技术教育，打枪、手榴弹、战斗各个动作，地形地物的利用，要使战士非常熟练，並注重夜间袭击动作的教育。许多部队不知扩张战果，夜里天未亮即拉回，故应注重特种战术。部队之分割使用，不规则的战斗动作，足以迷惑敌人，使敌侦察我难而我侦察敌易。党的工作在此起保证作用。

(4)军事、政治的纪律教育。过去平日纪律好，战争中则不好。有些认为作战时不能维持纪律，这是不对的。对命令执行必须坚决严格检查，不许忽略。这与政治自觉的纪律教育有关，应从自觉中建立铁的纪律。

(5)政治教育与党的工作，依总部材料进行了，但还要深入，……。提高党的质量，教育、锻炼，使真成为堡垒。只有如此做，才能使部队散得开，收得回，不怕打，打不烂，能保证适合将来游击战争更残酷的环境。

(6)关于锄奸工作，一般收大成绩。……。敌人乃特务国家。我此部门组织太弱，此后在地方、部队中都要建立此组织部门。地方党应抽干部训练，建立组织，乃有决

定意义的工作。

(7)关于干部问题，主要是观点问题。对干部不能以一种水准来看，新旧以一样眼光看不对。要从新干部中认识，现青年学生最多，这皆优秀分子，应以责任付之。今天经验差，明天就好了。要看到青年成为干部的过程很快，文化水准高，了解接受快。并要了解干部对象，不能用旧的方式，要从斗争中锻炼他。虽不能保证个个好、但大多数是好的。要估计这一新的力量。

(8)领导与指导的原则。

①各级建立集体领导，尤以战争紧张时最重要；干部有长短，互相补助、调剂，在新部队尤要如此。

②指导要集中，但对下级指示具体，同时要机动，以配合游击战争环境，不要到处干涉，呆板指导；有错误要从积极方面纠正他。总的布置是不能变动的，个别小的要任其机动。

(9)部队党与地方党两者是一个，但其任务系统不同。八路军有发展、创造党的责任，同时靠党扩大、发展八路军。目前地方党、部队党关系並不恶劣，但也不很好。现分区部队党离开了地方性，太正规化了。现部队要带地方性，不能与地方党分开；同时地方党同志不应以部队为别人，如对扩大部队少关心，地方党发动、组织的游击队，应属分区指挥，不应由党直接指挥，党乃以群众面目在中间起领导作用。保卫地方，掩护地方党，应由分区负责。分区应有地方工作多面的开展计划。现地方党与部队党划分了家，部队党与地方党争兵，多扩其军，这是立须克

服的。今后组织上分区政委参加特委，要负责，工作布置要统一，部队战争形势应告特委。

(10)兄弟部队关系。大家都是八路军，但因个人观点、习惯等不同，有不同处，故要：①下级服从上级。不管哪一区队伍，到他区要受他区上级指挥，这是我八路军光荣传统。过去一、三军团即是如此。②各部队自己先批评自己部队，调整团结关系。

(11)部队同政府关系。要尊重政府，不许以枪杆控制政府。提意见，介绍人员都可以，但不能干涉其行政系统与范围。客气待政府，这是有利的。我实力者尊政府，可更提高政府人员之积极性。

(12)对友军关系。真正友军互助，尤其是在战斗中；但杂牌军队许多是发财观点，不要放任它，必须经改造过程，使之彻底转变成为统一战线的军队。一个部队不能有几个领导，如赵同、孟阁臣，皆前车之鉴。

陕甘宁边区的反摩擦斗争

肖 劲 光

斗争形势和有利条件

摩擦与反摩擦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斗争的特殊形式。这一斗争之所以不可避免，在于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但是由于国民党主要领导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没有放弃反共反人民的立场，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很尖锐。这就是反共顽固派制造摩擦的根源。反共摩擦既不可避免，我党我军的反摩擦也势在必行。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边区的巩固和安全，也直接关系到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坚持，关系到全民族抗战的根本方向，这是一个原则性、政策性都十分强的问题。

对于抗日战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在我们党内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在确定动员一切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组

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立场要坚持高度的警惕性。同年十一月，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他又着重论述了这个问题。针对当时党内一度右倾思想抬头，他号召全党都不要忘记陈独秀投降主义导致革命归于失败的血的教训。他的这些思想，后来就发展形成了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方针和策略。在这年年底，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从极“左”一下子跳到极右，在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专题演说，批评党的正确主张，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这以后，他还到处散布这一套错误理论。有一天，王明在延安的一次并没有国民党人在场的群众大会上讲话，一口一个要“服从蒋委员长”，引起同志们的反感。有些同志边听边掰手指头计算着，他这次讲话竟然喊了二十五个“蒋委员长”。不久，他到武汉工作，几次提出要把党中央搬到武汉去，不主张建立农村根据地，不要独立自主的武装斗争。一九三八年九月，党中央通知他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他不仅推故不参加，反而无理要求把六届六中全会搬到武汉去开。毛泽东听了，非常生气地说：我就坐镇清凉山，哪里也不去！这次全会认真清算了王明的右倾言论，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毛泽东在为会议

作结论时，深刻地剖析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类错误口号的实质，明确提出：“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和全国人民实行抗战的大本营，又是八路军的总后方。对此，反共顽固派又恨又怕。八年抗战中，他们在边区内外制造的摩擦事件，几乎没有一天中断过。在他们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中，每次都把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尤其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更是把进攻陕甘宁边区作为他们反共的一个突出重点。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四年春，顽固派对边区发动武装进攻二百七十五次，抢劫骚扰四百五十七次，暗杀、诱逃、拘捕人员二百九十五次。

当时，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南边、西边、北边驻有四十多万大军，计有十九个步兵军和两个骑兵军，还有地方武装三个保安旅和十七个保安队。其中势力最雄厚也最顽固的是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部队。这么庞大的兵力，不用于抗日，而是用来封锁和破坏边区。在边区境内各县，他们派驻有县长、县党部和保安队，在绥德地区还派了一个专门制造摩擦的专员。此外，他们还派遣大批特务，潜藏在边区境内破坏捣乱。毛泽东在一份电文中曾经这样写道：“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残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这种严峻而又复杂的斗争形势，使我

们产生了“山雨欲来”的强烈预感。

要应付这种局面，当时我们的困难是不不少的，例如，防线长，兵员少，武器弹药缺，河防和剿匪任务繁重，等等。但是，我们也有不少有利条件，除了有边区政府的密切配合和边区人民的支援以外，一个最优越的条件就是：我们是在党中央身边，斗争中遇到什么难题，随时可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得到最直接的指导，和强有力的支持。

当时，我是名正言顺的国民政府任命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执掌陕甘宁边区的防务，所以，在处理陕甘宁边区的摩擦事件中，和国民党方面打交道的直接出面者是我，给国民党军政大员发电报交涉也大多是用我的名义。那些发给上至蒋介石、程潜、胡宗南，下至国民党的师长、专员、处长的电文，以及有关反摩擦斗争的声明、文章、布告等，基本上都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亲笔修改的，其中不少还是他亲自起草的。这使我有机会直接学习毛泽东伟大的战略策略思想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受到终身难忘的教益。这些珍贵的文电手稿共有一百四十多份，我曾将它们装订成册，从延安带到东北，从东北带到湖南，从湖南又带来北京，在身边珍藏了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中，这两册文稿跟随我经历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也经历了十年内乱。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四月，我才把这些文稿上送给毛泽东。我在同时附上的信中写道：“我在延安，在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八年之久，这是我一生革命经历中受主席教诲最经常、最深刻的一个时期”，“这两本文稿，是党

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我已七十有三，一旦由我失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经过反复思忖，我决心把这两本文稿，敬呈主席，以尽心意。”现在，这些文稿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

今天，在回忆自己一生走过的革命道路的时候，我感到很有必要把自己的这段难忘的经历如实记下，把我对毛泽东指导反摩擦斗争的所见所闻详细地介绍给大家，以图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从中体会我党在抗日战争中为维护统一战线的卓绝努力，从中体会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呕心沥血所作的伟大贡献。

南大门摩擦迭起

一九三九年，从年初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事件，便接二连三地发生，到年底前后达到了高潮。其中摩擦事件最多、斗争最尖锐、激烈、复杂的地方主要是关中、绥德、陇东三个地区。

关中及其毗邻的郿甘（郿县、甘泉）一带，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是全国各地进步青年和国际友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条主要通道。这个地区又正是蒋介石的嫡系、当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胡宗南所属部队的主要防区。胡宗南在关中和陇东一带，部署了十二个步兵军、一个骑兵军和两个骑兵师、八个炮兵团，共约二十万人的兵力。特别是把他的骑兵二师、二十八师、预备三师以及保安旅等大量兵力，布署在紧靠我边区郿县、淳化、枸邑等

县的洛川、邠县一线，直接威胁边区的安全。还有当时任陕西省主席的蒋鼎文，也是蒋介石的亲信。他委派到我酃县、柘县、淳化等县的几个县长及其保安队，也都是内战内行、专门制造摩擦的大小爪牙。这样一来，这个地区的摩擦事件之多，在各个时期几乎都居首位。

一九三九年初，因河防吃紧，我八路军原先设在黄河边上的残废院，奉命西移到关中地区柘县县城南边的土桥镇。柘县国民党县长张中堂及邠州国民党专员张明经闻讯以后，竟然调集保安队二、三千人，围攻残废人员，迫使我残废院不得不退出土桥，移到柘县县城。为此事，当时我曾电告蒋介石。蒋回电说：“已电陕西省府制止矣”。然而这只是一句搪塞的话。五月下旬一天，残废院的一个采买人员出城采购，突然遭到该县保安队枪杀。残废人员群情愤激，派出代表前往国民党县府请愿，县长张中堂竟然指挥保安队开枪射击，当场惨杀我残废代表九名，随后又率领大队人马向我留守兵团派驻县城的独立一营进攻。在这同时，张明经也调来保安队两个团，日夜猛攻。众寡悬殊，我军被迫退出县城，柘县遂被顽军占领。出城时，残废院有十七名重残员兵掉队，被保安队捕去，经毒打后，全部被杀害。

这些伤残人员在抗日战场上虎口余生，在抗日后方却死于“友军”之手。我们当时真是痛心极了，也愤慨极了！独立一营官兵纷纷要求增兵进行还击，夺回失地。从道理上说，事情是顽固派挑起来的，而且杀了人，夺了地，我们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实行还击。但是，仔细一分析，对顽

固派进行武力还击，对我们并不利。一方面，我方主力都在敌后抗日战场，大举增兵不可能，再打起来，可能还要吃更大的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顽固派正巴不得我们动用武力，以便寻衅制造更大的摩擦事件。权衡利弊得失，党中央从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指示我要争取和平解决的前途。我首先说服独一营官兵采取忍痛、克制态度，力持镇静，等待上级解决。随后，我给蒋鼎文发了急电，谴责了张明经、张中堂一伙制造这一杀人掠地惨案的罪行，悲愤而又有克制地指出：“查敝军残废员兵，以抗敌余生，养息后方，前以移驻土桥，备受迫害，今又大遭屠杀，消息传来，痛心曷极！惟念国家处此危急存亡之际，袍泽之间，纵有差错，总宜容忍”。要求陕西省政府派员查处此案。毛泽东审阅了这份电文，要我同时致电蒋介石和程潜。此外，我还就这一事件，向全国发了通电，要求各界“一致呼吁，以彰公理，而警凶顽”。国民党顽固派杀人理亏，蒋介石、蒋鼎文等人自然不敢也不会派人来调查处理。在这件事上，我们虽然受了些损失，但也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揭露了顽固派破坏团结、惨杀抗日伤残员兵的罪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

一九三九年三月下旬，我八路军招收的护士学生二十七人，着装整齐，奉命由西安步行到延安学习。当他们走到靠近边区的中部县（即今黄陵县）时，竟被国民党县政府无故扣留，并于四月一日，派军警把他们强行押送到别处去。正好这一天，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有几个同志乘车经过中部县，发现了这一情况。他们立即派人到县政府

再三交涉，要求放人。这个县政府蛮横无理，一口拒绝。随后又在县府门前加派哨兵，不让我交涉人员进去。我得知这一情况后，首先致电蒋鼎文和中部县长，随后又致电蒋介石，严正指出：这种行为显系故意捣乱，事关抗战，希望命令陕西省府迅速予以释放。由于这件事情实在办得太蠢，蒋介石也不得不给我回电：“肖主任：中部县扣留贵部护士学生，已电蒋主席将转饬该县速予释放矣。”这批护士学生虽然被释放了，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顽固派是什么无理的事都干得出来的。那天如果不是正巧被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同志路过时发现，这批护士学生还不知要被押往何处，遭受到什么样的磨难呢！

一连串事件发生后，我们从维护抗日统一战线这个大局出发，虽然每次都急电国民党的军政要员，要求制止事态发展。但由于蒋介石的方针已定，当地顽军有恃无恐，摩擦事件不但得不到制止，而且形势越来越严重。

枸邑几十名罹难烈士的血迹未干，驻洛川以马禄为师长的国民党新编骑兵第二师，又在频繁调动，向郿县开进，一部已进占郿县南部的几处村镇。这时郿县一带，我军只有陈先瑞带领的少数部队。而郿县距离延安，不过百余里，一时形势很紧张。

为了确保边区南大门的安全，党中央指示我们要加强郿甘警备区。我们随即调文年生率领警八团开到了郿县一带，并任命文年生为郿甘警备区司令员，阎红彦为政委，陈先瑞仍任警备区副司令员。毛泽东仔细修改了我给马禄和洛川专员等人的电文，并在亲笔起草的一份致程潜、蒋

鼎文的电稿中严正声明：如果马师强占不退，则引起冲突之责任及一切后果，我们概不负责。为了维持社会治安，稳定当地局势，毛泽东还先后两次起草和改写以酃甘警备区名义发布并在各村镇要道张贴的布告。他在布告中写道：“本军奉命镇慑，业已部署周详。外与友军团结，内与党政协商。唯期地方安静，即以巩固河防。倘有汉奸国贼，敢于以身试尝，国家法纪所在，决不许其倘佯。”在这同时，我们还派代表去与马禄进行了说理斗争。

警八团到达酃甘前沿以后，立即同原先在这一带驻防的部队一道，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准备工作。大约也是在这期间，我来到了酃县及其附近的茶坊、交道镇等地。同我一起从延安来的还有两位苏联军事顾问。我们走了不少地方，看到在一些交通要道和险要地段，都筑起了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指战员们对于顽军可能从哪里来，自己准备怎样应付，也能讲出个一二三四。看到和听到这些情况，我感到满意，对守住边区南大门心中有了底数。果然，马禄见边区军民已严阵以待，没敢轻举妄动，并回电说是“误会”，双方应以团结为重，互不侵犯，找了个下楼的梯子，乖乖地缩回去了。

正当马禄杀气腾腾，妄图挥师北上，从外部进犯边区的同时，国民党派驻酃县的县长蒋隆延在边区境内，也密锣紧鼓，兴风作浪。这个蒋隆延在酃县地区敲诈勒索，横征暴敛，一再加重民众负担，致使民怨沸腾，群情激愤。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大义乡人民群众忍无可忍，一齐拥到县府请愿，搞得这位县长狼狈不堪。我当地政府为了团结

他们共同抗日，派出代表协助他们做工作，才将这些群众劝回。但这个蒋隆延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指令六个联保主任叛变为匪，率领匪徒在大义乡一带，切断交通，劫走我军来往人员数十名。随后，又组织暗杀队，埋伏险要，阴谋杀害我郿甘警备区领导干部及各团、营长，制造恐怖气氛。一九四〇年一月八日晚上，我特务团参谋长匡裕民的警卫员从该地经过，暗杀队以为他就是匡参谋长，突然行刺，将他杀害，正巧被我特务团一位连长路过这里发现了，该团断然采取措施，立即派出部队缉拿凶犯，当场捕获凶手罗克勤，接着又捕获暗杀队的头目、中队长韩振江和分队长王子玉，并解除了这个暗杀队的武装。事后，我致电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严厉惩办肇事者。《新中华报》在一版头条位置，以《郿县的大暗杀案》为题，发表社论，并以一个多版的篇幅，详细报道了事件的经过，对顽固分子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愤怒控诉。经过这一番斗争，当地的紧张局势才开始缓和下来。

赶走专事摩擦的“县太爷”

陕甘宁边区境内各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着由我边区政府委派的县长、政府工作人员和由国民党省政府委派的县长、政府官员两套政权班子。在绥德地区，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还委派了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形成这种奇怪现象，有它的历史原因。有些县，例如绥德附近的米脂、吴堡、安定、清涧、延川、延长等县，原属我陕北老

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六年红军东征抗日，国民党趁机侵占。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达成协议以后，这些县都划归边区政府管辖。但是，国民党原先委派的县长和政府官员，仍然把政权紧紧抓在手里。另外一些县，原先不是老根据地，而是在“西安事变”前后，我们从东北军、西北军和其他一些国民党军队手中接防，后由国民党政府正式划归陕甘宁边区的。我军驻防以后，陆续建立了政权机构，但国民政府原先委派的县长和政府官员仍然存在。各县的国民党县长大都组建了自己的保安队。

为了团结抗日，对于这种怪现象，我们一直采取忍让和克制的态度，允许他们暂时留在边区境内。开始，双方尚能相安无事，有事也能协商解决。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反共摩擦，这些披着“合法”外衣赖在边区境内不走的国民党官吏，便成了寻衅闹事的祸根。特别是国民党派驻绥德地区的专员何绍南，更是一个臭名昭著、群众切齿痛恨的反共摩擦专家。此人和侵华日军板垣师团长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两人交情甚笃，他又颇得蒋介石器重，政治上非常反动。当时，在绥德地区成立了一个“抗敌后援会绥德分会”的统一战线组织，为了争取和团结他抗日，分会主任由他担任，我绥德警备司令员陈奇涵只担任副主任。但是，何绍南在当了主任以后，却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调来保安队四百余名，又收买了一批兵痞、匪徒，合编成五个保安队，分驻各县，为他制造摩擦充当打手。

何绍南任职两年，制造了大量的摩擦事件。一九三九

年五月，他授意安定县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我杨家园子，用机枪扫射，打死打伤我官兵数十人。九月，他面喻吴堡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杀害了我七一八团三营副营长尹才生。十月，他指令清涧县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和黑军“政府”，并指使县府的官员串通土匪，到处抢劫，破坏社会治安。他还伪造八路军臂章及一一五师通行证，发给运输队的高步元等人，冒称八路军私贩烟土，毁坏我军声誉。他和他手下的一伙贪官污吏，到处敲诈勒索老百姓的钱财，光他自己贪污受贿的就有十万多元。当群众遭遇灾荒时，他竟丧尽天良，侵吞了救济灾民的大量赈款。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开始，我们同他进行的斗争还是留有情面的。这个何绍南，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认为我们软弱可欺，仍旧为非作歹。有一次，我听说何绍南路过延安，当即找上门去，毫不客气地教训了他一顿。我警告他说，我们八路军以团结抗战的大局为重，但决不是软弱可欺，如果你再这样扰乱后方，破坏团结，我们就不客气了。随后，我又引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指着他的鼻子，斥责他是破坏抗战，制造摩擦的专家。“骂”得他头都抬不起来。虽然当时何绍南嗫嗫应允，但回去以后仍旧不断制造摩擦。一直到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驻防绥德，并担任绥米葭吴清警备司令以后，针锋相对地同他进行坚决斗争，打掉了他的嚣张气焰。不久，他逃出陕北，到了西安。

为了把何绍南彻底赶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我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当时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程潜、蒋鼎文等人，要求惩办何绍南，并委任王震兼

任绥德地区专员（当时，陈奇涵已调离绥米地区）。电文中说：“现在组织暗杀之黄若霖，虽经撤职；纵兵为匪之艾善甫，虽被管押；贩卖烟土之高步元等，虽已法办……，但发号施令之主谋罪魁何绍南至今逍遥法外，未闻议处。”对于如何处置该犯，毛泽东修改电文时这样写道：请“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令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之重典，以肃法犯，而快人心。”对于委任王震为专员一事，经毛泽东修改后的电文是这样措词的：“查有绥米葭吴清警备区王司令震，前以转战华北，屡建奇勋，近则守备河防，复树劳绩，以之兼理专员一职，实属人地相宜。”

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曾经写道：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他从延安回太行山，路经西安时，在国民党西安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处见到过何绍南。彭总对程潜说，那些制造摩擦的“顽固分子，是秘密的汪精卫，比公开的汪精卫还坏”。当着程潜的面，彭总痛斥何绍南：“你就是这样子的汪精卫，在陕北做尽了坏事，破坏八路军的抗日后方。”临行时，他又警告何绍南说：“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但是，两个月后，这个反动透顶的何绍南，竟然又秘密潜回绥德，鬼鬼祟祟，继续煽动保安队袭击我河防部队，先后打死我机枪连连长和哨兵多人。我派队缉拿，他呆不下去，便率领七个保安队哗变，逃窜到西北当土匪去了。

国民党派驻边区境内各县的县长，也是许多摩擦事件的制造者。前面提到的枸邑县县长张中堂、郿县县长蒋隆延，

两手沾满了边区军民的鲜血。延安北边安定县（即今子长县）县长田杰生，也是一个罪行累累的恶棍，是何绍南的一个重要帮凶。除了派队袭击并大量杀伤了我驻杨家园子的部队以外，一九三九年三月，由于边区政府处治了当地一个叫陈文才的积匪，他又籍词寻衅，竟然将该县的我方县长薛兰斌拘捕起来，百般凌辱，并且调动保安队包围我瓦窑堡的驻军，袭扰我抗大校址。以后，他又纠集附近几个县的保安队数千人，断我交通，截我粮食，并修筑碉堡，将我驻军重重包围，不断向我开枪射击，打死我连长和战士多人。如果让田杰生以及张中堂、蒋隆延这一类所谓“县长”继续留在边区境内，边区就永远不得安宁。因此，在赶走何绍南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又决定：全部赶走这些专事摩擦的“县太爷”！

一九四〇年二月，毛泽东亲笔拟稿，以我的名义给程潜发了一份电报，要求通知陕西省政府迅速将边区境内国民党县长撤走。电文中愤慨地写道：“国共合作已历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而有两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专以制造摩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三年，在彼辈益肆无忌惮”，“边区民众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旨，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府自动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理直气壮，不容争辩。程潜回电，不得不同意边区各县县长得由边区政府委派。就这样，国民党派来制造摩擦的这些县长，便一个个离开了边区。既然他们同意离开，我们

也就不念旧恶，以礼相待。他们离开时，有的地区开了欢送会，表示了我方希望两党以继续团结抗日为重的真诚愿望。唯有甘泉县那个姓杨的县长赖着不走，并且声言不论谁的命令，除非驻军将他拘捕或护送出境，否则，决不离开甘泉。他还造谣说有人遭到我方殴打。我方坚持斗争，寸步不让，最后他也灰溜溜地走了。

持续了三年多的奇怪现象，终于得以消除。边区境内从此平静多了！

陇东的曲折斗争

在陇东，当时也发生了许多摩擦事件。其中镇原、宁县两座县城之被武力侵占，是当时震动全国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历时最长，斗争也最曲折，彻底暴露了顽固派妄图消灭边区的狰狞面目。为处理这一事件，毛泽东倾注了大量心血，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坚持斗争，又顾全大局的伟大胸怀。

国民党派驻兰州的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当时对我党表面上保持着一副友好姿态，实际上却在推行许多反共、防共措施。他曾宣称，他们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一个就是共产党。他是制造摩擦事件的幕后人物。而当急先锋的是国民党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钟竟成。钟竟成公开谩骂共产党、八路军，阻止我军购粮募款，并勾结和配合国民党驻陇东的正规军一六五师、九十七师，对我留守陇东的七七〇团等部进行

武装挑衅，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流血惨案。他是陇东的何绍南！

一九三九年二月底，国民党派驻合水县应子区的区长王永清，在阻挠我军购买粮食时，竟然收缴了我七团三营营部采买上士的武器。三月初，我三营派八连连长陈凤山去区公所交涉退还武器的事，王永清竟破口大骂八路军是土匪，又收缴了陈连长的武器，并将他捆绑起来。该连士兵十余人闻讯往救，王永清又指挥保安队埋伏在城根下，突然开枪射击，并投掷手榴弹，击伤我战士四名。我方忍无可忍，断然将这个王永清捕获，带到营部审讯。问是谁叫他这么干的，他供认是“奉专员、县长的命令”。专员就是钟竟成。我给钟竟成打电报，指责他竟敢以和平为示弱，以忍让为可欺；同时也致电朱绍良，要求他切实查办此事。后来朱绍良以甘肃省府的名义，通过我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转来一封公函，反指责我捕获王永清是什么“军队干政”，要求“立即释放”。我在致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伍修权的复电中，叙述了事情的经过，要求伍修权严词拒绝对方的指责，并应指出“该王区长为现行军事犯，应由本军法庭依法处理”。

同年四月中旬，钟竟成调动几个县的保安队九百多人，首先开到了镇原附近。随后，国民党的正规军一六五师也派来两个营，来到镇原县城。他们与城内的保安队密谋，想以出城打野外为名，把城外的顽军引进来，里应外合，夹击我军。当时，我留守兵团三八五旅七七〇团的一个营驻防该城。这个营及时识破了对方的阴谋，

于是闭城自卫。城外顽军攻城甚急，城内保安队数十人又举行暴动，响应攻城。这个营迫不得已，只得先把城内这几十人的武装解除了。城外顽军围城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

在镇原我军被围的同时，国民党派驻宁县的县长，指挥事先纠集的保安队七、八百人，夜袭我军，砍杀哨兵，冲入我营区。驻守该城的我军仅三百余人，从梦寐中起而自卫将肇事者击退。我军伤亡惨重，对方继续增兵攻城，从此宁县也陷在顽军围困之中。

两处消息传来，我们迅速研究了对策。为了不使事态扩大，我在要求部队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分别致电蒋介石和朱绍良等人，说明真相，要求双方派代表调查处理。蒋介石回电说：“已电朱长官转饬严令制止。如某一方面再有捣乱或挑衅行为，引起冲突破坏抗战之事发生，应予严惩。”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是在推卸制造摩擦的罪责。朱绍良回电同意派代表谈判。

五月七日，我方代表王观澜与朱绍良派出的代表、参议员谭季纯，在庆阳驿马关作了初步商谈，约定停止军事行动。不料对方不但不履行协定，反而继续增兵，加修工事。直至七月一日双方代表再度协商以后，才逐步恢复正常状态。

但是，只过了两、三个月，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提出将政治反共为主改为军事反共为主的方针后，当地顽军和钟竟成狼狈为奸，又挥舞起屠刀，放手大干了。

十二月十日，宁县国民党县长率保安队，在胡宗南部

第九十七师一部的配合下，袭击我驻该县的一个营。他们在事先掘好的地道里埋藏地雷，突将地雷引爆，造成我军伤亡过半，营长也受了重伤。指战员们顽强抵抗了两昼夜，终因寡不敌众，突围出城，该城遂被顽军占领。

与此同时，合水县的保安队为配合宁县顽军的进攻，也向我驻该县的一个连袭击，经三小时激战，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顽军缴械投降。

十四日深夜，镇原县国民党县长率保安队四百多人，突然向我新进驻该城的七七〇团二营进行袭击。第二天早晨，国民党第九十七师五十八团步兵一个营、炮兵一个连，又发动进攻，用大炮猛烈轰击我军阵地。我二营英勇还击，打死顽军几十名；该营伤亡也较大，一些干部和老红军战士壮烈牺牲了。激战至十六日，二营在得到旅、团首长的批准后，才于当天深夜，从事先挖好的一个城墙洞内，主动撤了出来。

几乎在这同一个时间，国民党顽固派还调动长武一线的三十五师、一六五师分头向我边区开进，并派飞机在镇原、宁县上空侦察。我八路军驻西峰办事处也被顽军包围，幸办事处人员事先察觉，采取对策，才得免于难。

顽固派在陇东制造的这些杀人掠地的事件，与当时日军频繁进犯河防的军事行动遥相呼应，与前面谈到的顽固派在边区其他各地制造的摩擦活动，也是密切配合的。各地急报传来，当时我心头的愤慨真是达到了极点，恨不得立即采取反击措施。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却很镇静，具体指导我们从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进行了坚决而有节

制的斗争。

当时，用什么样的斗争方式，才最有效、也最切实际呢？从其他根据地增调大军，来夺回失地吗？不仅没有可能，相反还可能给顽固派大举进犯边区以借口，于边区，于团结抗战，都不利。最有效的办法还是从政治上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倒行逆施。

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战开始了。除了以我的名义连续给朱绍良发了许多份急电，几次给蒋介石、孔祥熙、陈诚、白崇禧、程潜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发出通电以外，报纸、电台更是大声疾呼，同声谴责。八路军驻重庆、西安、兰州等地办事处的同志，也四出奔走呼吁。通过这些办法，使全国人民很快知道了顽固派在陇东干出了亲痛仇快的罪恶勾当，也迫使国民党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

这里，我要多用一点篇幅，来回顾一下毛泽东在这场斗争中是怎样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电文的。从他修改和亲笔起草的电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党中央关于反摩擦斗争的一些重要的策略思想。

毛泽东在修改电文时，多次加了这样一些话：“边区二十三县范围为蒋委员长所指定”，我军“对于原定二十三县并未越出雷池一步”。这样写理由很充分，边区二十三县是你老蒋亲口承认，又经过国民党的正式会议讨论才决定下来的，现在你又派兵来侵占，出尔反尔，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在修改我给蒋介石等人的一份通电中，毛泽东反复推

敲，最后改写成这样一段话：“目前日寇以一师团之众大举西犯，柳林、军渡相继失守，我河防部队正尽一切力量，予以痛击，连日战斗甚为激烈。大敌当前，覆舟堪惧，后方纷争，实属不宜再有。苟一方拚死杀敌于前，他方复乘机争夺于后，则不啻以刃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这段话里的潜台词，实际上是在警告顽固派不要继续与日伪勾结。

在修改我致程潜、朱绍良的一份电文时，毛泽东加了“据闻一切行动均系根据新颁处理共党问题方案，下级不过照此方案执行而已”一句，点明下面的人制造摩擦，上面是有“根”的。

毛泽东还在以我名义致程潜的一份电文中写道：“镇宁两城虽被袭占，无辜官兵虽被牺牲，下级人员虽极愤慨，然劲光至今未增一兵，无非体钧座之意旨，本团结之大义，力求和平解决之道。”“职意公平处理，撤兵为先，进占镇宁两城之兵不撤，即无以示诚意而服人心。专员钟竟成实为肇祸之主谋，庆父不去，鲁难未已，施以撤惩，出自钧裁。”义正词严，字里行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以大局为重，忍让为怀和原则问题决不含糊的坚定立场。

在朱绍良答应派员调查后，毛泽东又认真细致地修改了我的复电，把原稿的语气改得比较缓和，并在旁边提示我：“此稿原文措词太激，甚不相宜，故改正如此。”认真琢磨他修改的词句，对于怎样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我心中就更有数了。

经过一番交涉、斗争，朱绍良派了保安处参谋长李学

模作代表，我方则派谢觉哉为代表。谢老德高望重，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付议长。在这以前，他作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代表，曾在兰州领导八路军办事处先后有两年多时间，跟朱绍良等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都很熟。党中央和毛泽东选派他去作谈判代表，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对于如何进行谈判，毛泽东专门给谢老写了一信，由我转交给他。信的内容如下：

“谢老：谈判条件(甲)陇东六县(环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镇原)属边区二十三县范围，地方行政应即全部移交边区管辖，杜绝一切纠纷之源；(乙)边区及八路军保障不向六县境外越出一步；(丙)在上列两条基本原则下具体解决彼方从六县撤退军队保安队行政机关及此次纠纷中双方交换俘虏等事；(丁)如彼方不愿照此解决，则我只能承认双方停止冲突，暂维现状，交换俘虏，其他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

谈判地点是在陇东西峰镇。谈判从一九三九年底开始，持续到翌年二月间。由于对方无诚意，协商当然不可能取得积极成果。最后还是象毛泽东信中最后一条所说的，双方代表只达成了一个“暂维现状，听候双方中央解决”的协议。

这一年，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兴风作浪的同时，还在湖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平江惨案，在河北有张荫梧事件，山东有秦启荣之进攻，河南有确山县之流血。掀起了国共二次合作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为了击退这股逆流，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第十八集团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联名向全国发表了一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的通电。通电中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悲愤填膺地大声呼吁：“夫共产党则亦何负于国，何损于民？深入敌后流血苦战者，非共产党领导之八路军新四军乎？力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者，非共产党之一切党员乎？以边区论，共产党几曾越过二十三县以外之寸土尺地乎？攻枸邑，夺宁县，占镇原，而执行其所谓‘消灭边区’‘打倒共产党’之任务者，究何人乎？大好河山，半沦敌手，而唯此边区二十三县是争，清夜扪心，能不为之汗颜乎？”通电要求全国军政领袖与各界人士主持公道，“痛国亡之无日，念团结之重要”；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明令取消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及处置共产党实施方案，制止军事行动，勿使局部事件日益扩大”。通电发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顽固分子跃跃欲试，疯狂叫嚣要“消灭边区”的言行，也不得不有所收敛。这样，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终于被击退了。

和邓宝珊将军的交往

抗日战争期间，统一战线中的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治态度是不尽相同的，有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

对于顽固派，要针锋相对，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对于中间势力，例如对那些地方实力派，那些愿意同我们团结抗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毛泽东历来的主张是要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在延安的一些重要会议上，他反复阐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还常对我说，只要对方赞成抗日，对我友好，我们对他就要以诚相见，以礼相待。这里，我要着重回顾一下当时我们同邓宝珊将军友好相处的一些往事。在这件事上，毛泽东不仅给了我许多指示，而且亲自做工作，为我们团结争取友好人士树立了典范。

邓宝珊先生是甘肃省天水市人，早年加入过同盟会。他和我党许多早期从事革命的同志，如李大钊、刘伯坚等有深厚的交往。他在兰州任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的时候，同我党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他曾利用自己的地位，保护过我们的同志，并将他的女儿送来延安学习，参加了革命。抗日战争期间，他的部队在榆林地区驻防，对于支撑北线抗日，维护边区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沟通联络，协防抗日，他在我边区绥米葭吴清警备司令部的驻地绥德设立了办事处，并指示所属部队要“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来往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

一九三八年五月的一天，毛泽东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据延安市负责同志向他报告，邓宝珊一行数人，路过延安，住在南关附近的一家骡马大店里，市里的同志邀请他住招待所，他一再谢绝。毛主席要我同他一道到骡马大店去看望邓先生。我一听，喜出望外。因为我要经常同边区周围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打交道，对邓宝珊其人，我虽

然久闻大名，但是并没见过面。有机会同他结识，对边区今后的防务将是大有好处的。毛泽东要我随他一起去看望，也正是考虑到工作的需要。我们走进骡马大店的院子时，邓宝珊闻讯迅速迎了出来。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满面笑容，同毛泽东一见如故，谈得很融洽。随后，毛泽东在交际处摆了几桌酒席，请他吃饭。出席作陪的除我以外，还有李富春、周小舟等同志。毛泽东挽留他多住几天，到各处走走、看看，对边区建设多提宝贵意见。他很受感动，欣然改变了原先打算第二天就启程的计划，在延安逗留了有个把星期。这一次相识以后，他到西安、重庆等地开会，途经延安时，几乎每次我都陪他去会见毛泽东等同志。

一九三九年四月，他由某集团军副总司令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我给他打了一份电报，表示祝贺。电文一开头就写道：“兹值敌寇亟图西犯之际，晋陕绥边区，实为西北门户，将军能一韬虎略，声威早著，今公坐镇三疆，敌胆定寒。展宏猷而建奇勋，逐胡马而奔汉北，可预期也。”给了他以很高的评价，并寄予巨大期望，表示双方应更加团结一致，共同反击日寇的侵略。

同年五月六日，他又路过延安，下榻交际处。当晚，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联合为他举行了欢迎晚会。他在晚会上讲了话，除了赞扬边区人民的吃苦耐劳精神，感谢边区政府对他的热情接待以外，还就加强团结讲了这样一段话：“我民族之前途有二：一存，一亡，欲存则全体应加强团结，因为只有团结，才是抗战胜利的基础。要团结则大家都要说实话，彼此有不好的地方，要坦白的进行批评，要尽量设

法消灭一切不必要的磨擦，这才是加强抗战力量的办法！”几句真诚的话，博得了全场一千多人的热烈掌声。

六、七月间，我到绥米一带河防部队检查战备工作时，也到他设在榆林的总司令部去拜会过他，受到他的热情款待。记得当时同我一起去的还有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教授。李教授是曾被国民党政府非法迫害过的全国闻名的“七君子”之一，后来在解放战争初期又因争取和平民主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昆明街头。那年他是专程到榆林去看望邓宝珊将军的，路过延安时，与我结伴而行。交谈中，邓宝珊将军流露出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很不满，而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陕甘宁边区建设，表示拥护和赞赏。我对他能够坚持抗日，坚持和我党我军友好的态度，也说了一些赞扬和表示感谢的话。双方都同意团结对敌，遇到事情多商量，互相体谅，友好相处。

邓宝珊手下当时驻榆林地区的还有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立卿)，兵力比较单薄，对我方也比较友好。到榆林时，我也去拜访过他。

由于有这样两位友好的高级将领，陕甘宁边区北部地区的摩擦事件，相对来说，就少得多。有时，个别下级军官不大讲理，与我军发生了一些纠纷，也比较容易解决。例如，一九三九年冬天，邓宝珊所属的新十一旅第一团第三营一个姓宋的营长，率领士兵强占我驻定边县城的警二团所属骑兵营的三处营房，致起冲突，双方开枪打了起来，各有伤亡，我骑兵营追到宋营营房内，并收缴了对方一部分枪枝。两军对峙，箭拔弩张，各不相让，如不抓紧处理，

很可能酿成一起极其严重的事件。

闻讯后，我立即致电邓宝珊，根据警二团的报告，向他通报了事件发生的经过。电文的最后有这样几句话：“恳请速电制止，如将该营另调他处，以平公愤，并将敲诈人民、贪脏枉法、破坏团结、制造分裂、肇事凶犯之宋营长撤职严办，以惩刁顽，而维法纪”。毛泽东审阅电稿时，将这段话全部划掉，改写成：“事件发生谅系宋营长受人挑拨所致。现在事态颇为严重，敬恳我公速电制止该营长，勿再寻衅，然后查明事实，合理处置，并可否将该营另调他处”。他还在电稿的旁边加注提醒我：“肖：后面口气太硬不好”。平常，对于邓宝珊，我还是把他同国民党的其他将领区别对待的；但当上述定边事件发生后，我正在气头上，对口气这样生硬的话，也都没有改动。直到看了毛泽东修改的地方和提醒我的话，仔细想了想，才认识到自己的粗心和意气用事。从这件事上，也反映出我对于毛泽东经常讲要努力争取中间势力，不同对象要区别对待等指示，还理解不深。如果毛泽东不把最后那些指责和带命令口气的话，改得比较缓和，邓宝珊先生看了，很可能勃然动怒，至少是心里会不高兴，定边事件的处理，就可能节外生枝，迁延时日。

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只有象毛泽东这样，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办法。邓宝珊收到我的电报后，果然态度很友好，回电主张和平解决，并建议双方立即派代表到当地去查明处理。我方派贺晋年为代表，到达定边后，会见了邓宝珊派出的代表王参谋和当地驻军陈团长、徐县长等人。对方态度友好，召开了欢

迎大会，并承认事情的发生，首先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部队军纪败坏，领导无方，预先不通知，就占驻我营房造成的，表示要将宋营长调防，希望双方友好相处。贺晋年经过调查了解，证明事件的发生，确实是出于对方个别下级军官的不友好行为所引起，而不是来自上面有意制造的摩擦事件。现在双方意见基本一致，只是在“谁先开的第一枪”等个别问题上，各执一词，事情发生在黑夜，一时也难以查清。对方态度好，我们就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的部队，将所收缴的对方的枪枝和其他物品，如数送还。同时要求部队认真总结一下这次事件的经验教训，看看以后处理类似事件，不用武装冲突，是否还有别的和平解决的办法。我在发给驻定边部队领导同志的一份电文中，陈述了这些意见。毛泽东在审阅这份电稿时批示：“很好，照发。”后来，我把贺晋年调查处理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如实向邓宝珊作了通报，并对他能够秉公处理，不使事态扩大的公正立场表示赞赏和感谢。毛泽东审阅时又作了批示，要我把这份电报迅速发给邓宝珊，很快了结这一事件。就这样，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一场风波迅速平静下来了。当国民党西安天水行营打电报来，要我报告定边事件的发生和处理经过时，我在回电中只用了“现已合理解决，和好如初”等几句简单的话，就算作了交代。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

从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〇年初，在党中央和毛泽东

同志的领导下，我们胜利地打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将抗日战争以来各个根据地坚持统一战线，进行反摩擦斗争实践进行总结归纳，从理论上透彻地阐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及“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等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我们这些亲身参加了反摩擦斗争实践的同志，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倍感亲切，也十分心悦诚服。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对于以后指导各抗日根据地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团结和斗争问题，起了重大的作用。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陕甘宁边区的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并没有止熄。然而，有了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导，在以后的斗争中我们更感到得心应手了。

一九四〇年春，党中央派我和王若飞一起去秋林镇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谈判。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军进占太原以后，阎锡山率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后来连同他的大本营一起撤过黄河，到了秋林镇安营扎寨。他在这里坐镇指挥，不积极抗日，却挥舞起屠刀，指挥部队杀向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正当各地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紧急关头，他也密锣紧鼓，制造了“晋西事变”，集中两个军又四个师的兵力，企图消灭我决死队。我军英勇反击，于翌年二月底，全部

肃清了晋西北地区的顽军，给了阎锡山以迎头痛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又主动建议谈判，他被迫同意了。

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交给我们一封致阎锡山的亲笔信，并对我们说，你俩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嘛，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摩擦，杀人掠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抗战初期，你阎锡山同我们合作得还可以嘛，为什么现在又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我们也不是好惹的，请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们到达秋林镇时，开始阎锡山自己不露面，却派了一伙人来纠缠、围攻我们。有的自称是新闻记者，但到底是些什么人，一时哪里搞得清楚！他们用挑衅的口吻，向我们提出一连串问题，要我们回答。这显然是在有意刁难我们。对于一些不怀好意的发问，我们根据事实，严词予以驳斥；对于那些不便明说的问题，我们也只好使用外交辞令，来它个“无可奉告”。我们坚持要与阎“长官”面谈，面交毛泽东的亲笔信。这样，阎锡山才不得不出来见我们。他在阅读毛泽东的亲笔信时，神情显得非常紧张。毛泽东在信中写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四句话。他提出能否把最后一句改一下，改成“我必自卫”。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当然不会轻易让步。事后，当我们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时，毛泽东曾经斩钉截铁地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就是要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次谈判，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把毛泽东交代的那些话，都对他说了，严肃地批评了他制造“晋西事变”的罪恶行径。经过

谈判，他接受了我党主张，达成了不再进攻我八路军防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君子协定，同意双方继续派代表具体协商联合抗日和划分防区的细节问题。随后，双方代表经过多次谈判，确定在山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活动区域。这些协议，减少了摩擦。对于当时的团结抗日，对于边区的巩固，却是有利的。在这以后，阎锡山的反共活动收敛了不少，正如毛泽东所说，在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又成了中间势力。

一九四〇年三、四月间，国民党第九十军突然在黄河东岸、山西境内的大宁、蒲县一带集中。陕北人民纷纷揣测，有的说是该军将开至中阳、石楼一带，以便偷渡黄河，袭取我边区绥德地区；有的说是该军即将从大宁、永和渡河进攻边区。我们得到的情报也证明，对方不怀好意。大军压境，一触即发，形势非常紧张。当我们正在商量对策的时候，毛泽东以“八路军河防兵团政治部”的名义，亲自起草了《八路军致友军九十军书》。他在这封公开信中写道：“贵军乃抗日军队，其任务应为抗日，而绝不应是进攻边区。敝军担任河防，与日寇隔河对战，久历时日，虽无奇功，幸告无过，亟愿与贵军团结一致，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共歼敌伪，复兴我中华民族，绝不愿与贵军及任何友军进行内战。盖当此之时，凡枪口对内者，为民族罪人，国人绝不同情，贵我两军均是明白的。”信的最后，与对方约法三章，建议双方互派联络人员，互相交换抗日情报，友好相处。电文起草后，毛泽东给我写了一封短信，告我如何

散发这封公开信。信中没讲什么道理，但从中可以看出他考虑问题的周密细致，看出他指导反摩擦斗争是何等具体，使我深受教育。下面便是这封信的全文：

肖主任：（一）此件即铅印五百份。（二）印出后以一份邮寄山西蒲县九十军李军长，以三份分寄山西蒲县探投九十军六十一师，五十三师，一〇九师师长，以一份寄延安国民党县党部，以五十份寄郟县囑于（注：可能系“其”字的笔误）散发于向洛川行走之商人及郟县商人，以二百份寄两延河防部队，囑其分送吉县，大宁，永和之商人农民晋军及大宁一带之中央军，以二十份寄秋林王英英囑其散发，以一份交新中华报登报并发广播，以一份交我，其余概寄王震散发于警备区及分寄石楼中阳一带。速办为要！

毛泽东

四月一日

公开信散发并登报、广播后，黄河两岸，边区内外，一传十，十传百，“九十军要进攻边区了”的讯息，不胫而走。顽固派当时的心理状态是：想反共，但又害怕别人公开指责他反共；不想抗日，但又还害怕丢掉抗日的旗号。毛泽东写这封公开信，正是抓住了对方的这个要害，用造成强大舆论的办法给对方施加压力。这样一来，我们占了主动，九十军不能不有所顾忌，便没敢轻举妄动。一场眼看要发生的重大摩擦事件避免了！

国民党的新十一旅一直驻防在三边地区。他们与当地我军长期相安无事。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具体时间

记不确切了),我方突然得到情报,说是国民党的新二十六师何文鼎部被调南下,准备进攻边区。具体步骤是:该部先攻占边区的定边县,再攻占定边、盐池,然后配合南边从关中北上的军队,南北夹击,会攻延安。显然,反共顽固派在酝酿着一个大的阴谋。为了及时制止事态的发展,我们又开展了一次强大的宣传攻势。一方面向边区军民广泛揭露顽军的阴谋,动员大家提高警惕,严阵以待;一方面给朱绍良、傅作义、邓宝珊、高双成、胡宗南、蒋鼎文等人,连续发了十多份电报,大声疾呼,有的电报是用“万万火急”的特急电发出的。毛泽东同志在修改电文时,反复强调这样几点:一是指出这一阴谋如果付诸实施,“则不独三边糜烂势难避免,即国共关系亦难保不受严重之影响”;二是指出“三边地方安谧,无增兵之必要,粮草奇缺,无驻大军之可能,逆而行之,必有后患”;三是严正声明,“如何师不惜决裂,则蔽部唯有坚持自卫立场”。

鉴于形势实在严重,在展开宣传攻势的同时,毛泽东同志指示我,迅速把一支实力相当雄厚的部队调到了三边一带,加强了与对方抗衡的力量,并在致对方的电报中公开申明:何师无故南下,我军不得不防,这部分兵力调动,完全是为了自卫。如何师停止南下,我部也一定很快返防。对方见无机可乘,又自感理亏,加上邓宝珊、高双成等从中斡旋,又一次可能危及整个边区安全的阴谋也被粉碎了!

尽管如此,在有的地方,顽固分子的某些阴谋,还是暂时得逞了。如关中的店头镇和淳化县城都是在这之后相

继被顽军攻占的。

在发动武装进攻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在拼命制造舆论，企图把破坏团结、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罪责加在我党我军身上。一九四〇年二月国民党天水行营政治部编印了一本《中共不法行为及破坏抗战事实纪要》的小册子，完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胡说什么摩擦事件是由于我党我军的“不法行为”引起的。为了揭破顽固派的欺骗宣传，让各界人民明了事实真相，毛泽东、王稼祥等决定，针锋相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同年四月，以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的名义，将当时我们已经获得的六个国民党党内文件，集印成一本小册子，公开发行。这六个国民党文件是：《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置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小册子的书名是《摩擦从何而来》，书的扉页写了一篇《引言》，其中写道：“摩擦之发生，非偶然之事件，而有正式文件为之指导，已为事实所证明”。“本书所利用之《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件，即系最好之说明。”“我们发表此等事实材料之目的，不仅为将社会人士所关心之摩擦问题的真相披露，且为希望颁发此等文件和发动此等事件之有关方面，为民族国家利益打算，以抗战团结为重，正式取消此等文件，认真制止此类事件”。事实最有说服力。这本小册子一发行，各界人士恍然大悟，疑团顿释；反共顽固派则气急败坏，手忙脚乱，狼狈不堪。

一九四〇年夏天以后，陕甘宁边区周围稍微平静了几

个月。当时许多同志真诚地希望国民党当局会从此改弦易辙，以民族解放事业为重，不再干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事。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暂时的平静掩盖着一场新的更大的风暴。从这年九月开始，顽固派构筑包围边区的碉堡封锁线，历时八、九个月，才大体完工。这条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北接长城，东迄河滨，绵亘数省，其规模之宏大，有类万里长城；而其纵深宽度，且凌驾于当时驰名全球的马奇诺防线之上。封锁线分为五道，每道之间相距数十里，整个封锁线的纵深达百里以上。每道封锁线由一个接一个的碉堡群所组成，每个碉堡群，有一至二个母堡，还有许多个子堡。碉堡群多构筑于可通行之道路、开阔地或制高点。每座碉堡大的可容一连人，小的也可容一排人。碉堡的形状有圆的、四方的、六角的、八角的，有二层、三层的。每座碉堡的周围有一道道散兵壕、外壕和鹿砦。各个碉堡群之间，有战沟相通。这种战沟宽约丈余，车马可通。其工程之大，并不亚于碉堡本身。碉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例如洛川至中部县相距不过八十里，第一道封锁线的碉堡就有五百十八座之多。以后的实践说明，这大规模的构筑封锁线是顽固派的一种新的磨擦方式，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利用这条封锁线，在军事上加强警戒，阻挠行人通过，发现边区工作人员外出，不是捕捉，便是射击；在经济上对边区进行封锁，禁止一切物品进入边区。对于一般商人、脚户，也不放过。除了公开扣留、没收其人畜、财物以外，还纵容兵匪沿途抢劫，以至行人裹足，交通断绝。但是，顽固派构筑的这一个个

碉堡群，终究无法阻挡住历史前进的步伐，相反，倒成了他们反共反人民的罪证！

在加紧构筑碉堡封锁线的同时，反共顽固派对边区的武装进攻，也并没有停止。仅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驻关中地区的国民党预三师等部，就向边区境内发动了七、八次进攻，强占了近二十个村镇。我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到严重损失的消息传来以后，他们更加得意忘形，气焰嚣张。洛川的国民党军政当局，竟在我边区大门口召开军民大会，庆祝他们血腥屠杀我新四军官兵的“伟大胜利”。有位军长召集联保主任训话时，还不加掩饰地叫嚣：“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皖南事变”的硝烟未散，国民党一〇九师的三二七团，便配合保安二旅等部，于这年一月底二月初，先后两次发起进攻，强占了我郿县的姚渠等地。按当时统计，在大约三年的时间内，顽固派通过发动两次反共高潮，先后侵占了我镇原等四座县城和为数不少的村镇，打死打伤我军八百余人，给边区军民带来了严重损失。但是，在边区军民的英勇反击下，顽固派不仅在政治上丧失了全国的民心，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在军事上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边区军民共消灭顽军二千余人，缴获枪枝三千四百余支。给予顽固派以应有的回击。

一九四〇年底，毛泽东同志写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全面论述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在毛泽

东同志政策和策略思想的指引下，一九四一年五月，留守兵团对于反摩擦斗争的得失和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使全体干部结合斗争实践，受到一次生动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思想的教育。与此同时，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揭露了两年多来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的摩擦事件，译成外文，向全世界人民披露事实真相，以驳斥顽固派的造谣中伤。文章的题目是《谈陕甘宁边区的形势》。全文约四千字，在比较全面地叙述和分析了边区周围顽固分子在各个时期制造摩擦的主要方式、特点和一些重大事件以后，还严正申明：如果顽固派继续执迷不悟，挑起事端，我方只有被迫自卫。毛泽东、张闻天等审阅和认真修改了这篇文章。毛泽东把文章后面的一段话，即“那末，我们必然以武装力量，配合饱经斗争的有组织的民众，给他们（注：指顽固派）以应有的教训，我们完全有把握和他们作持久的斗争，并予以有力的回击”。改写成：“那末，也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唯有准备自卫，予进攻者以坚决的反击。但这完全是不得已的，只要反共派稍有觉悟，我们仍准备同他们言归于好。”这样一改，语气既坚决，又很策略。看完全文，大概毛泽东觉得言犹未尽，又增写了这样一段话：“劲光留守后方，责任重大，为使前线战士安心抗战起见，对于反共派捣乱后方之行为，不能不采取自卫步骤，用以保护后方之安全。反共分子的内战计划，将丧失全国的人心，我相信，他们的计划是必然要失败的。”文章经余光生译成英文发表，并对外广播了。

一九四一年夏季以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陕甘宁边

区周围虽然再没有发生重大的军事冲突，但是，小的摩擦事件却仍然到处发生。到了一九四三年五月，形势又急转直下，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狂叫“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调集了六十万大军，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同时准备对华北、华中八路军、新四军发动进攻，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党中央、毛泽东亲自领导边区军民，运用各种方式，对国民党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同时抽调部队，大大增强了边区的防御力量，终于迫使顽军改变了大规模进攻边区的计划。这时，我虽然还在延安，也参予了一些工作，但由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已经成立，按照联司首长分工，对于反摩擦斗争，我已经不负主要责任，详细情况就不赘述了。

忆长征中的红军干部团

宋 任 穷

一九三四年，在敌人对我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中，我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撤销了五军团十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调到瑞金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这个科是训练军队高级干部的，学员不多，不过一、二十人。现在记得的有程子华、张宗逊、郭天民、杜中美、袁良辉等同志。长征开始前夕，成立红军干部团，我被调到该团工作。

红 军 干 部 团 成 立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一方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出发前夕，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组成红军干部团。这四所学校是：红军大学（又名赫西斯^①大学，以在广州起义时牺牲的苏联赫西斯烈士的名字命名）；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又名彭扬步兵学校，为纪念彭湃、杨殷二烈士而

^① 又译赫西史。

命名)；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又名公略步兵学校，为纪念黄公略烈士而命名)；特科学校。中央军委任命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同志为红军干部团团长，我为政治委员。参谋长是钟伟剑同志，遵义会议以后为毕士梯同志，又名杨林，朝鲜人。干部团下设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按照原来四所学校的性质，彭杨、公略两所步兵学校编成三个步兵营，一营、二营培养连排长干部；三营培养连政治指导员；四营是特科学校编成的特科营，培养炮兵、工程兵、机枪干部；红军大学编成上级干部队，培养营团军政干部。四个营的干部是：一营营长李荣，政治委员丁秋生；二营营长黄彦斌，政治委员苏启胜；三营营长林芳英，政治委员罗贵波；四营营长韦国清，政治委员黄金山。上干队队长肖劲光，政治委员余泽鸿。四个营和上干队都设有军事教员、政治教员和文化教员若干人。全团共一千多人。

干部团随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行动，归叶剑英同志直接指挥。我们这个团的学员都是从部队选调上来的、有战斗经验的班排长以上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一些战斗。因此，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尽量利用行军宿营或部队整修的间隙，对干部进行训练。如进行过遭遇战、伏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袭击等军事科目的训练。由于连续行军疲劳和战斗频繁、紧张，这种训练时断时续。可以说，干部团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所培训红

军党政干部的学校，长征途中陆续为部队输送了一批干部。遵义会议以后，部队进行了整编，中央把一些老同志送到干部团，由我们保护和照顾。如董必武、徐特立两位老同志，还有成仿吾、冯雪峰、李一氓等同志都到了干部团。毛泽东同志对陈赓同志和我讲：对董老、徐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

董老和徐老年纪比我们大得多，长征途中和大家一样同甘共苦，他们很少骑马，经常把马让给病伤员骑。徐老还常常照顾他的警卫员。大家对这几位老同志都十分尊敬、关心和爱戴。每次行军、宿营，我们都要认真检查，看看董、徐二老和其他几位同志到了没有，问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如何等。

长征开始时，中央后勤队伍非常庞大，携带了大批行李、辎重，包括修械所、印刷所、X光机医疗器械，还有不能用的大炮等，“罐罐罐罐”很多，活象大搬家。这些都由干部团等部队负责警卫、掩护。蒋介石得知红军转移，即调集粤、湘、桂、黔各省地方军和一部分中央军对我进行围追堵截，在湘粤边界、湘南、湘江附近连设四道封锁线，企图全歼我军。在数十万敌人穷追不舍下，这种大搬家式的行军，不仅使干部团，而且几乎使所有战斗部队都变成了掩护队。部队庞大、累赘，行军速度缓慢，一天走不了多少路。为了隐蔽，经常夜行军，走山路。山间小道蜿蜒崎岖，部队拥挤不堪，我们沿途处处被动挨打。疲惫、饥饿以及接连不断地与敌人战斗周旋，对我军是严峻的考验。就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广大红军英勇奋战，边

走边打，从福建、江西出发，经广东、湖南，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渡过湘江，到达广西境内。过湘江时，我军同敌人打了一个大仗，八军团被切断了，没有渡过湘江，伤亡很大，几乎全部损失了。在王明错误路线指引下，我军离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才短短三个月，已折损过半。

这时，毛泽东同志极力主张断然放弃长征出发时的原定计划，即一方面军到湘西与贺龙、任弼时、肖克同志率领的二、六军团会合。因为蒋介石已经觉察到我们的意图，调集了十几万大军等候在湘西。毛泽东同志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决定向川黔边境挺进。这样可把十几万敌人甩在湘西，红军才能摆脱险境。这时，我军紧缩编制，丢掉了不必要的辎重，对主力部队进行了充实。这样做，我军有了转机，接连攻占了贵州东部的许多县城，于一九三四年底抵达乌江南岸。

架浮桥渡乌江

干部团在贵州黎平休整后，经锦屏、施秉、黄平等县，跟随中央军委纵队抵达乌江南岸。在猴场附近举行了联欢晚会，迎接一九三五年元旦。次日，由一军团二师四团团团长耿飏、政治委员杨成武同志率领部队强渡乌江，准备抵贵州北部后，夺取遵义、桐梓。干部团奉命派出特科营工

兵连参加搭浮桥渡乌江的任务。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两岸高山望不到顶。陈赓、韦国清同志亲自率领特科营工兵连，星夜急行军六十里，赶到江界河渡口，砍竹、伐木、扎竹排。由于乌江水深流急，河底石头大而光滑，桥桩难以固定，几次被急流冲走。工兵教员谭希林和何涤宙同志，对架桥很有经验，他们想了不少办法，最后用竹篓装石头，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河底，以此代锚，才固定住了浮桥。经过紧张战斗，终于克服了器材缺，工具少，军情急，时间紧的种种困难，把浮桥架到了乌江对岸。我中央纵队和各军团迅速渡过乌江，直下遵义。

在遵义，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对几乎断送革命和红军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进行了批判，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接着，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王稼祥同志从革命不断受挫中逐渐认清了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对之产生了强烈不满。在遵义会议上，稼祥同志旗帜鲜明地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在关键时刻立了功。记得我军再次攻克遵义后，部队稍作休整，中央军委在天主教堂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正式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都来到会场，由张闻天同志传达。同志们听了传

达后，一扫过去的疑虑和不满情绪。个个称快，同声赞好！有的甚至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对吃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苦头的红军指战员们，这是激动人心的大喜事。从此，红军长征才从千难万险中找出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这时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红军，士气之高昂，信心之坚定，是前所未有的。

为了尽快摆脱几十万敌军从四面八方对我红军的围追堵截，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红一方面军展开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我军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仗打得非常机动灵活，经常出奇制胜。为了打乱敌人的部署，调动敌人，我们四渡赤水，围贵阳、逼昆明，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使他们对我们的去向捉摸不定，被我们调遣得团团转。这时，我们已经开始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

激战土城和再克遵义

四渡赤水期间，干部团直接参加打了两个仗。一个是在一渡赤水之前打土城，一个是在二渡赤水之后再克遵义。

前一个土城之战是场恶仗。土城位于贵州西北部的赤水河畔。遵义会议以后，中央即决定红一方面军向黔川边境集中，准备在四川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这时，敌人为了阻止我军入川渡江，调集滇、川、湘、黔和蒋嫡系部队约二十万人，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企图歼灭我军。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军由遵义附近进抵贵州西北部的赤水一带。在土城枫村坝、青杠坡与敌人发生激战。首先由三军团、五军团投入战斗。当天中午，战斗异常激烈，干部团奉命增援，整个战斗由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亲自指挥，我们的对手是敌四川王牌军郭勋祺部和潘佐部，他们有六个团的兵力，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又依托坚固工事，占据有利地形，后援部队也上得快。在我军猛烈攻击下，敌一部被击溃。但是敌居高临下，我们只能仰攻。陈赓同志令特科营重机枪进行掩护，我团学员端着步枪向上冲锋。敌人打过来，我们打过去，有时同敌人进行肉搏战，打得十分激烈和艰苦。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干部团的同志们打得很勇猛、顽强，眼看攻到了郭勋祺的指挥部附近，但又被敌增援部队的炮火压了下来。我团又发动了几次进攻，均未奏效。一直打到黄昏，一军团一部来参战，但我阵地已经缩小，我军难以展开战斗。正在敌我僵持不下、难解难分之际，朱德总司令亲临战场视察，觉得再打下去对我不利，立即命令我军后撤。当天深夜，我军一渡赤水河，向南开往四川边境古蔺一带，暂时甩掉了敌人。

敌人怕我军向北抢渡长江，长江南岸沿线各城镇和渡口，早已陈重兵把守，被我甩在赤水河东岸的郭勋祺等部迅速追了过来。我军硬打不利，即由四川古蔺、叙水一带，移师转向云南东北部。阴历大年三十，我们到达云南扎西。除夕夜晚，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下了一夜，山山岭岭、沟

沟壑壑，全被大雪覆盖。我军在扎西一带稍作休整。

这时，干部团上干队的政治委员余泽鸿同志，由中央决定调到四川开展游击战争。他是四川省长宁县人，曾在上海作地下工作。一九二九年，任党中央秘书长。我们在扎西分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川南特委宣传部长、川南游击队政治部主任和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政治委员。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不幸牺牲，时年三十二岁。余泽鸿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我们都很怀念他。

干部团参加打的后一个仗是再克遵义。我军到扎西后，遵义附近敌人兵力薄弱，我军又二渡赤水河，进占贵州桐梓。中央军委指示，“坚决消灭娄山关之敌，乘胜克遵义城”，并指示夺取娄山关，是“开展战局的关键”，“对野战军顺利转移至关重要。”

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位于娄山之巅，四面群山如剑，是川黔交通的险关要道。我三军团第十三团和一军团第一团攻克娄山关，击溃附近之敌。这天，我干部团奉命由桐梓出发，一天走了一百二十里，由上干队接替三军团第十三团扼守娄山关。我团其余全部奔赴遵义城西南，与一、三、五军团一起，对蒋军周浑元部以及吴奇伟两个师展开激战。敌一部固守遵义城石羔咀西南端制高点老鸦山。在老鸦山战斗中，三军团十团张宗逊团长负伤，钟伟剑参谋长牺牲，只有黄克诚政委一人在指挥战斗。陈赓团长和我带着干部团刚进入阵地，便顶着打。我们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配合十团消灭了一部分敌人，敌残部撤退，我军夺

取了老鸦山。一、三、五军团主力歼灭了遵义城内外的敌人，敌残部溃逃。遵义被我第二次攻克。这一仗俘敌三千余人，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是长征以来遵义会议以后打得最漂亮、战果最大的一次胜仗。

土城战斗和再克遵义的战斗，打得都很激烈。在土城战斗中干部团损失不小，伤亡百十来人，令人十分痛惜。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个优良传统，一向非常爱护干部，重视培养、训练干部。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是这样，在长征途中也是这样。红军干部团的成立，就体现了这种优良传统。以后，我就干部团在土城战斗中的伤亡较大一事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我说：“干部团的学员都是连排以上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同志同意我的意见，非常惋惜地说：“对啊，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哩！”

重架乌江浮桥

一九三五年三月中旬，干部团在贵州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时，担任渡河两岸的警戒、掩护任务。我们按中央军委指示，先派出一个营到河西，掩护中央军委渡河后的行动安全。全军渡河后，我们即随中央军委行动。这时敌人向川南集中，以为我们要北渡长江，我们却改变了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来了个出敌不意，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了。渡乌江时，我们干部团走在后面，三营担任守乌江浮桥的任务，并按照指示，等待殿后主力五军团过江

后即拆桥。当我们知道五军团已从另一渡口过江后，得到中央军委一位参谋拆浮桥的口头命令，把浮桥拆了。我们行军四十里到了宿营地。陈赓同志和我向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汇报了拆桥的事，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在场。他们听后十分焦急，把我们严厉地批评了一顿。

朱德总司令平时很少发脾气，这次很恼火地说：岂有此理！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五军团过江了，可是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九军团在后面，还没有过江呀！怎么能拆浮桥呢？这么大的行动，不请示报告，怎么就把浮桥拆了呢？

陈赓同志和我以及在场的三营政治委员罗贵波同志当即表示接受批评，并请示如何补救。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和刘参谋长指示我们，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起浮桥。我们坚决保证，在天亮以前一定要把浮桥架好。

朱总司令说：桥架好后交给九军团，他们过河后拆桥。如果明天早晨七时九军团还不来，你们就拆桥。

我们连饭也顾不得吃，我带着干部团三营和工兵连连走带跑四十里，急行军返回乌江边，天已经黑了。除少数人做饭外，其余的同志们砍竹伐木，重新架设浮桥。经过紧张突击，在天亮以前终于把浮桥又架了起来。我们眼巴巴等到七点，互相对了对表，核准确实是七点了，九军团还没有来，我们便拆了浮桥。大家虽然忙碌一夜未合眼，又连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但丝毫不敢耽误。我赶紧带着三营和工兵连拼命追赶已经走远了队伍，追了两三天才追上。后来才知道，由于当时不断行军打仗，敌情变化快，部队无法停下来架线进行电台联络，中央军委一时和

九军团联系不上。九军团为了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过江，和敌人周旋，未能赶来渡乌江。取得联系后，中央军委电令他们留在江北作为特别游击支队，转战黔西、滇东北一带，以后在云南会泽、巧家一带渡过金沙江与大部队会合。

抢 渡 金 沙 江

我红军主力渡过乌江后，为了迷惑敌人，曾虚张声势，佯攻贵阳，掉转头又直逼昆明，目的是调动敌军远离金沙江，准备挥戈渡金沙江北上。敌军乖乖地听我调遣，蒋介石坐镇贵阳，麇集了邻近数省的敌军，连滇军也赶来驰援。我主力却由贵阳以东神速掉头向西，与东来援贵滇军背向对进。四月下旬，我军进至昆明城下，国民党云南方面，因滇军主力东调，十分惊慌，只好以民团守城。

在向云南进军的路上，毛泽东同志的工作十分繁忙，很疲劳，为了多睡一会儿觉，他经常走在后面，不少时间同干部团一起行动。有几天连续下雨，有时大雨滂沱，河水浊浪滚滚，汹涌澎湃。毛泽东同志骑在马上，在雨中徐徐而行。他有些忧虑，对陈赓同志和我说：现在，我们先后把敌人的主力吸引到了贵阳和昆明，这便于我们采取突然行动，神速地抢占金沙江渡口，全军渡过金沙江，把敌人甩得远远的。这几天的雨下得不好啊！河水上涨，怕要影响我们渡江哩！

这时，我们才知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我军甩掉

敌人，抢渡金沙江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当时，国民党已集中七十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我追击，而金沙江两岸敌兵空虚。我们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决策很拥护，对毛泽东同志用兵的高超艺术十分钦佩。北上抗日，这是我们久有的热切愿望。这一愿望不久就能实现，曙光在前，我们心情激动，精神振奋。

那些天，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亲自研究渡江计划，并亲自进行指挥。

四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的指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我主力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立即挥戈北指，分兵左、中、右三路，平行向金沙江急进。一军团在左，经武定、元谋抢占龙街渡；三军团在右，抢占洪门渡；中央军委纵队居中，抢占皎平渡。五军团仍然殿后掩护。

五月二日，中央军委总司令部指示：令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带电台一部，“赶于四号上午到皎平渡架桥”；三军团十三团，“亦限四号上午赶到洪门口架桥”；一军团先头团，“限四号午前到达”龙街，并伪装成敌军抢占渡河点两岸，抢获全部渡船。

皎平渡位于四川会理县和云南元谋县交界的地方，是金沙江的重要渡口之一。干部团的同志们知道，这一仗至关重要，是关系我军安危的一次战斗。我们刚赶到云南禄劝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一起来到干部团，非常详细、具体地部署我团抢渡皎平渡的计划。周恩来同志在指示中，除了强调有利条件外，

也指出了种种困难，甚至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假如在抢占渡口后，我军后续部队跟不上，渡口又被敌人占去，那么，渡过江去的先头部队就会被切断，那就要准备独立作战，打一段时间的游击，以后再设法取得联系。为加强抢渡金沙江战斗的领导，由刘伯承同志担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挥干部团。

我和陈赓同志商量，以三营为先遣营。该营营长林芳英，政治委员罗贵波，副营长霍海元，共三个连加一个工兵连。我同刘伯承同志一起随先遣营行动，任务是当天急行军一百六十里，用一切办法抢占皎平渡渡口，消灭驻守敌人，迅速收集沿江船只，组织架桥，以便后续部队强渡。陈赓同志率两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为后梯队，当天，行军百里左右，即在中途宿营，保持体力，准备第二天渡江后继续前进。他们的任务是抢占渡口以北四十里的通安州，消灭四川西昌、会理方向可能来犯之敌，掩护中央直属部队和五军团渡江。当天，干部团全体指战员集合，我们向部队做了简短、有力的政治动员，要求大家保证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图，以及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坚决完成任务。同志们都清楚这次战斗对我军生死攸关，一致表示将不惜牺牲，去夺取胜利。

先遣营和后梯队同时出发。为了争取时间，出敌不意，先遣营一律去掉帽徽等红军标记，伪装成国民党部队，爬山越岭，强度急行军。对于沿途遇到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和民团等，都全部应付过去，不予理睬，留待后续部队去消灭他们。这样既可以尽快抢占渡口，又可以保持我

军行动秘密，不被敌人察觉。因此，沿途行军精神集中，行动神速，没有战斗。

傍晚，我们到达离江岸渡口五、六十里处，这个地方叫沙老树，在这里稍作休息。路不好走，想找个向导。我们三营战士佯称国民党军队，抓住了一个肥头大耳的大胖子。

“你是干什么的？”我三营战士问他。

他说：“我是区公所的。靖卫团（地主武装）的团总让我到江边送命令，为了防备共军过江，把渡船都烧掉。”

这个情报很重要。三营马上派人把这个大胖子送到刘伯承同志和我这里。大胖子向刘伯承同志鞠了一躬，毕恭毕敬地说：“长官，从哪里来？我是区公所的秘书。”

伯承同志说：“红军快来了，我们要赶到江那边去！”

大胖子说：“红军虽然离这里还远，为了防备红军在这一带渡江，我刚接到上级一纸命令，把我区沿江所有船只全部迅速烧掉，以免被红军利用。”

我们急忙问：“烧船的命令发下去了没有？”“船烧掉了没有？”

他说：“没有。我正要去江边办理这件事，命令还在我手里哩。”

我们问清了情况后，就明白告诉他：我们就是红军，现在就要船。并且严正警告他：“要是渡口少了一只船，拿你是问！”

这个胖家伙霎时大惊失色，呆若木鸡。我们命令部队押着他一起走。

当地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队恨之入骨，我们稍做工作，便纷纷主动向我们提供情况，给了我们许多帮助。从他们口中，我们得知，渡口对岸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队驻守，只有一个收税的关卡叫厘金局，还有一个保安队，不过几十条枪。这样，一个连的兵力就足以收拾他们了，过多的部队反而施展不开。群众还告诉我们，皎平渡渡口南岸正停着两只木船。

当时，决定三营一个连为先遣连^①。刘伯承同志立即命令先遣连轻装前进，猛扑江岸，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船只，控制渡口，强行渡江；三营的其余两个连和工兵连就地做饭，随后迅速跟进。

我马上派罗贵波和霍海元同志率先遣连直扑江边。约半夜十二点，他们抢占渡口成功。立即利用找来的两只船，把一个排送到江北岸。因为我军行动神速、隐蔽，敌人完全没有料到来得这么快，因此毫无准备。我先遣连渡过金沙江，赶到对岸厘金局时，里面正在砰砰啪啪打麻将。当地群众领头去叫门，说是来纳税的；他们正玩得热闹，有人吆喝道：深更半夜来纳税，不开门，明天来！

群众向来十分痛恨厘金局，上去一脚把门踢开。我们的人进去，缴了保安队的枪，没收了厘金局的全部税款，完全控制了渡口两岸。我军干净利索地抢占了皎平渡渡口，无一伤亡。

^① 先遣连连长是肖应棠同志，他在抢渡金沙江的战斗中表现很勇敢，是有功的。肖应棠在以前的回忆录中说先遣连属二营，这是他记忆有误。我和罗贵波同志都清楚地记得，先遣营是三营，而不是二营。

得到先遣连胜利占领渡口、消灭敌人的报告时，刘伯承总参谋长同我正骑在马上，在黑夜里行进。他一边走，一边极其兴奋地对我说：同志们今天走的这个路程是一百六十里。这样难走的山路，又是黑夜，人一天怎么能走这样的一百六十里哪？可是，我们走到了，不仅走到了，还过了一条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敌人！其所以能够如此，靠什么？主要靠政治，靠同志们的高度政治觉悟，靠我们的党，靠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靠群众。没有这些，就根本做不到！你说是吧？

我同意地点点头，回答说“是这样。”

刘伯承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高兴的神情，愉快的语调，表现出他对党，对红军广大指战员和劳动群众的极其深厚的感情。刘伯承同志的作风非常深入细致。他对先遣营的整个行动，从作战计划，途中找向导，直到很小的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布置得很周密。这对先遣连以及整个先遣营胜利完成任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这次袭击金沙江皎平渡渡口的成功，还应当归功于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英勇无畏，归功于当地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和有力支援。

我们边走边谈，很快到了皎平渡渡口，这时已经天亮，我们除了向通安州方向派出前哨连执行警戒任务外，便立即一面继续收集船只，一面准备架桥。金沙江江面虽不很宽，但水深流急，既不能徒步涉水，又无法架桥，只能乘船过江。当时只夺得两条船，哪里够用呢！寻找船只成为我们的后续部队能否渡江的关键。我们发动群众赶快收集

沿江船只。在群众帮助下，我三营在二、三十里的江岸边，又找到了四只破船，我们好高兴啊！马上组织人力进行了修理，连同原来渡口的两只，一共有六只船。这时，我们向朱德总司令发电报告：“皎平渡有船六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以后经仔细寻找，我们又得船一只，共有船七只。以后全军就靠这七只船渡过了金沙江。

奔 袭 通 安 州

干部团先遣营夺取金沙江皎平渡渡口是艰苦紧张的。陈赓同志率领的干部团后梯队主力夺取皎平渡以北四十里的通安州，既要由宿营地赶到江边，又要接着抢渡金沙江，过江后又强行军奔赴通安州，同敌人打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也是极其艰苦、紧张的。

通安州是一个不大的山地街镇，它居高临下，形势险要，占据这个高地，就可以直接控制住皎平渡渡口。当时，通过电报我们已经知道，进袭金沙江的另外两个渡口——龙街渡和洪门渡的船只都被敌人烧掉，那里江面较宽，又有敌机轰炸，无法架桥，我军不能从这两个渡口渡江。全军都将由皎平渡渡江。因此，夺取通安州成为保证全军安全渡江的关键一战。

刘伯承同志和我是清晨到达金沙江畔的，陈赓同志率领干部团后梯队主力由宿营地赶到江边已是中午。

刘伯承同志命令：不惜一切牺牲，必须坚决把通安州拿下来，保证掩护全军安全渡江。

这时，我们还没有搞到七只船，为了迅速奔袭通安州，部队来不及休息，便立即组织分批抢渡。干部团除留先遣营防守渡口外，大部分主力部队由陈赓同志指挥，渡江后强行军向通安州进发。

从江边到通安州，只有一条很陡很窄的山间小路，盘旋在悬崖峭壁上，有一段路面仅能容一人通过，一面临深谷，一面靠绝壁。陈赓同志带领干部团在进占通安州的中途，遇到一些零星敌人袭扰。敌人在山头上向我部队不时打冷枪，并推大石头往下砸。冲在前面的同志，有的中弹牺牲，有的被大石头砸伤。后面的同志机警地贴着峭壁、死角躲闪跃进，终于冲了上去。一到通安州，便与刚从西昌、会理方向赶来的国民党军队遭遇。敌人有一个旅共两个团和一个迫击炮连，由旅长刘元塘亲自指挥，而我军只有一个团，敌我兵力悬殊。双方都力图抢占通安州。于是，在通安州山顶小镇上，打了一场极其激烈的遭遇战。前头部队一打响，刘伯承同志估计到形势严重，立即命令我带先遣营三营全部，火速赶到通安州，同我团主力一起战斗。

刘伯承同志再一次强调说：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战斗，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敌人，占领通安州，保证全军顺利渡江。

任务重大、紧急，我们跑步，奋力前进，黄昏时分赶到那里，敌我双方正在激战，对峙着。陈赓、肖劲光、毕士梯同志都正在紧张指挥战斗。

毕士梯同志对我说：仗打得很大，刚才已打到街上去了，我们缴获了敌人的迫击炮。因敌我兵力悬殊，我们刚

刚退了出来，敌人还没有消灭。

我传达了刘伯承同志的命令，陈赓同志和我再一次对干部团的同志们进行了政治动员。同志们斗志昂扬，纷纷表示死也要拿下通安州。由于敌人正面为开阔地，火力强，我们不便正面进攻。于是，我们决定二营在正面佯攻，把一、三营调到右翼包抄迂回，攻击敌人的左侧。全团上下行动迅速，坚决英勇，经过拼命争夺，我们占领了小高地，连续向敌冲锋，终于消灭了大部分敌人，生俘敌人官兵也相当多。敌人残部不支，向会理县城逃窜，入夜，我军占领了通安州。

通安州战斗是皎平渡战斗的继续，这两个互相联系的战斗是一个战役。这个战役的全胜，为我一方面军安全渡江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我们占领通安州后，全团便在街上住下，掩护全军渡江。中央军委对我们干部团胜利完成抢渡金沙江的任务很满意，予以通令嘉奖。第二天，全团开了庆功大会。

我红军除少数部队从其他地方渡江外，大部约几万人，都要靠七条船从皎平渡渡口渡江，组织任务十分紧迫繁重。为了加强对大军过江的组织领导，五月五日，中央军委组成以陈云同志为司令员、蔡树藩同志为政治委员的渡江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军渡江。

当天，朱德总司令来电指示：敌八日有到皎平渡的可能，为了避免被敌隔断或被敌两岸夹击的危险，部队务必不顾疲劳，兼程前进，“必须紧接过渡不得间断”。五日军委纵队已渡完，三军团“必须六号拂晓前开始赶到河边渡

河，限六号夜渡完”；“七、八两日为一、五军团赶来渡河时间”。

在渡江指挥部的指挥下，全军利用七只船，昼夜抢渡秩序井然。晚上烧柴火和点汽灯，金沙江两岸灯火通明。江两岸高山耸立，是个狭长地带，敌机进不来，只能在高空飞来飞去，盲目丢几颗炸弹，并不影响我军渡江。虽然滇军跟在红军后头追，但因有五军团殿后，在顶着打，还有九军团在迷惑敌人，掩护我大部队过江。因此，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抢渡，红一方面军的大部人马都从皎平渡过了江。

巧渡金沙江这一壮举，成为古今中外军事史上的奇迹。红军全部渡江以后，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金沙江南岸，渡江船只已被我全部烧毁，他们只好望江兴叹，徒呼奈何！他们所得到的仅仅是几只烂草鞋！我红军宣传队还为此编了一个叫《烂草鞋》的戏，在部队演出过。这个戏，热情歌颂了我军的机智勇敢和大无畏的革命乐观精神，尽情嘲笑了敌人的愚蠢和怯懦！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扼守安顺场 强渡大渡河

干部团在通安、会理稍事休整后，继续北上，朝大渡河方向前进。国民党曾狂妄断言：红军过得了金沙江，过不了大渡河，共产党必蹈石达开的复辙，会全军覆灭。

大渡河江面虽不很宽，但是水流湍急，河床里由上游冲下来的大石头很多，河里的漩涡一个接着一个，河水翻腾着，咆哮着滚滚流去，比金沙江凶险得多。两岸没有堤，沿河两岸一百多里全是悬崖峭壁，很少有老百姓居住。只是沿着河边有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其他地方几乎没有路。安顺场是大渡河的一个重要渡口，无法架桥，找到的几只船又太破旧，难以很快修复。为了抢时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果断决定沿江而上，抢渡泸定桥。毛泽东同志的部署是：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率领，从安顺场继续渡河，再沿河东岸北上；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率领，从安顺场出发沿河西岸北上，两面夹河而进，夺取泸定桥。安顺场距泸定桥三百多里，中央军委要求我们的部队三天以内一定赶到。大渡河东西两岸的红军，日夜兼程向泸定桥疾进，夜里打着火把行军。

五月下旬，一军团首先抢占安顺场阵地，并对敌人实行警戒。二十六日，中央军委命令我干部团接替大渡河沿河被我主力部队占领的几个地方，担任警戒任务。五月二十七日，我团由洗马姑，经老雅贤、小水，开往安顺场方向，接替第一团在老铺子的警戒任务；经老雅贤留一个营，接替第六团的一个营在该处的警戒任务；经小水溪留警卫排，接替第二团一个连的任务，并接收、监护警戒任务所在地附近的大渡河船只，掩护一军团北上。我团留三营于河南岸守安顺场渡口，其余主力从安顺场过江，接过杨得志同志领导的那个团的防，扼守渡口。杨得志同志率部随刘伯

承、聂荣臻同志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策应西岸北上的大部队攻占泸定桥。安顺场是个小镇，背靠峻巍的营盘山，面对咆哮奔腾的大渡河，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翼王石达开，就全军覆没在这里。我们干部团在这里坚持了两天，守住了安顺场和沿河接过来的警戒阵地。我主力部队抢渡泸定桥成功，大部队胜利过了大渡河。国民党断言我们要做石达开第二的妄想破产了！我们在完成掩护、堵住追兵的任务后，于三十日黄昏出发，追赶主力部队，向四川天全、芦山前进。

翻 越 夹 金 山

四川天全、芦山那一段更艰苦了。那里到处是灌木丛林和茂盛的杂草，有的地方还得通过原始森林。原始森林里因树木茂密，又有葛藤缠绕，我们边开路边前进。根本没有路，以后的所谓路，都是我们红军数万人的脚探着走出来的。过了宝兴，就看到高耸入云的大雪山，那就是有名的夹金山，海拔四、五千米，这是我们长征路上翻越的第一座雪山。那时是六月，山下天气很热，大家只穿一身单衣。可是，山上常年积雪，寒气袭人，又山高缺氧，爬山十分困难。行军时，有人先在前面探路，在路的两旁插上路标，否则，掉到雪谷里就出不来了。爬山时，大家互相关心，互相鼓励，宣传鼓动工作做得生动活泼，大大激励了同志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山上此起彼落，不时有人在喊：

“快走啊！”

“要走好！踩着前面的脚印走！”

“不要坐下去呀！”

“走啊，不要停啊！”

“小心雪谷，不要掉进去啊！”

“同志们啊！鼓足劲儿来，一口气冲过这一段，翻过山去就好了啊！”

“啊！……”

这些鼓动性极强的喊话声，回荡在夹金山山顶和峡谷，给同志们以力量和信心。大家冷得浑身发抖，张口喘着粗气，一步步艰难地往山上爬。不能停留，更不能坐下，因为一坐下，可能冻僵而死，永远起不来了。有的同志身体病弱，歪歪斜斜快要倒下了，大家上前扶一把，这位同志得救了，革命又多了一个人的力量。这喊话声已过去整整五十年了，每当忆起红军长征过雪山的情景时，仿佛重新听到它们在耳边回响，心里总是热乎乎的。

许多经过长征的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党的政治鼓动工作是非常有力量的。每当遇到一种困难，甚至看来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经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许多常人不敢想象的事，我们都迎刃而解了。还有一条，我们善于依靠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这对我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当时可能做到的物质准备，去战胜困难，取得胜利大有好处。我们在过雪山前，就曾向当地群众详细询问了雪山上的情况和过雪山时的注意事项，大家有了思想准备。当时不可能搞到棉衣，也没有御寒暖身的酒，就披上毛毯，煮些辣椒汤，每人准备一根拐杖等。越过雪

山，天气果然又暖和起来。我们继续向北前进。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懋功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我们到达四川懋功，红军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是全军指战员盼望已久的事了，如今变成了现实，大家那个高兴劲儿，那样热烈的场面，真是感人至深，令人难忘。两个方面军的同志们互相体谅、关心、帮助，非常亲热。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显得很疲惫，吃的穿的都比较困难。四方面军人比我们多，物资也多，他们从各方面主动帮助我们。李先念同志当时任四方面军三十军政治委员，他率三十军和九军一部在懋功迎接我们。三十军的同志们一见到我们，就拿出很多吃的用的东西送给我们，对我们热情帮助，关怀备至，还招待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这两支红军部队，亲如兄弟的无产阶级友爱团结精神，是难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

陈赓同志原在四方面军工作过，早在鄂豫皖苏区就同张国焘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作过斗争，在上海治伤时还向中央揭露过张国焘的问题，因此，张国焘很恨他。这次见面后，张国焘问陈赓同志：一、四方面军两相比较，各有哪些长处和短处？

陈赓同志是个很直率的人，从不模棱两可，隐讳自己的观点。他说：我在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干过。依我看，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好。四方面军能打仗，干部、战士的战斗作风好，一方面军除了能打仗外，政治工作、群众

工作比四方面军做得好一些。

张国焘听了很不高兴，要整陈赓同志。张国焘的为人，由此可见一斑。

坚持北上的正确方针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活动，并与国民党亲日派加强了勾结。我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响应，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坚持内战的反动政策。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红军继续北上，以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这一决策，得到全党全军的热烈拥护。窃据四方面军主要领导职位的张国焘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惯耍阴谋，野心很大。他把四方面军视为己有，自恃人多，兵强马壮，看到一方面军经过长征苦战，实力消耗很大，瞧不起一方面军，便向党伸手争权。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会师后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当面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但一返回营地，便在军内散布谎言，挑拨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歪曲党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张，并借口所谓“组织问题”、“统一指挥”问题故意拖延四方面军北上行动。八月初，中央又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肯定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正确性。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对张

国焘进行了说服教育。张国焘表面同意中央的方针，但实际上坚持错误，对抗中央的决定，继续反对北上，坚持要南下，背地里大搞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活动。

毛儿盖会议后，党中央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北上。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右路，包括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在左路，包括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干部团随党中央在右路。

成立新的红军学校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决定干部团同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改编成新的红军学校。红军学校的校长是倪志亮，政治委员是何畏，教育长是李特，政治部主任是刘少奇。由于张国焘要整陈赓，陈赓同志无法在红军学校工作，被调到一军团任师长。这时，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等几位老同志都到红军学校政治部工作。干部团编成红军学校的特科团，代理团长是韦国清同志，我任政治委员。下辖四个科：骑兵科，科长苏进；工兵科，科长谭希林；炮兵科，科长冯达飞；机关枪科，科长王智涛。

红军学校编在右路军。我们是从四川卓克基，经马尔康、梭磨、马塘、打鼓到达毛儿盖的。这一带是藏民区，一切都与内地不同。红军进入这里之前，由于反动派的欺骗和威胁，驱使老百姓弃家逃走，我们象到了无人区，到

处找不到人，吃粮成了大问题。我们饿着肚子住在喇嘛寺。地里的麦子正在灌浆，还没有成熟，无法收割。我们常常每天只吃二、三两青稞，主要靠挖野菜和豌豆苗充饥。一有机会碰到老百姓，就立即展开工作，反复讲政策，作解释，解除他们对红军的疑虑。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在有的地方还帮助他们建立了革命政权。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情况大不同了，藏民们对我们依依不舍，不仅卖粮食给我们，还组织运粮队为红军送粮食。

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懋功，有这样一件事，就是中央军委政治部指示干部团为肖劲光同志平反，恢复其党籍。根据上级指示，由干部团总支书记方强同志召开总支会议，为劲光同志的冤案彻底平反，并代表组织和劲光同志谈了话。肖劲光同志遭受冤枉，被开除出党是一九三四年一月的事。当时他在中央苏区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个军区是由建（宁）黎（川）泰（宁）警备区发展起来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一进中央苏区，就搞什么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肖劲光同志被诬为罗明路线在红军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黎川失守和浒湾失利本来是王明左倾盲动军事路线造成的，却被毫无根据地说是肖劲光同志推行罗明路线的结果。因此，他遭到严重打击。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肖劲光同志五年监禁徒刑，并开除其党籍。由于毛泽东等同志坚决反对，劲光同志被关押一个月以后，即调到红军大学任教，教战术和政治两门课。长征开始，劲光同志任上干队队长。劲光同志虽蒙不白之冤，但他一直忠心耿耿，

积极工作。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为他平反，深得人心。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到毛儿盖时，让上干队的党支部讨论了取消肖劲光同志的处分问题，通过了恢复肖劲光同志党籍的决定。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央军委调肖劲光同志到三军团任参谋长。

穿 过 草 地

八月下旬，我们干部团随右路军先走四川松潘，又北行四十里，进入了杳无人烟、禽兽罕见的草地。那里青草遍野，一望无际；气候潮湿，经常雾气弥漫，几乎每天都要下雨。最难走的是沼泽地，只能踩着草根走，若陷入泥潭，便越陷越深，难以自拔，甚至没顶牺牲。我们就在这样的草地上走了七天七夜。大家穿着老羊皮，每天只吃三两粮，一两片烤羊肉干，主要靠吃青苗。能吃到青稞就是最好的饭了。有一天，董必武同志来了，我们用手指抓一点干炒青稞给他，算是最好的招待了。我们以班为单位自己找柴禾，晚上铺在地上就是床。当时最重要的生活用品是一个脸盆，烧水、煮饭、洗脸、洗脚，都用它。有的地区有原始森林，在靠近森林的地方露营，上面用布张起篷子，把布的四角用绳子拴在树上，人就在下面睡觉。一晚上都烧着火烤，仍然很冷。为了取暖，有的两人背靠背睡，第二天早上，或者一个人死了，或者两个人都死了。过草地时牺牲了不少同志。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吃得少，消耗大，个个瘦骨嶙峋，又要连续行军，有时还要打个小仗，

身体太弱的，实在支持不了。炮兵连有一位班长病了，用担架抬着他，我跟在他后面，也抬了一阵。他说：“无论如何不要再抬我了，我已经不行了，你们要多保持体力，胜利还要靠你们啊！”他把随身带着的粮食、牛肉干、毛毯都拿出来给我们，要我们继续往前走。他用微弱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走吧，别管我了，这些东西也许还能救活别人。”说完这话不久，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种壮烈情景，使人感动、心酸，令人肃然起敬！数十年过去了，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有一两天，经过一片草地，什么树也没有，我们要带着柴禾行军。

过草地七天中，我们没有看到一间房子。后来到班佑附近，第一次见到牛屎房子，这是用树木架起来，牛屎糊的墙，这是牧民放牧临时住的。右路军经过艰苦行军，穿过草地，到达四川西北部的巴西地区。

我们一些负责同志行军时骑马。看见前面掉队的同志就下来让他们骑，一匹马可以骑两个人。许多领导干部都是这样做的。我们红军讲阶级友爱，官兵平等，干部关心战士，帮助和体贴同志，这是我们政治思想工作的好传统，这比做长篇大论的空洞报告有力得多。抗战时期，我曾在敌后，遇到长征时干部团的一个学员，他一见到我就问：“你还认识不认识我？”

我说：“记不得名字了。”

他很生气地说：“长征时我在干部团，那时我病了，走不动路，还是你用马把我驮过来的。”

我对他说：“同志，这种情况差不多天天都有啊，哪能都记得呢？”

干部团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负责司令部总务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长征途中的总务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队一到宿营地，拱之同志忙着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顿病号，招呼大家烧热水洗脚等。部队出发前，她督促检查同志们打扫驻地，上好门板，归还借来的东西，做好各项善后工作。记得在过草地时，我的马丢了，驮在身上的粮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随着丢失了，拱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其他同志那里为我匀了一份，帮助我渡过了难关。她还在百忙中为我织了一条毛线围巾。拱之同志对干部团其他同志的照顾也是满腔热忱、无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缠过足，但是由于马匹少，在整个长征途中，她从来没有骑过马，完全靠一双“解放脚”一步一步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拱之同志不愧为一位革命女杰。拱之同志一生几经坎坷，但始终革命意志坚定，忘我地、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着。一九七三年，拱之同志不幸病逝。人民将永远纪念这位革命的老大姐。

粉碎张国焘的阴谋

不久，左路军主力也到达四川阿坝地区。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陈昌浩同志走在前面。张国焘顽固地认为北上不行，主张再过一次草地往南返，到天全、芦山一带发展。他到阿坝后就按兵不动。党中央经过讨论，决定还是北上。

张国焘一意孤行，对中央的多次决定拒不执行，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且打电报给中央，荒谬地要右路军也重新过草地南下。党中央曾几次去电，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只有北上才能使红军得到发展，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扭转革命所遭受的挫折，才能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迅速到来。张国焘却悍然不顾。他还密电陈昌浩，企图裹胁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全部南下。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同志同张国焘的阴谋进行了勇敢机智的斗争，为党立了大功。徐向前同志对张国焘的阴谋很愤慨，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怎么说也不能打。”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率领一、三军团和红军学校连夜出发，继续北上，避免发生武装冲突，迅速脱离险境。

不少同志对张国焘的罪恶行径憋了一肚子气，为了团结，强忍住没有发作。我对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同志和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同志讲：北上一定要把我们红军学校特科团带上，否则，我们开小差也要北上，那时候可不要因为开小差而开除我们的党籍。

红军学校特科团在凌晨三时左右接到北上的命令，韦国清同志和我马上集合全团学员准备出发。出发前，我们简要地向学员们讲了当前面临的情况：现在有两条方针，一条是向甘肃、陕北北上抗日；一条是回过头去向南，再一次过草地，大家看怎么办？

我们还明确地告诉大家：北上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北上的可以

留下。

“赞成哪一个方针？”我们问大家。

“我们要北上！”

“我们要北上！”

“要北上，不要南下！”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于是，特科团出发了。这时李德和我们同行。他是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遵义会议以前的长征中，一直推行王明错误路线，这时他也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不满，向我们说：我同你们中央一直有分歧，但在张国焘分裂的问题上，我拥护你们中央的主张。

红军学校的政治委员何畏，原为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积极追随张国焘，后来在延安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逃跑了。在长征路上，他一得知红军学校北上的消息后，便立即去报信，于是张国焘下了停止前进的命令。

我们摸黑走了大约二十多里路，天快亮了，忽然从后面传来命令：传令兵通过，部队原地停下。

这是陈昌浩同志派人送来的张国焘要南下，不准北上的命令。红军是很守纪律的，虽然大家对此命令异常不满，但部队还是就地停了下来。

这时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在红军学校前头，在半山坡上一块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来。王稼祥、洛甫、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也到了这里。我们都赶到毛泽东同志跟前。张国焘的追随者、红军学校教育长李特，

这时持枪带着几个人从后面追到这里。李特问毛泽东同志：现在总部政治委员张国焘同志来了命令要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

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指头按着板机，气势汹汹，气氛十分紧张。

面对李特的无礼威胁要挟，毛泽东同志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地同往常一样，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出发，对李特晓以大义，语气平稳、庄重，耐心地讲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指出在当时情况下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能南下。

毛泽东同志冷静而又坚定地说：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现在只有北上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而陕西、甘肃的敌人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毛泽东同志严肃地正告李特：彭德怀同志率领的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

毛泽东同志的严正警告，使李特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彭德怀同志在红军中享有能征善战的声威，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

最后，毛泽东同志恳切地对李特说：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

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甘孜、芦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我们前面走，欢迎你们后面来。

最后一句话，接连讲了三遍。毛泽东同志这一番话，语重心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不少同志还清楚地记得。

红军学校特科团的干部都是一方面军的，招收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李特看威胁右路军南下无望，便对毛泽东同志说：根据张国焘同志的命令，红军学校的学员要南下。

毛泽东同志说：可以，红军学校的学员回去跟四方面军南下吧。我们特科团的干部要北上。

毛泽东同志顾全大局，为着团结，让四方面军的学员回去。当场命令韦国清同志和我，集合特科团全体同志。毛泽东同志对学员们讲了话，讲话的内容同前面讲的大体相同。毛泽东同志在讲话结束的时候反复强调说：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现在回去不要紧，将来还要回来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

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坚持原则，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粉碎了张国焘妄图挑起红军打红军的一场阴谋。

从随营学校又改为红军学校

四方面军的学员走了以后，特科团只剩下我们几十个干部了。我们到甘肃俄界宿营。甘肃军阀鲁大昌师在腊子口堵住了我们的去路。腊子口形势险要，突不破这一关，就打不开通向陕甘的路。我们的先头部队从侧面攀登上去，夺取了腊子口，大部队顺利通过。到达甘肃哈达铺，部队休整了几天，进行改编。因为当时兵分左右两路，朱德、刘伯承、罗炳辉、董振堂等同志在左路军，我们右路军只剩下几千人了，便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毛泽东同志兼政治委员。下辖三个纵队，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二纵队司令员彭德怀兼，政治委员李富春；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治委员邓发。我们特科团改为随营学校，属三纵队，校长是陈奇涵，我任政治委员。从哈达铺开始，以后打仗不多，但是敌人的骑兵对我们威胁很大。到了吴起镇，就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了，大家都很兴奋。接着，我们到了瓦窑堡，这里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所在地，大家更高兴了。以后随营学校和后方卫生部队合起来，又改为红军学校，周昆任校长，我任政治委员。不久，我调到红二十八军工作，由原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接任红军学校的政治委员。

塞北抗日回顾

高 克 林

一九四二年六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跟我谈话，说中央决定叫我到绥蒙任区党委书记。

绥蒙地区是我党一个战略要地。它北靠蒙古、苏联，南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东是晋察冀，西南是陕甘宁边区。所以，这个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后大门，晋西北根据地的前哨阵地，晋察冀的侧背，是通向蒙古和苏联的要道，对于坚持华北抗战，保卫党中央都有至关重要意义。

兴 县 会 议

我接受党的任命，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到达兴县以后，中央晋绥分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题研究绥蒙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分局书记林枫、军区参谋长周士第、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琪、组织部长王达成以及罗贵波等。绥蒙参加会的有我、张达志、苏谦益等。这次会的目的是分析斗争形势，总结经验教训，确定绥蒙工作方针。张达志在会上作了汇报。

当时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战，正处于十分紧

张艰苦的时期，国际法西斯势力极端猖獗。德国希特勒攻占了欧洲十几个国家以后，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悍然发动对苏战争。同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者为实行其“以战养战”的政策，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动残酷的“扫荡”。它把绥蒙作为进攻苏联的跳板和侵华的基地，在“蒙疆”地区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和“施政跃进运动”，采取所谓“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式”、“穿梭式”的暴虐手段，频繁地进行惨绝人性的“三光”“扫荡”。日寇对大青山根据地一方面进行频繁的“扫荡”，一方面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一齐进攻的所谓“总体战”。在大青山和蛮汗山周围修筑了几十条公路和一百多个据点，并在主要山口沟道挖封锁沟，筑封锁墙。为了断绝群众和我军的接触，敌人大规模烧房并村，派兵驻守。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在日寇一九四二年大扫荡后，除部分游击队、武工队外，我主力部队从大青山突围，转移到偏关一带。

在这一时期，坚持大青山抗战的同志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作出了英勇的牺牲。但从工作上来检查，正如《晋西北区党委关于绥远工作的指示》中所说：“绥远区党委没有认真地研究与执行一九四〇年四月中央对于绥远敌占区工作决定，对于绥远敌占区形势认识不够，在隐蔽政策的执行上不坚决、不明确与不彻底。领导作风上粗枝大叶，党政军干部间存在不团结现象。由于这些原因，不仅妨碍了更大成绩的获得，而且使某些工作受到了不必要的损失。”

面对严酷的斗争现实和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兴县会议重新确立了绥远斗争的总方针和基本任务。会议重申“坚决执行隐蔽政策是绥远党的总方针”，确定“绥远党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坚决依靠群众，团结各种抗日力量，坚持游击战争，蓄积准备力量，以待有利时机。”

为了加强对绥远区和雁门区的统一领导，会议决定将绥远和雁门两区合并为塞北工委。取消绥远和雁门区党委名称，原雁门地区设塞北工委辖下的雁北地委。我是工委书记，胡全是副书记，委员有姚喆、张达志、白成铭、苏谦益、曹振之；成立塞北军分区，姚喆为司令员，郭鹏为副司令员，我是政委，张达志为副政委；取消大青山骑兵支队番号，原骑兵第一、第二、第三团番号不变；原晋西北第五军分区部队编成塞北军分区雁北支队。塞北行政公署由杨植霖、苏谦益为正副主任。党政军机关暂驻偏关。

渡 河 谈 判

一九四二年十月前后，我到偏关不久，晋绥分局派我到府谷县和高致凯谈判。高致凯是驻守府谷县城的国民党二十二军的一个团的团长。府谷和晋绥边区二分区一河之隔，影响我一、二分区和总后方的安全。为此，分局派我和高致凯协商搞好统一战线关系，共同抗日。

高致凯原是我党领导的许权中旅的教导营营长，当时我是旅党委书记兼教导营教导员。渭华暴动初，他投靠国民党。这次我去见他，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为了给谈判增

加友好的气氛，分局决定王希宁同志（我的爱人）随我一同渡河谈判。以拜访老朋友的名义去进行谈判。我们对谈判成功充满着信心，同时也作好了发生意外的准备。

北风萧萧，黄河水寒。吃过早饭，我戴着棉帽、穿着旧棉衣，和希宁一起渡过黄河。黄河西岸的便衣特务星星点点，把我俩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中。高致凯没有把我们带到团部，而是作为老朋友带到他的家里，他避开他的随从人员，和我们进行了友谊的谈话。我说的大意是：“大敌当前，抗日为重。枪口要对着日本兵，不要和共产党、八路军过不去”。高致凯身披武装带，不安地坐在太师椅里。可能出于爱国的心理，也可能出于对过去的忏悔，他痛快地答应了。他说：“依你说的办，我是够朋友的，请你们放心。”我和高致凯就这样达成了口头默契。王希宁和高致凯夫人谈天说地，我们完全处在朋友的热情之中。随后，高致凯叫他夫人亲手为我们擀面。吃了一顿家乡细长硷面。饭后，高致凯提醒我们说：“时间不早了。”我知道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们起身和他告辞。高致凯一直送我们到黄河边，等我们的渡船走远了，他才回去。我们就渡河直返保德县。第二天，返回到偏关县。

十一月我到偏关后，召开工委会议，传达贯彻兴县会议精神，落实毛主席“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参加这次会的有苏谦益、张达志、曹振之和从敌后突围出来的有关同志。根据会议决议，我们向绥南发了指示信。十一月二十日，我们又就落实兴县会议精神向中央晋绥分局写了汇报信。

偏关会后，我先后到党、政、军的机关单位看望干部和战士，给他们讲形势，讲政策、鼓士气、增强胜利信心。随后，我和苏谦益到雁北地区看望干部和战士。骑马到老营堡时，我的胡须已结了冰茬，冻成一团，连说话都感到困难。我用手把胡子上的冰珠搓溶，才把嘴“解放”了。到了雁北地委，见了雁北支队长刘华香和地委诸同志，向雁北的干部传达了兴县会议精神和塞北工委要求。在这里我住了三四天。我随二营到前线视察后，又回到了偏关。

晋绥分局的指示信

兴县会议之后，我们对塞北工作的总方针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似乎还有问题。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晋绥分局及时向我们发来了指示信。

克林同志并转工委：

十一月二十日的信与工委给绥南的指示信，都看过了。关于塞北工作，我们有下列意见：

(一)在斯城红军的胜利与轴心军在北非失败的情形下，日寇北进侵苏的危险是减少了(只是在目前)，对中国的压迫必然加重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扫荡是会更加残酷的。日寇的侵苏危险虽是减少了，但并未放弃北进的企图，尚未放松侵苏的准备。这是必须认识清楚的，即使在日寇不立即侵苏而仅仅备战的情形下，是不会允许我在侵苏前线的绥远站稳脚步的。侵苏之前，必先驱逐我在大青山之势力，今年大举清剿绥中即是明证。因此，今后之活

动地区的缩小，民兵的减少，财政粮食的更加困难等，必须充分地估计到，一切工作布置应依据这种形势出发，才不至在困难到来时张惶失措，悲观失望。从给绥南的指示信与工作布置中可以看出你们对日益增加的困难局面尚有认识不充分之处。三、四年来敌人向我内地进攻时给了我们绥远很好的发展机会，这种有利时机现在已过去了。今天绥远党的面前是摆着日益困难的局面，但有利的时机也许还有，只有在今天保存了自己，蓄积了力量，才能在有利的形势下再求发展。但今天最重要的还是准备应付严重局面的到来，准备在最坏的形势下，坚持工作与布置工作。

(二)今年二月区党委关于绥远工作指示中已明确地指出“坚决执行隐蔽政策，是绥远党的总方针”，对于这一方针不应有丝毫的动摇。给绥南的指示信中采取“积极开展对敌伪全面的政策攻势”的方针是不合隐蔽政策的。这并不是说对敌伪不要进行宣传工作，而是宣传方式不应该是“突然地进行全面的进攻”，因为任何突出暴露力量，都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不合长期埋伏蓄积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动员秘密党员以群众面目出现实行优抗，必然会使这些党员突出，同样是与上述政策不合。指示信中把干部教育与群众教育放到政治攻势下面，亦欠妥当。对于隐蔽政策，希工委能好好研究，务使各种斗争形式，组织形式适合于隐蔽政策。根据地的作法，铺张的作风，应从思想上有所转变。

(三)关于目前工作，除了以前谈了的外，尚有下列补充意见：

1、为了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工作，必须改善与群众的关系，深入群众工作，更进一步地依靠群众，使

群众从自己的经验中，认识共产党、八路军与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使他们自觉地爱护我们，帮助我们。这里减轻人民负担是很重要的。这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认真的精兵简政，实行正确的财政政策，在绥远同样是重要的。组织上更加一元化，把任务相同的机关力求合并，取消一些空架子，如财政机关与供给机关之合并，党的机关与司令部合并，后方杂务人员特别是马匹的大量裁减，要痛痛快快地主动地精减一下，以适应新的困难环境。绥南征粮一万二千石，是否可能？绥南能负担公粮的人口有多少？其中给敌伪负担的有多少？在全体人口中真正负担公粮的占百分之几？今年收成如何？公粮以外其它负担多少？总之。把你们的公粮政策和其根据以及征收中的反映，把以上材料请与去年比较，详告我们。减轻人民负担，蓄积民力，仅仅是群众工作的消极方面，主要的是积极地深入地进行群众工作，把群众工作提到党政军的重要工作日程上。领导机关必须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指导下级如何进行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尽可能地解决农村中的各种问题。应恢复红军时代群众工作的光荣传统，每到一宿营地，必须找群众深谈，逐渐提高其觉悟程度，每个干部应找群众领袖深谈。如果能在我们所活动地区从思想上教育成数千个甚至万数个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八路军的同情者。这不仅是伟大的工作成绩，而且对于坚持绥远工作，克服困难有决定的意义，这必须使每个干部深刻的了解。但这一艰巨的教育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轻而易举的事。首先要在干部中进行教育，经常给以积极指导，及时地检查工作，纠正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逐渐充实工作内容。如果千篇一律，以一套抗战八股生硬地给群众灌输，会起相反的扰民作用，绥远党的基础还很薄弱，应在深入群众工作中，在

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建立党的据点，进行深入的教育。过去，我们得罪了群众，应去道歉，损害了群众应给以赔偿。

2、开展伪军工作对于坚持绥远工作有重大的意义，对于过去伪军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望作细密的总结，以教育干部。对防共第一师采取争取方针是对的，但指示中笼统地提出“伪防共第一师是民族敌人”的口号，似又与争取方针相矛盾。过去许多伪军关系是我们自己作坏了。

3、在今后绥远的环境下再不是象过去那样进行如何扩大的问题，而是如何在更加困难的环境下保持力量坚持武装斗争，以待有利时机的问题。一九四三年虽是接近胜利的一年，但也是空前艰苦更加困难的一年。中央指示我们准备再减少一半部队，保存精干，以待有利时机。因此，主力减员后不再补充，两连合为一连，干部抽出来送后方学习，部队采取小连制。这就需要培养和提拔地方干部，更加依靠地方干部，把好的地方干部派回重要地区组织秘密不脱离生产的小武装，并给以武器。至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绥远的环境下（四周是敌占区的游击区）亦应改变其内容，不是象根据地那样，普遍地组织民兵建立游击小组，而是使各种武装都群众化、地方化，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同群众关系弄好，以得到群众的掩护。

4、干部教育是目前的重要工作。干部的不安心与缺乏信心，主要是由于对形势与工作方针没有透彻的了解，以及对过去领导上的不满。这就需要对目前形势，我们的任务方针，工作方法，按级适当的传达，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工委对过去的工作应进行适当的自我批评，使上下级干部互相信任。因此，不要急于派干部、部队出去，首先要进行深入的教育，使其在思想政治上有了转变再派出

去。派出去的部队以短小精干为宜，干部要强。对地方干部应有计划地培养，任何不信任地方干部的观点都是不对的。

只有在困难环境下，保存了力量，才能在有利时机到来时，大量发展；只有今天的工作做好，才能准备更好的条件迎接顺利的环境。

(四)最后要求：

(1)工委把如何深入进行群众工作当成领导上的重要任务去深刻研究。

(2)塞北地区应基本上执行晋西北行署所颁布的各种法令，但工委应根据塞北各地的具体情况加以研究，提出修正方案，一般地要求应较根据地不同些。

(3)保存干部是今后领导上应注意的重要问题，应有计划地送一些干部到延安与分局党校学习，以备新的环境下的需用。

(4)应设法使姚白早日回来，并把各种新的布置给绥西传达，使其及早有准备。

(5)必须彻底肃清在供给制度上不正规的现象和向群众抓一把的自杀的政策。否则，所谓节省民力积蓄力量，依靠群众坚持工作等等都是空话。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

分局的信从国际形势的高度分析了隐蔽政策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并给我们工作进行了具体而明确的指导。这是塞北抗战胜利的有力保证。

艰 难 的 岁 月

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是大青山抗战最艰难的岁

月。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依照中央晋绥分局指示信精神，坚持隐蔽政策，积蓄革命力量，创造有利条件。

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隐蔽政策。首先，实行精兵简政。党政军机关合并，使机关人员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四；军分区精减整编，使战斗人员、生产人员增加到了百分之八十四；把骑兵三团的二个连改编为步兵团，使主力更加地方化和群众化。这样，不仅适应隐蔽斗争，而且减轻了财政困难。其次，改进组织形式。建立了地委以下的秘密党委，使党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分开；政权与武装相结合，专员兼县长随地方武装活动，县长、区长分别兼县、区游击队长。同时，改变斗争策略。主力军开展游击战争，地方武装改为便衣活动，区以下政权干部以群众面目出现，党员干部完全职业化（以各种职业为掩护）、社会化（在群众中认亲交友，建立社会关系）、群众化（便衣化）。

日寇残酷的“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给抗战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后方机关干部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七两黑豆，口都吃黑了。一匹马的料由一天四升减到二升。在敌后工作的同志更困难。他们经常靠挖野菜充饥，许多同志脸色变青、浑身浮肿。长时间的缺油缺盐，许多同志都得了夜盲症。有时搞到点粮食，因无磨子只得用石头砸碎煮成面糊吃。在绥西的石虎子山上，姚喆带领部队在零下二十多度的雪地里，掘土三尺，搭起茅庵御寒。他和战士以野菜充饥，用冰雪止渴，在山上共同渡过了一九四三年的春节。

我们的部队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得以生存，是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保护分不开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给部队运粮食、送情报、养伤员。武川县的群众白生宝得知部队没有石磨，吃不上面粉，竟把三百多斤的两扇石磨偷送到四十多里外的部队驻地。蒙古族人民利用日寇不进群众家的条件，经常掩护我军人员，为我军保存粮食布匹。为了打破敌人造成的经济封锁，我们从一九四四年春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我和偏关整风的干部一起到山坡开荒种地，种了很多莜麦，获得了大丰收。部队除种地外，还养猪、磨豆腐，使部队生活得到了改善。

偏 关 整 风

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作了整风报告后，在全党开展了有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一九四三年一月，晋绥分局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发出《关于整顿三风的指示》。塞北工委和塞北军分区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到一九四四年七月，以分批轮换的方式，在山西省偏关县开展了整风运动。

参加整风的区以上干部共约二百多人。在工委的领导下，组成了三个整风大队。塞北工委、塞北行署直属机关干部编为一个大队，大队长先期是苏谦益，后期是杨叶鹏；雁北地区党政军干部编为一个大队，大队长先期是胡全，后期是李登瀛；军队干部编为一个大队，大队长先期是张达志，后期是曾锦云。十一月，从大青山陆续调回的干部也分别编入整风队。

偏关整风开始时，我把绥中地委书记贾长明同志调到工委任秘书长，并由他负责整风的日常工作。

偏关整风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四三年三月到七月。这一阶段是学习整风文件，总结对敌斗争经验，更好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工委负责同志和大家一道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对照《中共中央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和晋绥分局给塞北工委的《指示信》，检查工作中的失误，明确今后工作的正确方针。通过整风学习，广大干部和党员对绥蒙地区和雁北地区敌占区形势及坚决执行隐蔽政策的意义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如何开展敌占区斗争思想上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认识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批判了不关心群众利益在财政上“抓一把”，不充分发动群众而片面强调“武装打天下”等错误作风；认清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害性，批判了某些忽视大青山地区特点而生搬其他老根据地经验的做法。这段整风运动使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的收获很大。普遍受到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一步认识了过去工作错误的根源，找到了克服的途径和方法，为抗日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阶段从一九四三年八月到一九四四年二月。这一阶段把整风和审干结合起来，错误地进行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和“反特”斗争，给整风运动带来很大的恶果。一九四三年五月，晋绥分局发出了《关于整风学习中配合审查干部的指示》。八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要

求参加整风的人都要写历史自传和揭发材料，开展坦白运动。并要求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争取失足者。绥蒙地区干部担负着抗战的繁重任务。我担心抢救运动会把干部队伍搞乱。于是，我请示晋绥分局：“绥蒙干部整风是否以学习为主，弥补过去游击战争学习较少的缺陷，或者推迟抢救运动。”晋绥分局给我的答复是：“抢救运动是全局性的配合行动，是中央的统一部署。”我的意见受到当然的否定。后来，我们才知道抢救运动完全是康生一手炮制的。康生以极左的面目干扰整风。他说我党内特务如麻，把许多抗日的先进组织和我党的外围组织都划到敌人的阵线，竟把河南、陕西等地党组织也打成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十月中旬，偏关也开始了“抢救运动”。康生把在延安用逼供信得到的不实之词，不时向偏关发电报。说某某人是“叛徒”，说某某人是“反革命”，搞得人人自危。起初，我对这些电报半信半疑。一天，延安来一份电报说高鸿光同志原是河南“红旗党”的党员，我问高鸿光：“你是不是红旗党员？”他说：“是！”就这样，高鸿光同志成了“特务”。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到一九四四年一月，整风队以班为单位，分别对每个同志进行审查。不少人被打成了“特务”、“叛徒”。许多人行动受到限制。有的同志从敌后回来，还没来得及汇报工作，就被打成“反革命。”过春节时，偏关一片沉闷景象，大家心情都十分忧悒。我作为工委主要负责人，对偏关整风出现的错误应负重要责任。究其原因，一是马列理论水平不高，对党中央政策没有真正理解；二是初到游击区，

对干部底子不清；三是轻易放弃了自己主张不搞“抢救运动”的正确意见。后来，毛主席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提出了九条甄别方针。我们立即转入甄别阶段，迅速纠正整风中的失误。以后，我对错误处理的同志多次表示过歉意。

一九四四年二月到七月，是偏关整风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中心内容是消除“抢救运动”的不良后果，对坦白运动中提出来的问题一一甄别，作出结论。各整风队都成立了甄别小组，对整错了的同志进行平反。不少同志甄别后离开整风队，重新回到前线。七月，工委召开了民主大会，对整风运动进行了总结，号召大家放下思想包袱，振奋革命精神，把主要精力转到对敌斗争方面来。偏关整风虽基本结束，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有少部分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及时作出结论。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些同志尽管背着沉重的包袱走上了前线，但在对敌伪的英勇斗争中表明了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黄 树 坪 战 斗

一九四四年中秋节刚过，晋绥军区《七月剧团》到偏关东川向群众慰问演出。正看戏时，群众报告驻在五寨方向的日寇向偏关方向扫荡。当时，司令部只有一个警卫连的兵力。塞北工委、塞北军分区机关及警卫连只有在山地与敌人周旋。家属、后勤人员向河曲县方向转移。我们部队急行军从下午一直到第二天拂晓，到达偏关东南方向的黄

树坪村北山上。正准备吃饭时，发现了敌人。当时敌人打了讯号弹，我们才发现司令部已撞入敌人的包围圈。我军在十分疲劳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受到敌人猛烈的袭击。张达志和白成铭带领一路突围，我和苏谦益也带领一些机关的同志分头突围。我的警卫员官宝子把他的马让我骑，他被敌人俘获，以后听说被杀害。太阳快落时，我到了河曲县的崔家地堰村。在这里，我们的部队又集结到了一块。经清点人数，政治部主任曾锦云、组织科长谢礼荣、侦察科长姚典训、副官处主任张丰福等四十多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这是大青山我军一次重大损失。

游击根据地的恢复

在贯彻毛主席关于“挤敌人”方针的过程中，塞北工委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游击根据地不断恢复和发展。

在日寇疯狂扫荡的艰难岁月里，大青山的几十支抗日游击队遭到一定的损失，我一、二团被迫转移偏关一带。但抗日的游击战争仍在坚持和继续。姚喆带领的三团和教导大队化整为零，在哈拉沁一带打游击。白成铭、奎壁（蒙族）等仍在绥西坚持斗争。归武县李容玉领导的游击队也同日寇不停周旋。

为了加强党对敌后工作的领导，塞北工委多次向敌后分派得力干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我们派绥中专员程仲一带领导部分干部重返绥中地区恢复工作，坚持抗日斗争。后因形势恶化，他转入绥南进行抗日活动。一九四三年夏，

我们又派任建斌等同志到绥中开展工作。他在归绥东北一带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抗日活动。同时，我们学习晋西北“挤敌人”的斗争经验，不断向大青山地区派小部队、武工队、工作组。一九四三年四月，我三团派一个连和两个工作组到绥中地区活动。同年六月，我一团向和林、归绥、凉城三地交界地区派出和林武工队；我二团向归绥平川派出武工队。这些武工队、工作组在我地下工作者的策应下，一方面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广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争取伪军、伪组织人员、中小地主和开明人士。活动在归绥城郊的武工队以茂密的高粱为掩护，昼藏夜出，开展抗日宣传，打击特务汉奸。敌人惧称他们是“高粱王”。和林安正福武工队剿匪安民，取得群众支持；巧用计谋，发动群众进行合法斗争；方式多样，争取伪军和伪政权为我服务，使活动区域不断扩大，队员由九人发展到一百多人。党中央、晋绥分局高度评价这个武工队。毛主席称安正福武工队是敌后斗争的方向。到一九四三年秋，我武工队已同伪保安二团四大队、旗下营警卫队、榆林子警察队等都建立了一定关系，并通过这些关系给我们送情报、买军用物质。

一九四三年冬，副团长黄厚率领第二团的两个连自偏关进至蛮汉山地区，并依托绥南常到绥中活动；第一团从右玉西山进至蛮汉山地区活动；第三团自萨拉齐山区向北活动。在大青山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由化整为零转为集中兵力，开始公开出击敌人。到年底，绥中地区南自平绥路、东至拐角铺、北至韭菜沟、西至蜈蚣坝的地区内，

我们都可以活动了。绥南的蛮汉山和绥西的井儿沟一带的工作，也开始恢复起来了。

一九四四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苏联红军取得了德寇的决定性胜利。日寇也陷入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为了进行垂死的挣扎，拼命集结日伪军对大青山进行野蛮的“清乡”。这时，我们抓住有利时机，坚持反“清乡”斗争，使日寇龟缩在归绥城内，不敢轻举妄动。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的艰苦抗战，到一九四四年八月，绥西、绥中、绥南三块游击根据地已恢复到一九四二年七月日寇大“扫荡”之前的局面。

一九四五年六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总路线。中国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各解放区战场上，对日寇连续出击。绥蒙地区也进入了抗战的反攻前夜。在八路军进攻归绥之前，党中央和晋绥分局对绥蒙反攻态势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作了一些组织准备。一九四五年二月，中央决定将塞北工委改组为中共绥蒙区委员会，我任区党委书记。同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晋绥分局之下设三个区党委，在晋绥军区之下设三个二级军区，在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之下设吕梁、雁门两个行署和绥蒙政府。张宗逊任吕梁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解学恭任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我任雁门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吕正操任军区司令员，许光达任军区副司令员，孙志远任军区副政委；张达志任绥蒙区党委书记

兼军区政委，姚喆任军区司令员，苏谦益任区党委副书记。同时，中央军委还决定设立南北两线两个指挥部。南线指挥部由张宗逊、罗贵波、解学恭负责，指挥三、四、七、八四个分区部队；北线指挥部由吕正操、高克林、许光达、孙志远负责，指挥二、五、六、十一四个分区部队。晋绥军区司令部直接指挥一分区等部队，机动使用。

八月九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接着，朱总司令连续向解放区各武装部队发布进军令。从八月十一日开始，我晋绥军区南线和北线同时行动，攻占归绥。经过四天战斗，我军连续攻克了归绥外围的毕克齐、察素齐、旗下营、陶卜齐、白塔等地。八月十八日，我军开始攻打归绥旧城。我晋绥军区九团、二十七团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勇敢地攻入旧城大什字街口、把敌人主力包围在小教场。这时，国民党三十五军三十一师和挺进队会同由包头东退的日军，与归绥城内的伪蒙军里应外合，夹击我军。我军被迫撤出城外。归绥城被国民党傅作义部夺走。

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但一场和平、民主、进步与内战、独裁、反动的斗争又开始了。

港九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战斗历程

张 子 燮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突然袭击珍珠港、香港和新加坡，同时向南太平洋和整个东南亚猛烈进攻。香港笼罩在炮火之中。

香港在太平洋战争中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英国在远东的海军基地之一。日本南进，夺取了它，就可以从日本本土经冲绳、台湾再向前伸展，一直把菲律宾、新加坡以至印度尼西亚等地联成一线，无论兵源、物资的运输，都可以源源不断地由香港中转；况且它又可与东面的台湾、西面的海南岛形成在海上对中国大陆的包围圈。这样，日本的海军、陆军就可以互相呼应了。

当时，中国抗战已进入艰苦的第四个年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在国内抗击着大部分日本的侵略军；在香港，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则已围绕着抗战的目的，积极开展各种活动。

香港是中国的领土，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把它割让给英国，这时已是一百年了。香港的中国人一向是有强烈的民族感和爱国心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和全国人民心连着心。

从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起，华南日军已有陆续南调之势，到十二月初，有为数约三万的日军在距离深圳河边境仅八里的地方，沿广九铁路，宝太公路，惠深公路两侧集结。同年十二月八日，日军进攻香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已有所准备，立即组织精干队伍陆续开赴新界，打击日本法西斯。

(一)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在香港战事发生的头几天，即紧蹙日本军队之后，分别从惠阳方面和宝安方面分批插入新界。一路由沙头角进入南涌、鹿颈、乌蛟腾、七木桥、横山脚各村，以后渗透到上水、粉岭的坪洋、鹤藪等地和八仙岭山区；一路过大鹏湾上吉澳岛，稍事歇脚，然后再登船到西贡入赤径，上北潭涌、黄宜洲、黄寮地、榕树坳，以后活跃在沙田观音山吊草岩一带，并经坑口到黄竹湾、牛池湾，伸入九龙市区中心；一路则到元朗八乡、十八乡，以后东连大埔，西出荃湾，互相呼应。最早分头进入新界的主要有以下一些同志：周伯明、蔡国梁、黄高扬、曾鸿文、何鼎华、陈坤、江水、林冲、肖华奎、卓觉民、黄冠芳、刘黑仔、刘春长、黄仕明、罗汝澄、文贯、黄思明、欧巾雄、莫浩波、邓华、卢进喜、庄歧洲、曾方、叶凤生、赖章、赖连等，其他还有不少武工队战士和民运人员。当控制了各条交通路线之后，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又陆续派员进入港九。

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决定成立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部，下分五个大队，即主力大队、东莞大队、惠阳大队、宝安大队、港九大队。二月初，陈达明同志带着总队政委林平、总队长梁鸿钧、副总队长曾生的命令到新界，即和蔡国梁、黄高扬三人，在西贡开会，成立港九大队（六月才公开宣布），把原来陆陆续续派到新界活动的部队统一起来。

开始的几个月，部队还未立稳脚跟。日本侵略军的统治也未就绪，他们忙于巩固港九市区的治安，对于新界，无暇顾及。当时新界的土匪，多如牛毛，大股的百数十人，小股的三、五个人，有土生土长的“梅花马”，有内地窜来的“大天二”，有属于国民党组织的，有属于黑社会流氓集团的。总之，不下数十股之多。新界所有乡村，几乎无一不遭抢掠洗劫，老百姓苦不堪言。他们见游击队到来，也误认为是土匪。因此，我们游击队首先应付的还不是日本强盗，而是要清除匪害才能取信于老百姓。我们对土匪首先是争取，争取不成，分化瓦解，都不成，就消灭之，或驱逐出去。为了对付众多的土匪，最早的时候，我们亦不便公开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于是，肖华奎就打出“肖”字号，黄冠芳挂着“冠”字号。对方还不知我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新界各区，以上水和沙头角、西贡和大埔两个地区同土匪的斗争最为激烈。肖天来匪帮盘踞上水、坪洋一带，黄竹青的喽罗出没边境海上。我林冲部队和刘培部队分别对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争取不过来，就夺取他们的地盘，赶走了他们。而黄冠芳、江水、刘黑仔等则先后消灭了黄

慕容、陈乃寿、张明仔、邓芳仔、李观姐、镰仔佬、槽仔佬、谢天带、黄福等多股土匪，然后封锁着西贡区，以后不准匪特进去。我们的方针是：剿匪肃特，发展组织，巩固地区，坚持抗战。

在主要的交通路线上，凡有零星土匪，我们都要肃清。黄冠芳、刘黑仔部队在剿匪之初，首先就把出没于西贡到牛池湾一线的五、六股散匪逐个消灭。在大埔也消灭了几股土匪。曾鸿文部队在荃湾至元朗的山路上，同土匪队伍战斗，一天之内打死了七个土匪，沿途就平静得多了。

肃匪工作，持续了大半年时间，总计驱逐和消灭土匪不下数百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从此，老百姓感激我们，商旅往来，难民疏散，堪称方便。

在肃清土匪的同时，港九大队建立了一个较大规模的民运工作系统。在建队初期，就有四个民运区委。负责民运区委的有：刘智明、罗广志、庄歧洲、杨凡、欧巾雄等同志。民运人员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教育群众，帮助各区各村组织起游击小组、游击队之友、妇女会、青年会、儿童团、夜校、读书会等。并进一步组织加强各村的民兵队伍。这些群众组织在各方面协助游击队工作或起到游击队的耳目作用，甚至供给情报、捉汉奸匪特，也部分依靠他们的力量。当时民运人员的分布情况是：鹿颈村有蔡华，沙罗洞有张惠文，黄毛应有梁雪英，上水有邓锡元，三桠有陈瑞，横岭头有张英，梅子林有李凌，坑口有林苑明，北潭涌有袁卓峰等。

除肃清土匪和开展民运工作之外，港九大队还进行了

以下的重要活动。

第一，收集和抢运英军撤退时遗弃的武器弹药和战略、生活物资。香港是孤岛，九龙新界除北面与大陆连接外，东南西三面濒临大海，日军从北面全线压境，英军战败投降，全都成了日军的囊中物。但是战事结束得很快，日军仓促间也难把战场打扫干净，枪枝武器，散落不少。我部队加紧收集，武装自己，同时输送到总部去，武装内地的游击部队。主要是黄冠芳、江水在沙田、西贡，并深入到九龙、香港的筲箕湾、鲤鱼门一带去收集，曾鸿文在元朗周围收集。除沿途拾获之外，并向老百姓收买了不少枪支。收买的价钱都是很便宜的，有些机关枪、步枪，不论好坏，平均一律五元港币一支。

除枪支外，还在沙田、西贡山路上挖掘出不少地雷。海面上也捞获到水雷。加上以后拆卸堕毁美机的机关炮和战斗中缴获敌人的武器，港九大队的武器是精良的，什么冲锋枪、水龙机、红毛十、驳壳、左轮、手榴弹，应有尽有。爆破用的TNT炸药也不缺少。

几年来，我们从香港源源不断地向总部输送了各种物资。

我们的运输线水陆共有三条：一是由水路经西贡到大鹏湾的吉澳、红石门，入盐田至淡水、惠阳；二是从陆路经过沙头角，也是转往淡水、惠阳；三是陆路，由元朗入宝安、东莞。这几条线，以后亦经常畅通。靠了它们，充实了我们整个部队的武器和各种物资。

第二，抢救文化人，使他们安全转移。原来从上海等

各个沦陷区集中到蒋管区桂林、重庆等地的文化人，因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特别是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到来，大量文化人被迫转移到香港，拿起笔杆继续抗战，并与国民党反人民反民主的行径展开斗争。香港沦陷后，中共中央即电广东省委、南委和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皇后大道中十八号粤华公司），指示要千方百计不惜代价把羁留香港的进步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抢救出来，免遭敌人毒害。廖承志等接到指示，先后在香港、宝安、惠阳等地召开一系列会议。一九四二年元旦前夕，林平、连贯、梁广、梁鸿钧、刘少文、乔冠华、曾生、王作尧、杨康华、黄宇等，也先后集中到总部所在地宝安的白石龙研究抢救文化人的工作。会议之后，立即展开行动。首先布置人员到新界边沿地区，准备接应。王作尧也派出最能干的交通员谢照、麦容、赵林、沈俭光、王彪等来往接送。香港市区的组织，按照每个文化人的住处，派人分别通知，约好时间、地点，逐个集中，分批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把他们带出虎穴，回到大后方。港九大队负责第一站工作，是从虎口抢出那些文化人，成功失败，关系重大。

抢救是有多条路线的，一些人经海陆丰然后转往韶关，或从海上经澳门转梧州或广州湾入桂林。在东江部队保护范围内的，主要由两条秘密交通路线护送出来。一条是蔡国梁负责，由黄冠芳、刘黑仔、肖华奎、黄青控制着的经西贡坐船到大小梅沙、上洞，入坪山、淡水、惠阳的路线。另一条是黄高扬负责，由曾鸿文、江水、林冲等开

辟的由元朗到宝安那条路线。著名的文化人茅盾、邹韬奋等人就是从这条路线走的。在被护送回来的文化人中，也夹杂着我们部队输送回来的干部和吸收参队的知识青年。我们除领队外，还每次都分配好一定的交通员和保卫员，沿途照应。如何为、何杰、梁超、罗广志等同志，都多次往返接送过不少文化人。

港九大队护送文化人到惠阳、宝安，以后的路程则由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及地下党分段分人包干负责，直至把他们送到大后方为止。

从一月到三月，被抢救的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估计总共有七、八百至千人左右。他们中有：茅盾夫妇、邹韬奋、胡愈之、胡绳、胡风、沈志远、刘清扬、廖沫沙、杨刚、胡仲池、任白戈、金仲华、宋之的、何香凝、柳亚子、李少石、廖梦醒、戈宝权、叶以群、于伶、羊枣、梁漱溟、范长江、夏衍、陈此生、萨空了、乔冠华、千家驹、张铁生、章泯、袁水拍，黎澍、周钢鸣、姜君辰、沈兹九、司徒慧敏、蔡楚生、王莹、谢和赓、郑安娜、许幸之、凤子、郁风、金山、特伟、叶籁士、殷国秀、高汾、张友渔、胡考、戴英良、丁聪、梁若尘、邓文钊、陈汝棠等。此外，还抢救了国民党官员陈策、吴铁城，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的夫人，陈济棠夫人，以及不少国际友人、香港大学教职员、新闻记者等。这件工作的胜利完成，对中国的文化事业有重要意义。

第三，营救盟军和国际友人，与盟军合作进行军事情报工作。香港既已沦陷，日军需要恢复市政及金融等工作，

因此，对港英一部分管理市政、卫生的官员和银行职员，教会的牧师、神父等继续留用，不予集中，除此之外，所有的英军战俘、政府文员、英国妇孺、印籍士兵等，都分别囚禁于七姊妹、深水步、亚皆老街、赤柱、马头围等几个集中营。这时，港九大队执行营救他们的任务，组成国际工作小组，黄作梅、江群好、郑隆、谭干、林展等，通过各种渠道，甚至通过教会的牧师、神父和其他各种可能的关系，深入到集中营里面，与战俘取得联络。先后救出了：赖特上校 (Colonel L. T. Ride) 和他的华人秘书李玉标，京中校 (Lt. coi. G. King)，谭臣警察司 (Mr. W. P. Tho - mh - Swptu. Ofoei)，祁德尊少校 (Major. T. D. el - agl ld) 等。也有许多英国士兵不甘心在日寇奴役下过牛马生活，在初期日寇管理还不够严密的情况下，主动逃出来，经我部队护送到后方。直到一九四二年底还陆续营救了不少自动逃出来的，其中有：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芬恩维克和摩利逊两人，英国陆军军官波生吉 (D. J. Bosengnet)，香港义勇军比尔斯中尉 (Lt. G. L. C. Pearce. R. A)，怀特中尉 (Lt. L. S. White. R. A)，祁德尊中尉 (Lt. G. D. Clagnt R. A)，英国士兵霍支斯 (P. Hodegs)，格尔拉夏 (A. Gallaher)，印籍皇家炮兵孟雅星 (MehngaSingk)，拉西加星 (Lashkar Singk)，拿瓦思特星 (Nauant Singk)，达立普星 (Da eip Singk)，山托先星 (Sant okh Singk)，印籍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清算处车夫搭拉星，屈臣氏药房车夫毛汉旬等。

这不过是开始阶段从集中营里营救出来的盟军和国际友人的粗略数字，至于后期营救的国际友人和美机师也有多人。

最轰动一时的是营救美十四航空队中美联合空军飞行员指挥兼教官克尔中尉（Lt. Aoneld W. Kerr）。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一日，克尔率领战斗机二十架、轰炸机十二架，从桂林飞袭香港启德机场。克尔座机中弹起火，他跳伞降落，大风使他飘到新界沙田观音山我游击队活动地区吊草岩附近。游击队小鬼李石和陈勋把他掩蔽起来，並报告当地民运人员李兆华及短枪队长刘黑仔，几经周折，转移了数个掩蔽地点，几天后由翻译谭干等把他带到西贡大队部。而日军则已出动千多人，把沙田、西贡各个山头包围搜索，对每个村落都作填空格式搜索，达十七天之久。敌人的行动，不仅是军事的，连九龙、新界的行政机关首脑，也亲自到各区区役所传达“训话”，恐吓中国职员，要知情者把美飞行员交出来，否则杀头。

两个多星期之后，克尔终于安全地由港九大队部送到东江游击队司令部，最后回到了美十四航空队。在大队部和司令部，克尔都得到蔡国梁大队长和曾生司令员的很好接待。克尔当时对《前进报》记者谈话和后来写信给东江部队，有这样的话：“为了救我，你们一定动员了许多我所看不见的力量。我要和你们作永久永久的朋友。你们的蔡大队长是能干的领导，黄冠芳队长是敌人心目中的头号大敌，刘黑仔队长是我再生父亲，谭翻译是我精神上一刻不可少的朋友，那女同志、小同志，我真愿意把他们带回美国去，

把他们的神奇本领亲自介绍给美国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我可以写本书描述我所知道的和感受到的一切。我还要把小同志给我买的糖果带回桂林给同事们看看（小鬼李石曾把仅有的五毛钱买了糖果给克尔吃，克尔给小鬼五十元，小鬼坚决不肯要）。一年后，克尔从美国寄给东江纵队司令部几本杂志，内刊有他自画的几幅漫画，描述他在港九上空脱险的故事。

港九大队于同年五月二十六日，又在大亚湾救护了五个盟国飞行员：勒夫哥中尉（Lt. W. Iefkoe），拉忽崇尔中尉（Lt. G. I averell），埃利斯上士（Sgi. H. Ellis），康利上士及史利斯上士。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六日，又救护了十四航空队的依根中尉（Lt. J. Egan）及美第三舰队飞行员克利汉少尉（rd. Lt. M. J. Crehan），均送回大后方。

几年来，根据不完全统计，营救了英国人二十名，美机师八名，印度人五十四名，丹麦人三名，挪威人两名，菲律宾人一名，苏联人一名，共八十九名。确立了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在国际上的威望，扩大了我们在海外的影响，更进一步加强了与盟军的合作。

一九四二年七月，英军在惠州成立英军服务团的前方办事处（它的总团部在桂林，赖特上校为总指挥），主任祁德尊少校致函东江纵队，要求派代表和他们讨论合作问题，并派出何礼文上尉（Major R. D. Holmen）到港九大队，要求协助调查和摄影集中营的位置，以便营救英俘。港九大队政委陈达明请示司令部批准后，即和英军

服务团取得联络。港九大队曾帮助他们在香港建立秘密电台，建立情报网，布置秘密交通路线，并帮助一些英国工作人员坚持地下秘密工作，不断向他们提供改善工作的条件。在合作过程中，东江纵队还支付了庞大的费用。由于工作成绩显著，魏菲尔将军(Fiel. d. Marshall Wavell)也曾加以赞扬和鼓励。一九四三年八月，英军服务团建立了自己的工作系统，港九大队和东江纵队仍一如既往，给英国以种种援助，救护了许多英国友人送回给他们，对他们的秘密过境人员，仍予以便利。后期的合作，是黄作梅在东江纵队的袁庚领导下进行的。一九四六年二月，英国高级官员赖特上校返英前，在香港仍向东江纵队驻港办事处负责人表示：“如果没有你们帮助，我们是不会做出什么工作来的。”

(二)

日军占领香港两个月后，经过调整和加强驻军力量，调派二万五千人分驻各地要塞，海上亦增派舰艇巡弋，并加建炮台及防御工事，认为军政府时期可以结束，于是，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正式任命陆军中将矾谷廉介为香港总督。同时成立宪兵队部，任命野间贤之助大佐为宪兵队长，另设警备司令部，各区驻军称为警备队。新界宪兵总队及警备总队部设在粉岭。总督部之下的伪行政机构，把香港、九龙、新界划分三个地区，设地区事务所，下分若干个区，区设区役所，区长由中国人担任（在未设立区

役所前，先组织维持会，区役所开始时叫区政所)。新界农村，各村设村长。这样，军政警一套东西，都已摆齐架势，企图把整个香港地区变成“大东亚模范治安区”，大力推行其“强化治安运动”，实行总力战。他们重点是对付共产党抗日游击队。所以在市区外围，派重兵在铁路、公路、海岸沿线设立岗哨碉堡，点线相连，把游击区分割包围，不断清剿。在市区内收买流氓、烂仔，充当宪查、密探，乱捕乱杀。矶谷廉介曾经说：“这将使港九完全成为日本的南太平洋战争安全中转站和补给站。”

在日军逐步巩固统治的同时，港九大队日渐壮大起来。当地人民踊跃参军。港九工人、知识分子、青年回来抗日的络绎不绝。港九大队很快成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广大战士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民族气节坚定，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港九地盘狭小，背山面海，没有多大回旋余地。港九大队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活动是艰苦的，而且是在强大的敌人铁蹄下斗争，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要生存和发展下去是无法想象的。

港九大队的建制，随着形势的发展，各个时期，也有所变化。初期的领导机构是：政委陈达明，大队长蔡国梁，政治处主任黄高扬。大队部直属的机构和人员有：秘书（谭干）、情报站（蔡仲敏、陈亮）、交通站（罗许月、李坤等）、军需处（袁大昌、欧连、许智明等）等。政治处下设组织干事（何杰）、宣传干事（陈冠时、梁布克）、民运干事（王月娥）、保卫干事（黄云鹏）、统战干事（方觉魂）、敌工干事（何文）、渔民干事（林伍、肖春）。大队部为了便于领导，一九四三

年六月前，领导机构曾设分指挥部，在沙头角乌蛟腾、三桠村一带，由黄高扬、鲁风负责，政治处亦设在这里，领导上水、沙头角、大埔、粉岭、元朗、荃湾、大屿山各区。大队部在西贡赤径一带，由陈达明、蔡国梁负责，直接领导西贡、沙田、坑口、九龙市区和海上各岛屿。沙头角北面与内陆连成一片，紧靠梧桐山麓，东出沙鱼涌、大鹏湾海面，西向深圳、宝安，南临粉岭、大埔，监视九龙至深圳铁路线，横穿大帽山至元朗、荃湾。西贡地形复杂，海汊无数，海岸线湾湾曲曲，面对三门关口的大浪海边。由海路北上，可至南澳、大小梅沙，南至鲤鱼门、筲箕湾；陆路可通沙田、九龙牛地池湾。这两个地区都是游击队活动的地区。

部队的隶属关系，在东江纵队未宣布成立之前，港九大队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部领导下的五个大队之一。一九四四年六月，东纵已成立了几个支队，由于港九大队有其特殊性，改称独立大队，直接归东纵司令部领导。一九四四年底，部队收缩，改由二支队领导，恢复港九大队名称，以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即由江南指挥部领导。日本投降后，港九大队又复归司令部领导。

大队领导成员的变动：一九四四年初，蔡国梁、陈达明先后调走，由副大队长鲁风任大队长，政治处主任黄高扬任政委，黄冠芳任副大队长，黄云鹏任政训室主任。一九四四年底，人员又有调整，黄冠芳任大队长，黄云鹏任政委，罗汝澄任副大队长，谭铁流任政治处主任，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

各个中队，分区建立。新界基本上分三部分、六个区，

即大埔（包括沙头角、上水、粉岭）、西贡（包括沙田）、元朗（包括荃湾、青山），各为一部分；海上、大屿山、市区分别独立为一个区。开始时从惠阳、宝安派进来的多是以短枪队或武工队形式出现，跟着在地方上各区分别有常备队及民兵的组织，也有长枪队的建立。

当时比较固定的各区中队有：林冲中队（在大埔沙头角），黄冠芳中队（在沙田），江水中队。此外，还有西贡深涌一个中队和元朗中队（谭铁流、高平生负责，后来何国良当副中队长）。沙头角中队后由莫浩波、邓华、林通胜相继当中队长。大埔有一部分地区属元朗中队管，有一部分属沙头角中队管。沙头角中队驻沙螺洞、船湾一带。后来成立海上中队（陈志贤、欧峰先后负责）、大屿山中队（陈亮明、刘春长负责）、市区中队（方兰负责，还有林佛应、伦谦等），共有六个中队。在初期一个短时间内，曾当中队长或小队长的还有：肖华奎、肖光生、曾方、苏光等。大队部还有一长枪营，由肖光生，刘春长负责，以后只保留一个长枪中队。

港九大队指战员最多时发展到六百人。但流动性大，而且各中队或短枪队都是分区活动，独立作战。中队下一般有四个小队。各中队只有三四十人或上百人不等。港九大队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战斗，但小仗却打得频繁而且残酷。几年来港九大队打的大小战斗不下百数十次。下面简略介绍几个方面的战斗。

一、刘黑仔短枪队的战斗

刘黑仔的短枪队，是港九大队一支短小精悍、机动灵

活的典型的队伍。刘黑仔本人沉着勇敢，枪法准，能征善战，而十多名队员如邱石、邓斌、曾九、黄昔（花机黄）、詹云飞、陈勋等，也是生龙活虎式的战士。他们出没在九龙沙田涧的观音山吊草岩一带，那是港九与新界出入交通要道，进可以监视和扰乱市区敌人，退可以与西贡我大队部取得联系，配合其他中队的战斗和保证民运工作的顺利开展，争取广阔的回旋余地。

刘黑仔短枪队在港九新界经历过大小战斗数十次，每次出动只是三、四个人或十数人不等，深入敌人心脏，速战速决，必获战果。如大闹金唐酒家，他们扮作食客，在筵席宴会之间，杀死流氓特务队长肖九如；在观音山坳，他们巧计引诱六名密探躲入山洞，然后回身抛进两个手榴弹通通把敌人埋葬在里面；在马骝山水塘坳，他们捉到几个印度宪查和一名日兵队长，缴了枪还缴了日本军装。

一九四二年八、九月间，刘黑仔等三人到茶果岭执行任务，在一间小冰室里被两名密探跟踪袭击，在敌人封锁了门口之后，刘黑仔后发制人，打伤并吓走密探。三人安全撤出。

十一月间，刘黑仔等四人化装成各类人物，一举缴了飞机场牛池旁的敌岗哨的全部枪支，杀死日伍长。从此，这个妨碍当地菜农进出谋生的钉子被拔掉，并开辟我短枪队在慈云山下的游击活动区。

一九四四年二月，刘黑仔救出了美飞机师克尔中尉之后，又在一个月夜跟随黄冠芳等共五个人，潜入启德机场，安置定时炸弹，把日军油库及飞机炸毁。迫使敌人停止

“扫荡”，狼狈收兵。此次反扫荡成功后，周恩来同志曾来电嘉奖。

沙田、西贡反扫荡之后，刘黑仔短枪队截获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部派高级特务东条战之大佐视察介咸矿山的情报，他们便埋伏路上，把敌人擒获，押送司令部受审。

一九四四年秋，为牵制敌人打通广九铁路阴谋，刘黑仔短枪队发动一次攻打沙田四号隧道的战斗。短枪队七、八个人，在一个清早，冒充民工，接近隧道，突然冲入敌哨所，打死一日兵，抓获十几个印籍宪查，缴获全部机械。

二、海上队的战斗

自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发生较大的海战有十多次。在南澳、吉澳、西涌、龙船湾一带海底，都沉埋着敌船的零件或残骸，我战士也牺牲了曾佛新等。

多次海战，先后缴获物资不少，有烟叶、磁器、纸张、西药、饼干、高丽参等，还有武器及制造飞机的蓝图。一般来说，当抓到中国籍船员，则教育释放，抓到日军则押送司令部。值得一提的是，东纵第一个日俘，便是港九大队海上队捉到的。

最后一次战斗是与敌人的争夺战。当时日军从沙头角海面放出三条船勒收商人税款，我队在一个晚上也驶去三条船，扮作商人去交税，把他们肃清。

三、大屿山的战斗

大屿山战斗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孤军作战。队伍初到，肃清了土匪，然后发动群众，自力更生，扩大队伍，把队

伍分开为各个武工队，以打击分散在东涌、大澳、梅窝、大浪等处的伪军警和小股鬼子。经过一年多的各种形式的战斗，队伍精练了，经验丰富了。为开展对岸流浮山、龙古滩村工作，准备与宝安方面的东纵二支队和五挂山的珠纵联系起来，互为犄角。一九四三年六月一个晚上，中队长刘春长带领十二名班长级骨干，驾小帆船从东涌出发，以消灭出没这一带的海匪，清除我们来往途中的绊脚石。不料海上早隐藏着一只日本军人的炮艇。双方展开火力。刘春长他们全是短枪队，坚持了几个小时，十多名英雄的热血，洒遍了龙古滩头。刘春长队长的雄伟身躯，随着整只帆船没入海底，只剩下掌舵的渔妇泅水回来报信。

一九四四年旧历润四月浴佛节那天，敌人出动大小舰艇四十三艘，飞机两架，陆军二千人，气势汹汹，把整个大屿山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利用对面的垃圾尾岛为基地，每天由一艘五千吨级的战舰率领炮艇巡逻海面。同时，从缅甸战场败退下来的日本陆军步兵，又携十多条狼狗分几个点从东涌、梅窝、大澳等地登陆，驻扎各个山峰，监视全岛、并分兵在沿岸周围所有的村庄住下来“钉点”。每天从一条山沟到另一条山沟上下搜索。我们部队被迫分割成四、五小股，隐蔽在广大的山腰中间的密林深处，各自为战，与敌人周旋到底。

敌人以大于我数十倍的兵力，竭泽而渔地大扫荡二十一天，收兵之后还在山下各村“钉点”不走。但始终捉摸不到我们的行踪。我们只损失了几个后勤人员和七个农民。

敌人扫荡后，我们开展反扫荡。旧历五月中我部队就出击，先打大澳。大澳是上万人口的大圩镇；是大屿山工商业中心。我们在群众集中看戏的一个晚上行动起来，只开几排机枪吓吓鬼子，撒了传单就撤退，目的是造成政治影响。第二次出击在五月下旬，打塘福村。该村是敌人“钉点”之一，吓了一跳敌人就走了。第三次出击是六月中旬打石壁村，出动百多人，准备爆破歼敌。虽未成功，但敌人也被吓走了。第四次打贝澳村，捉了伪正副乡长。七月份游击东涌。东涌是大屿山“首府”，也是敌人前沿指挥所，人口五、六千。我派出短枪队三十多人，游击了半个大屿山，小规模地袭击“钉点”敌人，给群众以深远的影响。也袭击了一次大据点，缴敌人一批枪支。接着八月中，夜袭牛牯荫，歼灭敌一个班。十一月再打大澳镇，消灭宪兵派出所，活捉三十多名宪查。

同时，在大屿山海上，我们也有两条船在内伶仃活动，战绩也甚可观，曾打过四条敌伪电扒，缴获物资也不少。

但不幸得很，我民运女同志王月娥和卫生员崔玉明却先后在从大船山去香港执行任务途中，由当地汉奸朱才告密被捕了。经过酷刑折磨，最后牺牲。

四、武工队的战斗

游击队以主动出击为主要战斗方式。港九大队武工队三几十人甚至三几个人抓紧时机给敌人以致命打击。

一九四三年打大埔的元洲仔。那里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日宪兵哨所，驻有中国及印籍宪查七、八个人。我们有内线叶生同志在里面当宪查。邓华队长带领几个人一下子解

决战斗，缴到步枪短枪十余枝。但在战斗胜利结束后，负责送枪的民兵队长曾春和曾发等三人开船回沙头角时，经过三桠村海面，遇上了敌人的截击，队长曾春同志不幸牺牲。

元朗区青山有一个以前开发的矿场，驻有一小队日兵。一九四四年秋，我元朗中队何国良中队副及小队长李生，在一个晚上，带领七、八个人，长途奔袭。冲入矿场时，日兵慌忙打灭了电灯，在黑暗中展开搏斗，把日兵全部消灭，日警备队小队长绰号油炸蚱的也被打死，缴到全部枪械。但我李生同志受了重伤。

锦田与新田区之间有一个日本人经营的农牧场，规模颇大。元朗中队决意偷袭。一九四五年春节前夕，元朗中队副中队长何国良带队伍偷袭新田农场，并动员百数十名群众，当晚等候暗号，蜂涌入内。不到一两个钟头，全部物资都给我们运光。是役不费一枪一弹，大获全胜。

五、市区中队的战斗

市区中队的战斗形式更为特殊，不是以武装为主。但它的战斗范围极为广泛，包括情报、交通、宣传、组织群众，以至突击散发传单、爆破、破坏等。表面上不杀伤一个敌人，实际上和港九整个斗争关系密切。盟军得到我市区中队直接提供的情报、甚至启德机场的地形图，价值很大。

例如，市区中队为了牵制敌人为追捕美飞行员克尔中尉而发动的对西贡、沙田大扫荡，中队全体动员，与刘黑仔短枪队及其他中队同时行动，大量散发传单，把标语贴

到敌宪兵队告示牌上。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晚上，爆破了市中心九龙亚皆老街的铁路桥梁，一时弄得敌人晕头转向，如惊弓之鸟，急速把派出部队撤回市区。

六、“三三事件”

沙头角乌蛟腾等村及附近山头，日军扫荡次数不少，一九四三年三月三日沙头角大扫荡，我们称为“三三事件”。这天下午四时，敌人出动上千兵力，分三路直扑我大队部政治处所在地，两路从粉岭日本宪兵总部和警备总部出发，奔向沙罗洞、鹤藪，直趋水口山；一路从沙头角宪兵部及警备队出发，经南涌、鹿颈，向水口山、老农田二山挺进，把“晏台山”周围各大山重重包围。当时我大队部政治处只剩下一个班的武装及一些交通站、后勤等人员，其余大部早已撤退。虽然众寡悬殊，但我自政治处主任黄高扬至小鬼“铁沙梨”，个个都英勇无比，奋起杀敌，胜利突围。炊事班长曾福带领武装人员，掩护同志撤退，自己身中数十弹，壮烈牺牲。敌人死伤了少尉军官以下十多人，竟老羞成怒，放火烧山。战斗到黑夜，敌人不得不收兵。这次战斗我方损失比较严重，曾福、丘国章等四位同志在战场上壮烈牺牲，宣传干事陈冠时被捕，战士陈容芳、陈永友也被汉奸村长黄发带领敌人到鹿颈村抓走杀害。

七、情报、交通工作

情报、交通，在港九大队形成有网、有线、有点，交叉组织，有合作也有分工，构成一个完整的灵活性很强的脉络系统。大队成立之初，就有情报站、交通站。除对外与盟军有联系，对上面司令部有请示汇报关系外，在大

队下面各地区各中队之间，都来往无间，日夜紧张地工作。

大队部情报站负责人开始是蔡仲敏同志，负责时间较长。一九四四年秋冬陈亮同志接管。这时又另辟一条联络线，是继续协助英军服务团搞情报的。各中队也指定人员负责情报工作。

情报工作分布各处，各区的敌伪据点如宪兵部、区役所等，几乎都有我们的耳目，随时可了解敌情。

情报人员基本上有四种：一是由我们的地下人员打进去；二是敌伪机关里拉出来；三是各乡村的“白皮红心”村长；四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许多群众都是我们的情报人员。最初打入敌伪机关的同志有：沙头角宪查队长罗汝澄，宪查袁浩，沙头角区役所罗雨中、陈亮，大埔地区事务所欧坚，荃湾区役所何文、何珠，元朗区役所大张、小张等。他们以各种方式作掩护，如大埔的张才以教书为掩护，罗雨中、黄云生以开渔栏为掩护。敌伪机关的高级人员为我们提供情报的也不少。

大队部情报站收到各区送来情报，马上送领导批阅，并转送给有关中队。急件打×符号，愈急的打×愈多。除这样应急之外，每日还出两次情报通报，每周综合研究分析情报真伪。情报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民情等多种性质的。

交通工作，更为艰巨复杂。交通站密布各乡村。主要的有大队部交通站，最初负责人为何杰同志，后来是罗许月同志；李坤同志负责深涌交通站；曾发同志负责沙头角

交通站；赵华同志负责北潭涌交通站；叶东明负责大埔交通站。上水、元朗都有交通站，曾由邓锡元同志、温平同志负责。坑口交通站是同市区联络的。至于市区更早期就有交通站，而且不止一个。情报站可以不那么固定，但交通站必须基本上固定在一个点上。

交通员除经常带文件、情报外，还带人员来往，司令部、大队部的首长来来往往，都是由交通员带路。如曾发经常护送陈达明、鲁风、蔡国梁、黄高扬等同志出入宝安、新界或沙头角、西贡之间。

交通路线有陆路的，也有水路的。西贡和沙头角两个区，由于濒海地带，所以水上交通很重要。西贡到沙头角，在深涌落船。深涌是个枢纽站，在其附近的大尾等有个交通站，同时每个村都有预备站。情报到这里便迅速转移。西贡到九龙，更是深入到敌人心脏的交通线，陆路通过井栏树、牛池湾到飞机场附近，是要隘地带。水路可从上饶、黄泥洲落船，直过盐田仔到南华窟、大埔仔上岸。形成了安全的交通网。

交通员工作艰苦，他们多是十三、四岁的小鬼，如铁沙梨、锦仔、飞机仔等。他们接到任务，不论好天下雨、白日黑夜，立即拔腿就跑，一心只记着任务和纪律，到达目的地为止。他们真正是无名英雄！

八、锄奸工作

最大快人心的是杀了沙头角伪区长温二和大埔宪兵队通译林老虎。这两个汉奸，为虎作伥，鱼肉百姓。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一天，温二一行数人，到大埔地区事务所开

会，黄昏坐单车尾回沙头角。车至莱洞坳斜坡拐角处，我小队长莫浩波率领几名战士，一涌上前，代表人民对他执行死刑。事后，老百姓把此事编成了山歌，这样唱道：

温二是个毒心肝，杀他无人不喜欢。

感谢中国共产党，除了坏人心自安。

林通译被称为林老虎，奸杀抢掠，作恶多端。我中队长邓华经过几个月的明查暗访，弄清他出入的规律。在一个晚上，带了几名战士，直冲入一个赌场，当众把他击毙。当天，附近各村的老百姓高兴得杀猪宰牛，慰劳我战士，晚间还演戏庆祝。

日寇虽然凶残，但如果没有汉奸走狗为虎作伥，他们寸步难行。因此，我们对付他们的策略，是斩他手脚，使他动弹不得。一九四四年打小贞就是一个例子。小贞是元朗、上水一带的日宪兵军曹，是特务头子，“武士道”精神十足。他有一个得力的密探黄桂，且收为契仔（干儿子）。黄桂有恃无恐，横行于上水、深圳边界各处，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元朗、上水两镇的商民及附近各村老百姓恨之入骨。由于他每天都出入宝安、新界，我们决定由梅林武工队把他除掉了。

小贞失了一个契仔，又物色到另一个契仔黎金水，游击队一不做二不休，由港九队潘田等五人，到上水把他除掉。接着，又由我驻上水游击小队长把日本特务头子小贞也消灭在大埔田村。

（三）

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港九大队奉命从港九新界撤

退，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发表了撤退宣言，内容如下：

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胜利结束了，我港九人民已经在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了！

回溯我队在港九沦陷后成立，我们的目的就是打倒日本侵略者。三年又八个月，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冒出生入死之险，不惜重大牺牲救护盟邦人士，肃清土匪活动，破坏敌伪统治，保卫人民利益，确实尽了我们应有的努力并做出了许多成绩。斗争的事实又说明，我港九人民对于祖国是无限忠诚的，对于敌人是极端仇恨的。三年多的日子，他们虽然饱受日寇的屠杀与迫害，遭受的牺牲十分惨重，但他们对我队的帮助与支持，却有加无己，他们的斗争实在是可歌可泣的。

今天，全世界和全中国，和平建设的时期来临了。在这新情况下，我队奉司令部命令从港九新界地区撤退。在此以前，我们已经发现过不少反动分子、地痞、流氓，假冒东江纵队名义，到处招摇撞骗，抢劫勒索，无所不为，实施挑拨阴谋，破坏我队威信。在此以后，我港九人民要更加提高警惕，加强自卫力量，消灭与防止土匪流氓及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我队特再郑重声明：在宣言之日起，一星期内，撤退完毕。

别了，亲爱的港九新界同胞们！今天，我们离开港九了，但我们关心你们的自由幸福仍和以前一样，经过了长期困苦的斗争之后，我们希望你们能获得香港政府的救济，重建家业，改善生活。我们希望你们光荣的斗争能引起国际人士应有的尊敬，获得应有的自由、和平与幸福的生活。

今天，我们撤退了，但我们的心却是永远不会离开你们的。

大队长 黄冠芳

政治委员 黄云鹏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以上的宣言，当日油印成传单，在各区散发。

英军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由海军少将夏悫将军率领舰队抵港，人数只有二千人。当他们知道我们要撤退，而他们暂时还无能力维持治安时，他们便在分区找我们谈判。在西贡找到梁超同志，在沙头角找到陈亮同志，在上水则由一个叫柯参谋的出面，找我们谈判。我们认为，事关重大，需要请示。于是，他们又派了一校官到沙头角我大队部来，要求和我们谈判暂不要撤退的问题。我大队部请示司令部，司令部请示中央，然后同意谈判，司令部派出联络处袁庚同志，以少校军衔身份为谈判首席代表，偕同政委黄云鹏、副大队长罗汝澄（均以大尉军衔的身份）及翻译官黄作梅、谭干出席，另警卫员二人，乘坐英军派来迎接的吉普车到九龙半岛酒店住下来。先交换一下当前治安情况，然后，他们要求我们：第一、不要那么快撤退，帮助他们维持社会治安；第二，成立一办事处，同他们联系。谈判后，黄作梅、谭干两位同志留下来，筹备成立办事处事宜。这办事处以后就长期地存在下来。

当然，我们的撤退，并不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我们的驻港办事处，通过地方绅士，与英军具体研究，使新界各区成立自卫队，在过渡时期维持治安。经费、枪支、服

装由英军发给，每人一长枪，子弹十发，月薪六十元。一九四五年十月，新界四个区组成了自卫队：元朗区何发当队长，西贡区张兴当队长，上水区温平当队长，沙头角区黄观生当队长。每个区自卫队人数二、三十人不等。自卫队存在大约近一年的时间，一九四六年六月解散。

港九大队撤出港九，群众依依不舍，热烈欢送。撤退时，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前进报》有一篇报导：……当撤退初，民众还热烈走来挽留，带着慰劳品跑来送别的妇女们，不少在偷偷地抹着眼泪。当他们知道撤退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又抢着来帮助挑东西。一个中年农民说：“我们虽然出不起钱，出力也可以的呀！”新界各团体都纷纷向我献旗和致欢送词。十月二日，元朗全区商民假座同乐戏院开了盛大的联欢会，热烈欢送我队。各界对我队民主建政工作和治安维持工作的认真彻底，都表示十分敬佩。西贡和长州的居民联合登报歌颂我队。新界元朗各学校员生在联合赠送的欢送词中说：“单就元朗一区来说，治安秩序纵使三岁孩童也知道由贵队维持才得这样良好的成绩了。我们听说过‘孔子相鲁三月而天下大治’，这种情形仿佛今天才亲自体验出来”。元朗人民自己建立的协治会、商会和六乡各村民众都热烈致了欢送词。大家在惜别时，都依依不舍地敦嘱“和平建国，永订心期！”

今天，在纪念东江纵队成立四十四周年之际，我们回顾港九大队的历史，学习和发扬它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是很有意义的。

英明的战略决策，卓越的指挥艺术

——抗战初期中央军委指挥八路军战略展开

罗 焕 章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在挺进华北抗日前线实施战略展开的过程中，经历了曲折艰巨的斗争。在日军大举进攻、华北战局危急，蒋介石又以抗日名义企图假日军之手消灭我军的错综复杂情况下，中央军委以高超的指挥艺术，成功地实现了八路军预期的战略展开计划，为八路军在华北站住脚跟，创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完成抗日的历史任务奠定了基础。

(一)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夺占北平、天津，随即继续增兵，准备以平津地区为出发阵地，向华北发动更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八月中旬，敌相继向平津地区调集了大量的兵力，计有：敌第二十、第五、第六、第十、第十四、第十六、第一〇八、第一〇九师团，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第二、第十五旅团等八个师团、四个旅团（连同原来驻

扎在平津地区的一个旅团共五个旅团)和两个支队,共二十万余人。先后组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辖三个旅团、两个支队)和华北方面军(辖第一、第二军,共八个师团两个旅团)。敌之战略方针是长驱直入、速战速决:沿津浦、平汉和平绥三条铁路线发起战略进攻,“主决战方面定为沿平汉线地区”,“在保定、沧州附近会战,向石家庄、德州之线追击”,“迅速消灭河北省中部的敌人”,“使南京政府在失败感下不得已而屈服,并由此造成结束战局的机会”,^①企以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八月中旬,敌华北方面军以第五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由北平地区沿平绥路发起进攻,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以其主力由张家口北面向万全发起进攻,对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防守的平绥路东段实施南北夹击。敌相继攻陷南口、居庸关、万全等要地,并于二十八日侵占张家口,控制了平绥路东段,继续向晋东北进犯。九月十四日,敌华北方面军以第一军为基干的四个师团,由良乡及永定河左岸一线,向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防守的平汉路北段发起大规模进攻,当日即突破永定河右岸防线。九月二十四日,连续击破第二集团军琉璃河、高碑店、漕河三道防线,占领保定,并继续向石家庄进犯。九月十日,敌华北方面军以第二军第十师团,由独流镇、静海地区向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一集团军防守的津浦路北段发起进攻。九月十一日,连陷马厂、青县一带防线。九月二十四日,突破姚官屯一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11、216页,第一卷第二分册第24页。

线阵地，占领沧县，并继续南下向德州进犯。此时，国民党军三个集团军约十五个军，于平绥路东段、平汉、津浦路北段三个战略方向部署的防御体系基本瓦解，防守部队连续撤退，河北、察哈尔大片国土迅速沦陷，整个华北处于危急之中。

早在“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国工农红军即发出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抗日的通电。七月十四日，中央军委命令红军作好抗日的准备，待命抗日。八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军队，它聚集着一批中华民族的精华，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坚强的战斗力。我军所担任的敌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八路军虽然只有四万六千余人，武器也比较差，但当它深入敌后，一经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开展广泛的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将对华北战局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八路军要完成战略任务，战略展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由于战略展开时机掌握不当，选择战略展开地区错误，以及战略展开的组织、指挥不够严密而招致局部失利甚至导致全局失败的例子，在世界近代战争史上屡见不鲜。八路军所面对的日本侵略军，是一个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骄横凶狠的敌人，与之作战不容有丝毫的疏忽。因此，八路军向哪个战略方向开进，展开于哪个地区作战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从战略防御中争取主动，给日寇以最沉重的打击，给友军作战以最有力的配合，这是在八路军出师

之前必须首先考虑成熟和解决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早在八路军出师之前，中央军委就曾多次派人到保定、石家庄一带，查明北平失陷后各方面的情况，到济南等地查明天津和山东的情况，通过我地下党组织了解晋、绥、察方面的情况，通过从多方面侦察、搜集到的敌情资料，基本掌握了华北日军的兵力、部署及企图等主要情况。在友军方面，国民党军由昨天的敌人，变成了今天的朋友。但是，在同国民党实行联合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中的顽固派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八月一日，洛甫、毛泽东即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指出，我军出动路线、出动兵力及作战方法，均应由我们提出与蒋介石商定，并提出我们应采取分期出动，逐次用兵等原则。据了解，当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就已向蒋介石秘密地提出了把红军无形地加以消灭的建议。八月三日，红军还未改编，蒋介石即决定红军全部经陕北“开绥东出察北，向热河挺进”，于承德方面活动。^①八月四日，又令蒋鼎文电催我军按上述路线出动。蒋介石指定的开进路线和展开地区，不利于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是十分明显的。陕北地区虽属我老革命根据地，但土地贫瘠，旱灾严重，粮食缺乏。我数万大军徒步六百余公里，补给将会遇到很大困难。不但会大大消耗指战员的体力、削弱部队的战斗力，而且会进一步加重老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对支持长期抗战十分不利。蒋介石指定我军活动的承德地区，是敌关东军

^①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第二十九册第6404—34页。

向关内进犯的主要方向和要冲，也是受敌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夹击的地区。我军在该地区作战，势必与敌形成正面硬拼，即使付出极大牺牲，也难以长期坚持。更令人奇怪的是，我军开进路线和展开地区这一军事机密，在上海的日本人很快就知道了。不难想象，如果按照蒋介石提出的这个方案去做，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在此形势下，中央军委按照我军由陕西富平地区东渡黄河，展开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的预定方案，一方面派员就我军开进路线和展开地区等问题，向南京当局提出修改意见；另一方面，主动与山西当局协商实际的解决办法。十月，毛泽东致电彭雪枫指出：“根据山地战游击战的理由，红军要求位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作侧面的袭击战，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出动路线，因洛川至府谷千余里无粮，延安南北八百余里，颗粒无买（机关粮食，从晋西与西安买来），因此决不能走陕北，〔从〕韩城渡河可经蒲县、孝义、汾县到大同集中，此点与阎交涉，一定要办到。”^① 八月十一日，朱德、周恩来在国民党于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上，正式提出：原定要红军出动的路线离目的地过远，难以如期到达。请指定捷径路线，最好沿渭河北岸经韩城渡黄河。十二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周恩来：晋阎已答应红军由韩城渡河经同蒲路输送。蒋介石见我军已与阎锡山打通关系，解决了实质性的问题，又于八月十

^① 毛泽东1937年8月10日关于与各方接洽中要有谦逊态度致彭雪枫电。

五日电西安行营，规定八路军的任务为进出冀东，截断敌人后方交通，并指定以一个师由陇海路转平汉路，于徐水下车，一部深入平、津以东，一部向怀来之线前进，其余两师由现地徒步至风陵渡，经同蒲路输送，进至灵丘、广灵、蔚县一带。此案的要害是将我军分而治之，并限定我八路军的作战地区于敌重兵云集、我军难以立足的冀东平原及狭窄而难以活动的灵、广、蔚一隅之地。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等致电南京我党谈判代表团成员周恩来、叶剑英及前总指出：将红军分割使用危险甚大，坚决不能同意，中心要点是我军集中由韩城渡河，进至广灵、灵丘、阳原、蔚县、涞源地区，决不走陇海路、平汉路。我谈判代表团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方案。随后，党中央又派周恩来、彭德怀等去太原，与阎锡山进一步商定我军于涞源、灵丘、浑源、繁峙、五台、定襄、盂县、平山、灵寿、行唐、曲阳、唐县及阜平等县展开的问题。阎锡山鉴于其晋绥军一再败退，希望我军协助保卫山西，因此，对我军拟展开于敌即将进攻的晋东北地区，并愿受第二战区在军事战略上之节制均表示高兴，同意我军以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

(二)

在上述主客观条件成熟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八月二十二至二十五日召开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进一步明确了八路军的作战地区是冀、察、晋三省交界的广阔地域，

沿渭河以北经韩城、同蒲路一条路线向华北抗日前线开进。八路军的战略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箝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与扩大我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同时，命令八路军先遣兵团立即出动。八月二十二日，第一一五师主力（欠第三四四旅）由陕西三原地区出发，经富平、王寮镇、倒贤镇、兴市镇、澄城、郃阳，于八月三十一日，由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九月九日由侯马乘火车沿同蒲路北上。第三四四旅于八月二十五日，由三原地区跟随师主力东进。九月三日，第一二〇师主力由陕西富平地区出发，沿先头师路线跟进。九月四日，朱德、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率八路军总部由泾阳县方阳镇出发，随部队东进。

九月中旬，正当八路军向前线挺进时，晋北敌情发生新的变化。沿平绥路西犯之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在占领大同后，以一部继续西进，而以主力两个旅团沿同蒲路南下，向雁门关一线长城进犯，企图配合由蔚县、广灵向平型关进逼的第五师团，一举夺取太原。对此，毛泽东在九月十七日的敌情判断中，作出了精辟的分析，毛泽东认为：敌进攻华北总兵力约十五万至二十万人，大约分为四路，一路犯山东，现未出动；一路沿津浦线，一路沿平汉线，一路沿平绥、同蒲线，“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以此姿势，威胁河南、山东之背，而利于最后夺取山东，完成其夺取华北五省之企图。其总的战略方针，是采取右翼迂回。”因此，“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

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上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关于我军之战略部署，毛泽东则指出：“依上述情况及判断，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箝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红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一）我二方面军^①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之同意下，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活动。（二）我四方面军^②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三）我一方面军^③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即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④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关于山西的游击战争的意见一电中指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态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

① 指第一二〇师。

② 指第一二九师。

③ 指第一一五师。

④ 毛泽东1937年9月17日关于敌情判断及我之战略部署致朱彭任等电。

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这是中央军委根据敌情的发展变化,对我军战略展开方向和地区,适时进行全面调整的极其重要和英明的战略决策。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东部,群山环绕,峰峦起伏,地势十分险要。日军如夺占山西省,既可保障其沿平汉路南进和沿平绥路西进之翼侧安全,又可藉山西地势之利,高屋建瓴,西进威胁大西北,南犯直趋中原,沿黄河和陇海路向东,可兜击平汉线及山东友军侧背。因此,中央军委高瞻远瞩,决心依靠山西有利的地理形势和良好的群众条件,创建坚强的山地抗日根据地,以巩固山西,护卫西北,屏障中原,瞰制河北平原,支撑华北战局,坚持持久抗战。巩固山地的关键是牢牢控制对山西安危相关的战略枢纽地区——五台、管涔、太行、太岳、吕梁等主要山脉地带。山西的命运不取决于同蒲、正太等铁路交通线和太原、大同等城市的得失,而取决于上述战略枢纽地区的得失。所以,我军依托各主要山脉展开于山西的四角,将对进入山西之敌形成四面包围的战略态势,使我军处于极为主动和有利的战略地位。但是,如何实现这一战略部署的调整,使我军顺利地展开于预定地区,这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的指挥任务。既要根据敌情变化,掌握恰当的展开时机,作到不失之过早亦不失之过迟;又要摆脱蒋介石的束缚、限制,避免阎锡山的阻挠排斥,处理好和现地驻军的关系。因此,必须审时度势,准确预料战局发展的趋势,及时适应形势的变化,抓住稍纵即逝的有利时机,并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促其实现。

(三)

向晋东北地区的战略展开

九月中旬，当日军第五师团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分别由蔚县、广灵和大同向内长城逼近时，我八路军先头部队第一一五师，正沿同蒲路北上，向晋东北星夜开进。此时，国民党第二战区第六、第七集团军逐步撤向平型关至雁门关一线长城防守，并期望我八路军能迅速到达前线，协助其坚守长城防线。为使我军展开于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地区，以独立自主的作战配合友军，中央军委指挥第一一五师迅速进至繁峙、灵丘及其以南地区，展开于敌战略进攻的翼侧，对沿平汉路南进和沿平绥路西进之敌形成侧击的有利态势。第一一五师抓住有利战机，于九月二十五日伏击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于平型关，给该敌以歼灭性的打击，使日军板垣师团士气受挫，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全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增强了广大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第一一五师乘胜向晋东北、察南、冀西敌占区展开，于十月份连续收复县城十座，严重威胁敌平汉线的交通，切断了代县至张家口间敌之公路交通补给线。八路军迭克强敌，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友军的称赞。在此情况下，阎锡山愿将第六十三师及独立第三旅等共十个团，交八路军总部指挥，以防守晋东北地区。中央军委指挥第一一五师成功地展开于敌右翼战略集团的翼侧，为取得平型关大

捷及一系列作战胜利奠定了基础，而平型关首战全胜和连续获胜，又为顺利地实现战略展开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向晋西北地区的战略展开

在第一一五师向晋东北展开时，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主力，由大同沿同蒲路南犯，进占怀仁、尚希庄等地，企图直趋太原。为箝制敌南下行动，打破敌对我晋东北地区的迂回包围，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总部，迅速以第一二〇师进至晋西北，展开于大同、太原的翼侧，对沿同蒲路南犯之敌实施侧击。九月十九至二十二日，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先后前往雁门关太和岭，与阎锡山协商第一二〇师展开于晋西北，打击由大同南下之敌的问题。开始，阎锡山不大赞成，黄绍竑则坚决反对，经反复协商，始同意第一二〇师直属队和一个旅，开赴以神池、宁武为中心的晋西北地区，向左云、右玉一带活动袭击敌人，并发动组织河曲、偏关、五寨、岢岚地区群众抗敌。在敌突破雁门关、茹越口一带晋绥军长城防线继续向忻口东西一线阵地进逼的形势下，九月二十八日，第一二〇师师部率第三五八旅挺进至宁武、神池地区，依托管涔山脉实施战略展开。接着袭占井坪镇，连克平鲁、宁武县城，不断破袭敌同蒲路的交通运输，对敌侧后造成严重威胁。为给向忻口阵地进攻之敌以有力打击，配合友军的阵地防御作战，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于十月上旬由晋察冀边区之平山地区急返至忻口以西，与第三五八旅协同，攻占敌翼侧要点大牛

店，遏制了敌向翼侧的扩张。随后，两旅连续对雁门关至忻口的敌交通线进行大规模破袭，夺占了交通要隘雁门关，切断了敌人当时唯一的一条交通线。

第一二〇师预期地展开于晋西北地区，不仅冲破了蒋介石对我军作战区域的无理限制，扩大了我军作战活动范围，对敌侧后造成严重威胁，箝制了敌之南下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友军忻口作战，而且对掩护黄河河防、屏障陕甘宁边区及加强晋东北地区与后方的联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由于我第一二〇师于晋西北与第一一五师于晋东北的互相策应和密切协同，对进犯忻口之敌东西两侧及后方展开猛烈的袭击作战，犹如置敌于两只有力的铁钳绞夹之中，使敌后方交通断绝，粮、弹、油料补给频于中断，战斗车辆因缺油而停开，部队因口粮不济而用豆子充饥。在忻口正面防御的友军顽强抗击下，日军攻势受挫，伤亡惨重，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使忻口战役成为华北抗战中坚持防御阵地最久、消耗敌军最多的战役之一。

向晋东南地区的战略展开

在向晋北进攻之敌被阻于忻口一线的时候，沿平汉路进攻之敌，由于防守该地区的国民党第二集团军刘峙部的连续撤退，迅速于十月十日侵占石家庄。晋北之敌不能南下，沿平汉路进攻之敌右翼侧暴露，受到很大的威胁。敌华北方面军为改变忻口方面作战的被动局面，不得不由平汉路之主要突击方向，抽调第二十师团由石家庄沿正太铁路西犯，以第一〇九师团由元氏、赞皇经九龙关、昔阳西

犯，企图两路并进迂回榆次、太原之侧后，牵制友军于忻口方面的作战。此时，敌华北方面军之主要进攻方向，已被迫改向山西。这实际上是中央军委成功地发挥了已展开于晋东北、晋西北两个战略集团的巨大箝制作用，迟滞和阻碍了敌右翼战略迂回包围计划的实现，削弱和分散了敌沿平汉路实施主要进攻的兵力，迫敌主力进入地势险峻、复杂的山地，进行一场不利于发挥其武器装备优势的致命的持久战争。

晋东娘子关、旧关、九龙关南北一线，系太行山脉的要隘，地形险要，并预先构筑有相当数量的永备工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忻口战役初期，毛泽东就曾向国民党第一、第二战区当局建议派重兵防守娘子关一线阵地，并指出这是保证忻口作战胜利的关键之一。遗憾的是这一关系山西全局的重要建议，并未引起第二战区当局的重视。他们过分依赖第二集团军由保定至石家庄一带防御阵地的掩护，因而事先未部署重兵设防。当保定、石家庄失陷，娘子关一线处于敌威胁之下时，才急调部队增防。增防部队仓卒进入阵地，难以有效阻止敌人的进攻。作战连续失利，晋东形势急转直下，对忻口作战极其不利。在此情况下，国民党第二战区极盼我军以有力之一部增援晋东防线。早在九月二十四日敌占保定时，中央军委即判断敌人不久将夺占石家庄，并将西犯威胁正太路，已令第一二九师于九月三十日由陕西富平地区迅速出发，此时已进至正太路平定地区。于是，中央军委立即命令第一二九师于正太路以南实施展开，向进攻娘子关之敌侧后进行袭击。第一二

九师依托太行山脉展开于晋东南地区后，于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连续于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七亘村、黄崖底等地给西犯之敌以沉重打击，并于十一月上旬与第一一五师主力协同，在广阳地区歼敌一千二百余人，给日军第二十师团一部以歼灭性打击，迟滞了敌军的西进。如果不是中央军委有预见地提前令第一二九师由陕西富平地区向正太路实施机动，使第一二九师不失时机地于十月下旬到达正太路以南地区，连续作战和协同第一一五师主力打击了敌人，迫敌后退和绕道行进，从而争取了宝贵的一周时间，则娘子关失陷后，不仅晋东友军后路将被切断难以撤退，而且晋北忻口地区友军也将难以顺利向晋西南转移，损失之严重将难以设想。

第一二九师适时地展开于晋东南地区，对沿平汉路南犯之敌，构成严重威胁。我晋东南地区与晋东北、晋西北地区之部队遥相策应，对进占太原及正太路之敌构成包围夹击之态势。依托太行山脉的晋东南地区，拱卫山西的东南部，箝制着冀南和豫北平原。它与恒山、管涔山地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使我军在这里展开的三个战略集团，在部署上更具有弹性和韧性。

向晋西南地区的战略展开

在太原失陷以前，毛泽东即指出：吕梁山脉之晋西南，目前虽距敌尚远，但也应作适当之部署。十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进一步指示应以第一一五师的一个旅，适时进至汾河以西之吕梁地区。太原失陷后，敌已南侵平遥，八路

军总部遂令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由广阳地区进至洪洞、赵城以东一带，准备向晋西南挺进，抗击日军沿同蒲路南段的进犯。但是，阎锡山既对退至晋西南的晋绥军阻敌南下缺乏信心，又不愿我军依托吕梁抗敌，而且对日军是否会很快南犯还抱有侥幸心理。日军侵占太原后，不得不暂时停顿其战略进攻，以补充消耗、调整部署，消除来自我抗日根据地日益严重的威胁，保障其后方和交通线的安全。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下旬，日军以万余兵力分兵八路，围攻晋察冀边，分兵六路围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均遭到失败。一九三八年二月上旬，敌华北方面军集中第十四、第二十、第一〇八、第一〇九等四个师团主力，向晋西、晋南发起新的进攻，企图夺占和控制山西省西部和南部各黄河渡口，截断各抗日根据地与后方的交通联络，以便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实行所谓“占领区的安定”。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我晋东南、晋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给进犯之敌以沉重打击，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而原驻防晋西南的晋绥军则纷纷撤退，很多部队退过黄河，晋西南已处于混乱状态，我陕甘宁边区黄河河防受到威胁。此时，中央军委即令第一一五师主力由洪洞、赵城以东地区挺进至汾阳、孝义以西，侧击由榆次南下之敌，并展开于吕梁山枢纽地区，以阻敌南下，保障两延（延川、延长）黄河河防的安全。二月中旬，第一一五师师部率第三四三旅经汾西进至灵石、孝义以西，于兑九峪、辛庄、大麦郊和川口等地，连续给敌以打击，并乘胜展开于吕梁山脉中段之川口、石口、石楼、永和等地区。三月上旬，为打击由临

汾、蒲县西犯之敌，第一一五师主力南进至隰县、午城、大宁地区，三月中旬，于午城、井沟一带连续作战，歼敌一千余人，粉碎了敌由蒲县、大宁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图。第一一五师主力依托吕梁山脉展开于晋西南，与晋西北、晋东南两抗日根据地策应，对由太原、榆次地区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之敌和沿同蒲路南犯之敌，均形成有利的夹击之势。使西犯之敌难以轻易进犯黄河河防，使南犯之敌慑于后路的威胁，不得不停止于风陵渡、茅津渡，未敢贸然南渡黄河。

至此，我八路军三大主力依托五台、管涔、太行、吕梁等山脉，完成了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和晋西南四角的战略展开，控制了山西的大部战略要地，处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使占领大同、太原、临汾等城市和同蒲、正太铁路交通线之敌，完全陷入我军四面包围，迫敌只能困守“点”“线”，使日军四个多师团的兵力，被抑留箝制在山西难以脱身，既不能西进，又不能南下，有力地拖住了敌华北方面军战略进攻的步伐。日军华北统帅机关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山西陷入了难以摆脱的被动战略局面，他们哀叹：“华北治安战是既未能收到预期的成果，也未能达到作战的目的。”“在治安战期间的华北战场，敌我的势力范围犬牙交错，变化无常。有关敌人准确位置的情报，很不可靠，甚至在我方势力范围内部深处经常潜藏有敌人的军事力量。”“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对共军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因而未能在萌芽时期予以扑灭，以致坐视中共势力壮大起来。”“当逐

渐认识到占领地区的中共势力乃是治安的主要症结时，方考虑到要以对共措施作为治安的重点。然而，这种认识的转变，实际上为时已晚。”^①

中央军委在指挥八路军实施战略展开中，以高超的斗争艺术，正确地处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统一与独立的关系。既在战略战役上积极配合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又在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正当地拒绝和抵制了国民党军事当局对我军抗战的束缚和限制，坚持了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作战指挥权，坚持了我党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在对敌斗争方面，中央军委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以高敌一筹的战略眼光和战略指挥艺术，巧妙地利用敌人对我军估计不足、其战略翼侧暴露及缺乏紧密战略协同等指挥上的错误，使八路军适时地展开于有利地区。在敌取外线进攻和战略包围的情况下，成功地造成我对敌之包围的有利态势，从而使我军在战略防御的被动态势中夺得了战略主动，为我军取得作战胜利，并为尔后向华北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央军委指挥八路军实施战略展开的光辉实践，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不朽杰作。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册第467、471、472、475页。

晋察冀边区土地政策的发展 和实施效果

成 汉 昌

晋察冀边区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最早和面积最大的一块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边区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绝大部分人口是农民，抗日武装也基本由农民组成，边区的抗战实质是农民的抗战。因此，土地政策极为重要。

抗战前，边区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据对北岳区二十八个县中的八十八个村庄的调查，占农村总户数将及大半的贫雇农，每户平均仅有二亩半至七亩半左右的耕地，而占农村总户数百分之三左右的地主，平均每户则有土地九十七亩以上。广大无地或土地不足的贫苦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富农的土地，地租一般占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除正租外，还有各种名目的额外附加，有些地区的额外附加多达二十余种。高利贷和苛捐杂税也是盘剥农民的重要形式，高利贷的利率大体在一分七到三分、五分之间，来自军阀、官府、豪绅的苛捐杂税共计三十种以上。这种残酷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使广大农民日益贫困破产。

显然，不减轻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边区的抗战是无法坚持的。

(一)

一九三七年十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在以晋东北之五台山为中心，创建晋察冀根据地的斗争中，就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有关规定，提出了“二五减租”、“一分减息”及“合理负担”等口号。当时，由于战事紧张，根据地不稳定，干部缺乏，各县的原政权机关实际上全部瓦解，因此，减租减息主要还是一个带有战地政治动员性质的口号，实际执行面并不广泛。即使在一些执行的地区，标准也不一致：有的是“二五减租”，有的是“地四佃六”，还有的是“地三佃七”。

一九三八年一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召开，成立了边区最高政权机关——行政委员会（简称边委会）。为了推进减租减息，边委会于同年二月公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简称《单行条例》）及其它文件，制定了一套初步的政策。主要内容是：在租佃和借贷关系方面，规定地主之土地收入，无论租佃、伴种，“一律照原租额减收百分之二十五”；钱主之利息收入，无论新债旧欠，“年利率一律不得超过一分（即百分之十）”；各种额外附加和高利贷“一律禁止”。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方面，规定地主未得租户、佃户或伴种户同意，“不得将地转租、转佃、转伴种于他人”；汉奸的土地由政府没收，

“抗日军人家属贫苦者有（使用的）优先权”；逃跑地主的土地，由地方政府分发给无地少地农民耕作，不纳地租，“但土地所有权仍属原地主”；一切公私荒地荒山，“准许人民无租垦种”，所有权“属于承垦之农民”。在土地税方面，规定取消旧有的税制及一切苛捐，实行新的合理负担的直接税。颁布《单行条例》的同时，边委会还发出一九三八年《指示信》第一号，强调土地政策“是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的一个办法”，因而，“要在解决每一个契约关系中把握统一战线”，并强调它的执行权“属于政府”，群众团体“只能负协助的责任，不能直接执行”。

《单行条例》和《指示信》第一号，代表了边区初创时期的土地政策。它还很不具体、不完善，但却明确指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方向、内容与办法，成为边区土地政策的雏型和广大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法律根据。

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上半年这一段时间，《单行条例》的贯彻取得一些成绩，但进展很不平衡：晋察冀区比较普遍，冀中区次之，冀热察区的大部分地方仅开始宣传阶段。在执行中，还出现了两个主要的缺点和偏差。

一是群众发动不广泛。不少地方只是政府干部利用行政方式，“自上而下”地布置和贯彻政策，忽视了群众工作。有些地主被迫减轻了租息，实际却是阳奉阴违，以各种方式抗拒。农民中有不少人畏首畏尾，欲减而又顾虑重重，有的竟在地主的威胁欺骗下，约定“明减暗不减”，偷偷地把已经减掉的租息如数送还。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以前，这种现象在各地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二是“左”的偏向。一九三九年末至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晋察冀边区境内，顽固派也制造了一系列“磨擦”事件。在打退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广大农民动员起来，“当时反顽斗争的怒潮，弥漫了整个的边区，声势浩大，土劣震恐”。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干部和群众对联合地主阶级抗日的策略发生怀疑，在贯彻土地政策中，有的地方减租减息后，并不依约缴租缴息，清理旧债变成废除债务，“换约赎地”成了无偿赎地或以极不公平的代价赎地；有的地方并无政府出据，进行向富户“借粮运动”，引起地主富农的恐慌；有的地方把“耕者有其田”当做现实的行动纲领，变相没收地主土地，或者以对待汉奸的政策对付顽固派。这种“左”的偏向使农村阶级关系一度紧张；直接影响到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其主要原因是受到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影响。另外，《单行条例》所表现的政策不平衡，也就是着重强调地主债主方面的减租减息和保障土地使用权，而比较忽视佃户债户方面的缴租缴息和保障土地所有权，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贯彻《单行条例》的实践中，各地还提出了许多具体问题。这些问题是含有政策性的，又是《单行条例》没有规定或规定不合理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类：

（一）、减租后的最高租额问题。国民政府在一九三〇年公布的《土地法》中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这是按原地租为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然后进行“二五”减租而得出来的。《单行条例》只规定减租百分之二十五，那末，照这一标准执行后，有些地方的

租额恰好相当于土地收获总量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但超过的仍属多数。有些地方出租人在减租前把原地租额提高，或者对承租人应有的肥料种子的供应减少，这样“名为二五减租，而农民实得其惠者则还远在二五之下”。因而，实行“二五”减租后的最高租额问题，需要边区政府做出明确规定。

(二)、伴种地的减租问题。边区内有些出租人除出租土地外，还供给承租人或耕畜农具，或种子肥料，乃至房屋。也有因土地所有者土地很少，又无劳力而请人代种的。也有出租人为工商业者或其他职业者而请人捎带种的，等等。此种土地关系各地名称不一，总称之为伴种。伴种关系与一般租佃关系有区别，各地伴种的办法和程度又有不同。但《单行条例》只简单地规定，“不论租佃、伴种一律照原租额减少百分之二十五”，这对伴种地的减租来说，显然是不合理的。

(三)、钱租或粮租问题。货币地租（钱租）虽在地租形态中是比较进步的，但在当时的边区，因战争影响和租佃关系中的一些旧传统，对农民并不利。抗战前，一些地主为加重剥削，强迫佃户把实物地租（粮租）改为货币地租（钱租）。抗战开始后，货币贬值，粮价上涨，地主又要求按战前的粮价把钱租折为粮租，佃户则要求按现实的粮价折。因此钱租还是粮租以及如何折算，就成了《单行条例》尚无涉及而在地主和农民中引起很大纠纷的一个问题。

(四)、耕地正产物和付产物问题。正产物一般指耕地所收获的谷物，付产物指收获的柴草及田头地边附种的物品。在减租中如何分配付产物的收益，如何确定同一耕地正付产物的标准，也需要边区政府从政策角度做出规定。

(五)、永佃权问题。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曾指出“保障农民佃耕土地之永佃权”的主张。边区政府的《单行条例》事实上也承认了农民的永佃权。这个政策在边区初创时期，为农民防止地主因减租而无端收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建立正常的租佃关系出发，并不妥当。有的农民于减租后，不缴租，并以保障永佃权为由，拒绝地主收地，实际成了变相“没收”土地。有的农民因各种原因无力耕种，任土地荒芜，有的地主因贫而不能自养，需要自耕以糊口，但永佃权却一律不允许地主收地、转租或自耕。显然，这项政策需要调整。

(六)、抵押地和典当地问题。抗战前，边区一些农民为贫困所逼，向地主或富有者“质地借钱”，届时如能依约还债，所抵押的土地可收回，否则，即归债主所有，这类土地称为抵押地。这是一种残酷的高利贷剥削，地主、豪绅、高利贷者曾以此办法巧取豪夺了农民大量土地。在减息和清理旧债中，农民强烈要求赎回抵押土地，与地主、债主发生严重纠纷。

典当地多是破产的土地所有者，因需要货币，但又不愿根本卖掉土地失去其所有权，于是即以一定典价和年限出典土地。典入者又多是需要土地但又无力以高价购买土地的人。土地典进后，使用权属典户，所有权属典主，在典期内，地无租，钱无息。典期满，典主即将土地赎回，否则，就无限期延长。这种土地关系是一种变相的借贷（视典主为债户，视典户为债主）和租佃（视典主为地主，视典户为佃户）的特殊结合。在清理旧债中，各地也同样

出现了典主与典户间的严重纠纷。

除上述一些主要问题外，还提出或涉及到游击区域的减租标准、灾后减租、战前旧债旧租的清理以及土地政策的执行办法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反映了边区土地关系和借贷关系的复杂性，也说明，随着减租减息的开展，以《单行条例》为代表的一套政策，不能完全适应实践的需要。

为使上述众多的实际问题能及时得到解决，在边委会尚未正式制定新的政策以前，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边区农民救国会常委会（简称边农常委会）经过详细的研究讨论后，作为研讨的总结，提出了一个《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实施办法》的文件，对包括以上主要问题在内的十个问题，提出了比较具体的解决办法。正如边农常委会所指出的，这个文件“非法令性质”，因此，边农常委会一面“函请边委会备查”，一面要求各级农会“与各级政府配合”，“以政治说服处理实际问题”。这个文件曾在各基层农会中传达讨论，由于法律程序不完备和以后情况的变化而未执行，但它促进了边区政府对《单行条例》的修订并为之提供了参考。

（二）

一九四〇年二月，边委会公布了《修正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简称《修正条例》）及有关执行问题的指示信第三十一号。边委会在解释《单行条例》的修正目的和内容时指出：在执行《单行条例》的两年中，“各地发生着非常

复杂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也很不一致”,因而“要求条例的比较具体化”,为此,“修正条例把发生着的复杂问题,尽可能的都有比较具体化了的的原则规定”。

《修正条例》共六条十八款和八项附则,除了重申“二五减租”,“一分减息”和取消一切额外附加及高利贷三个基本原则外,着重做了如下一些补充修正。

关于减租后的最高租额,明确规定“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关于伴种地的减租,提出以出租人对伴租人生产资料供给之多寡,按比例增收地租,“但出租人所得最高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二分之一”,规定了一个从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到二分之一的伸缩性;关于钱租或粮租问题,肯定粮租是主要形式,还规定如双方约定为钱租,其租金额亦不得超过正产物收获总值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关于正产物和付产物的分配,规定出租人只于正产物内取得租额,付产物“一律归承租人所有”;关于灾年减租,规定按正产物实收总额,由出租人与承租人依减租比例分配,如正产物全部被毁,则停付地租;关于“永佃权”问题,补充规定,出租人在不能维持生活、愿意自身耕作等条件下,可以将出租耕地收回一部或全部;关于清理欠租欠息问题,规定积欠在两年以上的,于减租减息后,出租人或债权人一年应得租息二倍,五年内分年偿付,结束积欠。两年以来,未曾执行政府土地法令的出租人或债权人,承租人或债务人所欠租息一律停付。多年旧债,按年利率一分一本一利计算清偿,其利息超过原本者,停利还本,付息已超过原本二倍者,本利皆停;

关于抵押地和典当地问题，没有区别对待这两种不同的土地关系，提出以反对高利贷的观点，用清理旧债的办法，把原来的土地关系变为新的借贷关系而加以解决。

《修正条例》基本上回答了两年多来减租减息实践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其内容比《单行条例》具体、广泛和深入得多。边委会鉴于对边区土地关系的复杂性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了解和认识，因而没有制定统一的实施办法，要求以村、区、县为单位，逐级提出本地的施行办法，以补《修正条例》之不足。同时，还要求各级政府认真研究《中华民国土地法》和边区土地关系，以利于更合理地解决战时土地问题。《修正条例》的主要缺点是对典当地的解决办法不妥，并由此而导致了在执行中，各地比较普遍出现的“把已卖脱的田地当做‘典当地’收回，三十年以上所谓‘典当地’也收回，而赎地又只换约不给现款”等错误。其次，在掌握统一战线方面仍不够平衡，对于缴租缴息和保障土地所有权注意不够，尤其是在当时的实际工作中，已经出现了“左”的偏向，需要从政策上加以纠正和引导，但《修正条例》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在贯彻《修正条例》过程中，又对两个重要问题做了调整和补充。

一是按照统一战线的精神，进一步兼顾农民和地主双方的利益，使这两个方面的政策趋向平衡。

一九四〇年八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边区政府的施政方针。对于土地问题，既强调减租减息，又强调“保障一切抗日人民

的财产所有权”，明确规定：在减租减息之后，“佃户须依约缴租，债户须依约偿付本息；一切契约之缔结，均须双方自愿，契约期满，任何一方均有依约解约之权”。这个纲领共二十条，边区人民称之为“双十纲领”。它是“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地方化和具体化”，它的颁布，在各阶层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同年九月，彭德怀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上，次年，彭真在《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建设和各项具体政策的报告提纲》中，都强调必须“纠正农村统一战线中‘左’的现象”，否则，“将危害到抗日根据地的生存与持久的坚持。”一九四一年，边委会又发出布告，“明令保障财产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切实减租减息，缴租缴息”。这些都弥补了《修正条例》的不足，使对地主和农民两个方面的政策更加全面平衡，“左”倾偏向也得到了比较彻底的纠正。

二是对土地税收政策做了重大调整。

边委会于成立之初，采用“合理负担”的政策，征收救国公粮。主要办法是：以户为单位，将每年全部收入折成小米，平均每人收入一石四斗以下的免征，收入一石五到二石的征百分之三，在此以上每增加收入一石，征收递增百分之一，增至百分之十为止。这个办法实行后，一九三八年全边区共征收救国公粮十四万石，一九三九年征收到的公粮等于期成数百分之八十七，超过必成数百分之七强。各阶层的公粮负担，大体上是，地主富农占一半多，中农十分之四强，贫农不足十分之一。这个办法带有暂时应急的性质，不免有许多缺点和不足。

经过三年的实践，一九四一年三月，边区政府根据“双十纲领”的有关规定，制定了《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和《实施细则》，正式提出了新税制。新税制把资产税、所得税等统一融合在一起，按累进的比例，实行每年一次的直接征收。为把各种财产及收入统一到一个单位来，规定“标准亩”为一个土地单位，各种土地一律按常年产量，每产十市斗谷（种植其它作物也折成谷）做为一个“标准亩”，再把土地和财产收入统一到另一个单位“富力”上来。“富力”以人为单位累进，以超额累进法折成分，征收时用每分负担量乘以分数，就是应缴纳的数量^①。

新税制颁布后，各村、区、县相继成立了有各阶层代表参加的“统累税推行委员会”，协助政府进行调查、评议工作。边区政府根据调查评议后逐级上报来的分数和全年的需要，在负担不超过人民总收入百分之十的原则下，确定每分的负担量，并以粮、秣、钱三种形式征收。为避免敌人“扫荡”掠夺和供分散的机关、部队食用方便，粮食一般都由本村群众分散保管，边区政府统一发行一种“公粮票”，部队和机关人员所到各处均可凭票领粮。

统一累进税改变了过去负担面过于狭小的缺点，纳税人口由“合理负担”时期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扩大到百分之八十，在实行的第一年就完成了二十万

^① 比如，某家五口人，七个富力，按税法规定，每人扣除一个富力免征额，余二个富力，每人平均为零点四个富力，属第一税级，每个富力折零点八分，共折一点六分。假定政府规定每分应缴纳税额为十市斤小米（边区政府规定的各年每分缴纳额均有不同），那么全家应缴纳十六斤小米。

担公粮的征收任务。由于边区人民一般都是经营农业或兼营农业的，因而统一累进税制也是土地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在保证财政军需上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对促进边区土地关系、经济关系向着新民主主义方向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

(三)

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它是“中央在详细研究各地经验之后，特将我党土地政策作一总结的决定”，标志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形成。晋察冀边区政府根据中央决定的精神，对边区土地政策再次进行了补充、调整。

一九四二年三月，边委会第二次公布《修正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简称二次《修正条例》），并制定了《实施细则》。在租佃关系方面，将过去所规定的伴种地的最高租额不得超过收获总额的十分之五，改为十分之六。对耕地付产物及其分配做了明确解释和新规定，提出付产物的种类和栽种位置，“均依当地习惯决定”，但不得超过耕地收获总额的十分之一，付产物的分配可沿袭习惯或双方的约定，但地主所得须在农民缴租总价内扣除。在借贷关系方面，补充规定出租人借给承租人种籽粮食，月息不得超过原借量千分之八点四。所有揭借契约均应按土地法规定另换新约，定有期限的，期限未满，一方不得解除，未定期限的，须经双方同意，改为定期契约。在保障土地所

有权和使用权方面，补充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不得将耕地转租他人。承租人无故一年不耕作或力能付租而故意不付，出租人可收回其耕地。出租人因契约期满，收回土地，必须自耕三年，始允任意出租。在契约期限未届满时，出租人出卖土地，原承租人有依约对土地新主人的承租权。累世租佃的土地，非承租人自愿放弃使用权者，地主不得夺佃。以上补充或修正内容的主要精神，在于进一步贯彻统一战线方针，使地主和农民双方的合理要求尽可能得到满足。

一九四二年，边委会又对统累税政策做了调整。为征求各阶层的意见，在四月十八日的《晋察冀日报》上，公开发表了根据一九四一年的实施经验而修订的《统一累进税则修正草案》，在此基础上，五月二日，正式发布了《修正税则》。它贯彻了四点基本精神：“甲、人人的收入都够纳税，纳税后人人都能生活。人人都要节衣缩食，渡过困难的两年，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乙、适当的减轻地主的负担，保障财权、地权。适当的再扩大一些负担面，贫农只有低微的负担，保障群众生活。丙、充裕军需民生并谋边区经济之发展。丁、具体而征，但能简者简，能明确者明确，以期执行之便”。边委会同时制定了修正的《统一累进税则施行细则》，《统一累进税审查委员会章程》和《统一累进税纳税分数评议章程》。由此边区土地税收政策体系更加完善。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的基本精神，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边区政府提出了《关于处理典地回赎问题的几项规定办法》和《关于执行处理典地回赎问题办法的指示》两个文件。首先，明确指出典

地与押地“两者性质不同，必须截然分开”，“当地应依借贷关系处理”，所谓典当地回赎问题，“实际就是典地回赎问题，不能牵涉押地”。其次，规定“处理典地回赎的纠纷，必须坚持保障地主土地所有权，保障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原则”，并且规定了回赎的具体办法以及回赎时增补典价、偿还旧债的具体办法。同时，还提出处理典地回赎纠纷，基本上要采取调解的方式，而“不要轻易采取判决的方式”。这一政策的制定和实行，纠正了在“赎地换约”中将典地与押地混淆的错误，也为顺利推行累进税减少了困难。

在补充、调整土地政策的过程中，边区政府还不断提出对于一系列特殊土地的政策。主要是：没收罪大恶极的大汉奸之土地财产，但对未参与汉奸活动的家属，“不得株连”。全家逃至敌区的嫌疑犯的土地财产，“由政府暂管，待其重回边区抗日时发还”；地主逃亡户而又未委托他人代管的土地财产，暂由县政府代管，未出租的土地，优先租给抗属和贫困农民。逃亡户返籍时，发还其土地财产；被日军抓壮丁、征劳工掳走的地户，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不变，暂由地方政府代为出租，其租金或租谷由承租人在原地户返回后付还；设于边区内外国教堂的土地财产（根据国民政府规定，其土地为教会向国家租用，非教会或外国人私有），在主事人逃亡时，应由教民共推代表管理，“如实无人主管的，则可由政府暂为代管”；对于荒地，先是规定，承垦人垦竣后即取得其所有权，以后正式规定，垦竣后“土地所有权仍归原主”，承垦人可“在五年内无代价耕种”；对于黑地（为逃避负担而隐瞒不报的土地），提出依

靠群众和基层干部调查，所有人须按期呈报，否则，课以罚金。此外，对于庙地、坟地、社地、捐地和学田等类土地，也都本着统一战线政策的精神，在尊重人民风俗习惯和适当削弱封建剥削的原则下，规定了具体的政策。特殊土地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战时边区复杂的土地关系。对于这类土地政策的制定也说明边区的土地政策的发展日益深入和完善。

如上所述，在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的三年中，边委会先后两次修正《减租减息单行条例》，进而又从不同方面做了补充和调整，这些努力都收到了良好效果。一些地方出现的“左”倾偏向，于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就纠正了，农村阶级关系得到缓和。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边区处在极端困难时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领导人民渡过难关，土地政策的调整为巩固统一战线，战胜困难和坚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这一阶段土地政策的实施，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地主阶级乘政策调整之机，采取“合法斗争”的办法，用收地夺佃，“明减暗不减”，逃避或转嫁负担、增加额外剥削等手段，抗拒和破坏减租减息，向农民猖狂反攻，他们往往是曲解或断章引用法令条文向农民进行反攻的，而一些地方的政府、司法机关和干部，由于对土地法令缺乏全面完整的理解以及执法中的片面性，不能有效地保护减租减息后农民的既得利益。这就出现了侵犯农民利益的比较严重的现象。这种现象自贯彻“双十纲领”时起，在一些地方就有所表现，特别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政策调整幅度比较大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北岳区的一

些县，一九四三年一月到十月的一万件租佃纠纷案，绝大部分是由地主企图加租夺佃所引起。地主反攻最严重的平山县，一九四三年一月到七月，就发生了土地纠纷讼案千数百起。这种现象引起了群众的严重不满，影响到农民生产和抗战的积极性，有些地方的农会会员，在佃权没有得到保障时，曾自动退出农会，以示抗议，但也有个别农民走到另一个极端，抗不缴租。

(四)

一九四三年一月，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标志着边区民主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会议对五年来边区减租减息政策与实践，进行了讨论总结，通过了《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等重要法令。该条令共六章四十五条，就土地政策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实施原则做了比较全面的规定。在租佃关系上，一方面重申二五减租和最高租额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的原则，并且对伴种地，正付产物之分配、灾后减租标准及土地使用权之保障也均较过去的规定有新的发展，为佃户安心耕作，努力生产和租佃纠纷的解决，提出了更加明确与合理的标准。另一方面又规定，佃户在减租后，要保证缴租。如承租承佃人“力能缴租而不缴”，或“积欠地租达二年之总额”，或“无故荒废耕地在一年以上”，虽契约期限未满，出租出佃人可解除租约。这就比较切实地保障了土地所有人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在借贷关系上，为了恢

复抗战以来一度停滞的借贷关系，促进边区农工商业的发展，提出除了禁止现扣利、出门利、印子钱等高利盘剥以外，借贷利率“由双方自由约定”。为了保障债权人之债权，规定凡依法成立的新债及减息后的旧债，“债务人应偿还之本息到期不能偿还时，债权人得依法追述，或依民法规定处理其质物或抵押物品”。在处理典地和押地纠纷上，本着照顾双方利益的精神，做了更为具体与合理的规定。为了合理解决租佃债息的纠纷，还从边区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规定了调解与仲裁的具体办法。

《租佃债息条例》的基本精神，在于照顾出租人与承租人、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利益，保障人民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以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和活跃社会金融。它是边区政府对于五年来土地政策的一个总结，也是一套比较全面和完整的土地政策体系。因而，它的提出标志着边区土地政策的正式形成。

一九四三年上半年，不法地主向农民反攻的现象还严重存在，尤其是在此时，由于抗战以来各地所订立的三年至五年的租佃契约大部期满或即将期满，一些地主便以此为借口，抓住对于自己有利的法令条文，收地夺佃，农村租佃关系处在比较紧张的状态。因而，全面贯彻第一届参议会制定的《租佃债息条例》便不能不首先从解决这一问题入手。

同年六月，在地主反攻比较严重的北岳区四分区，该区地委作出《关于当前执行土地政策（租佃债息条例之部）初步检查纠正右的偏向的决定》。接着，中共北岳区党委发

出《关于保护农民既得利益给四分区地委的指示信》，要求领导群众，采用合法斗争的形式，打退地主的反攻，挽回农民利益，并提出以平山县为教训，“作为各地斗争的借鉴”，使之“在此之斗争中成为工作深入转变的枢纽”。七月，中共北岳区党委书记刘澜涛发表《打退地主的反攻，全面贯彻党中央的土地政策》一文，提出“斗法”是当前与地主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全面详细地研究、掌握政府的土地法令，“学会援引法令中有利于基本农民群众的部分，来保护基本农民群众的利益，对地主阶级的反攻展开合法斗争”，又要求在“斗法”阶段，要“充分接受六年来联合与斗争的教训”，做到“适可而止”和“以斗争求团结”。刘澜涛还代表区委提出在各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详细检查土地政策执行情况的任务。自一九四三年六月起，从平山县到四分区再到北岳区，相继开展了检查土地政策执行情况和纠正右倾偏向的工作。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要求各地利用秋收时节对减租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为此，中共晋察冀分局于同月作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政策的指示》，把边区贯彻土地政策的情况分为五种地区：一是彻底贯彻执行的（北岳区和冀中区的一小部分），二是基本贯彻执行的（北岳区和冀中区的大部分），三是初步贯彻执行的（平北），四是尚未贯彻执行的（冀东区和北岳区的新开辟地区），五是曾经贯彻执行，后又因变质使群众利益丧失的（北岳及冀中区的一部分）。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分局提出了今

后的工作方针和重点。接着，边委会作出《关于贯彻减租政策的指示》，进一步检查分析了各地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在“反对执行减租政策的右倾”这一前提下，也要“防止农民报复造成地主惶恐不安等过左现象发生”，又针对实际情况，对《租佃债息条例》做了若干补充。由于各级领导机关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各地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右倾偏向，于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得到了纠正，同时，在许多地方开始了“查减”工作。这样，边区的土地运动转入正常发展的轨道，为全面深入地贯彻第一届参议会制定的土地法令创造了条件。

一九四三年秋冬，边区军民粉碎了敌伪“大扫荡”，开始局部反攻。北岳区恢复到一九四〇年的局面，平北、冀东的游击战争扩展到了伪“满洲国”境内，热辽两省也相继建立了根据地。随着军事形势的好转，自一九四四年起，全边区的减租群众运动普遍和深入地开展起来。在北岳区，领导机关以平山土地纠纷的解决为起点，将运动由点至面推开。各县领导干部大都亲自抓了“典型村”的减租试点工作，采取召开群众大会并配合以佃户会、地主座谈会、农会小组会等方式，发动群众，逐一解决问题。各县还举办了以贯彻土地政策为中心的训练班，组织学员参加各“典型村”的实习，培训干部，再向各村、区推广。在冀中区，掀起了群众性的大减租运动，行署针对该地区“五一变质”后的租佃纠纷问题，制定了《减租查租暂行办法》，经过一年的努力，基本上清算了五一后地主富农对基本群众已得利益的侵害。使基本群众重新取得了向上发展的基础。

在冀热辽区，特委根据分局的指示，制定了《关于减租运动决定》，结合本地区情况，着重强调对群众的发动工作，各地于秋收前后，相继开始了减租。总之，从一九四四年的情况来看，在已实行减租减息的大部分地区，进行了“查减”运动，把土地政策的贯彻引向了深入。在一部分尚未开始或初步开始的地区，包括新开辟的地区和变质后收复的地区，则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次减租是边区创建六年多来开展得最为普遍和深入的一次群众运动，各地对土地政策的掌握与贯彻比较全面，均未发生大的偏差，运动的发展也出现了由不平衡到相对平衡的趋势。

(五)

毛泽东在抗战时期谈到农民的作用时说：“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又说：“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①这个结论完全符合晋察冀边区的实际。那末，推动农民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如此伟大作用的主观条件是什么呢？主要是土地政策。它象一个杠杆，把千百万农民与民族解放战争联结起来。晋察冀边区的历史证明，土地政策充分发挥了这一杠杆作用，收到了显著的社会效果。

首先，土地政策的实施削弱了封建剥削，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民生。边区绝大部分地区实行了二五减租，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2—653页。

并以年利率一分的标准清算了旧债，取消了正租以外的一切额外附加。仅减租一举，就有百分之四十七的农户受益，如果再加上一部分承佃或伴种的自耕农，受益面至少在一半以上。从减息的受益面来看，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受益。在清理旧债中，农民还掀起“抽地换约”运动，使战前被高利贷者巧取豪夺的许多土地重新回到自己手中。减租减息后，农民获得许多实际利益，据一九四〇年六月边区农救会对北岳区一、二、三、五专区十六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共减租一万二千二百九十余石，减息三十二万零六百元，农民通过清理旧债抽回土地六万四千九百余亩。边区政府废除了战前的三十余种苛捐杂税，实行了公平合理的负担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一九四一年前，在“合理负担”和“救国公粮”政策中，贫苦农民的负担极少。一九四一年后实行的统累税制，纳税面宽了，但一般农民的负担仍很轻，以北岳巩固区调查统计来看，各主要阶层的负担面占其该年总收入的百分比为：雇农百分之二点多，贫农百分之八点多，中农百分之十二点多，富农百分之二十六点多，地主百分之五十三点多。显然，在晋察冀边区，农民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他们才有精力和心情发展生产和参加抗战。

其次，调节了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巩固了农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民主政治发展。

由于边区土地政策保障各抗日阶级和阶层人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既要减租减息，又要缴租缴息，对租佃、借贷关系采取调节方针，这就成了缓和农村阶级

矛盾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原因。边区创建初期，一些地主不了解政府的政策，逃至敌占区。土地政策贯彻后，事实教育了他们，于是又纷纷返回。有的地主还拿着“双十纲领”到北平去动员逃亡的地主回乡。有的地主说，政府保障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少收几颗租子有甚关系。有的农民说：一面改善生活，一面巩固统一战线，缴了租可以顾及地主生活，这是应该的。这样，地主愿意出佃，我们也有地种了。可见，土地关系的调节，带来了阶级关系的缓和。农民和地主都把抗日政权作为维护自己利益的机关，积极参加民主建设工作。一九四〇年，边区进行民主大选，参加选举的选民占公民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中心地区的一些县（平山、灵寿等）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冀中区七个县，雇农、贫农和中农参加村选者占其公民数的百分之八十七，参加县选者占百分之七十二点六，当选为村各委员会主任者占委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九，当选为村主席者占百分之九十点九，当选为县议员者占百分之八十二点一；地主和富农参加选举者占其公民数的百分之七十二点四（县）至百分之八十七点二（村），当选为村各委员会主任者占总数的百分之六点八，当选为村主席者占百分之七点六，当选为县议员者占百分之十七点七，而地主和富农当时仅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点五。农村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实质上是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边区土地政策的全面实施调节了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对于巩固农村抗日统一战线，促进民主政治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再次，激发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为边区持久抗战

创造了物质基础。

边区土地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扶助农民。因而，在减轻了封建剥削，土地使用权得到保障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便大增。八年中，边区农民在敌伪“扫荡”扰乱，耕地减少，劳力不足，牲畜缺乏以及连续自然灾害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如下一些办法，坚持和发展生产：精耕细作，提高土地亩产量；以民办公助方式，凿井开渠，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滩地，扩大耕地面积；组织起来，建立拨工、变工、包工等劳动互助组织，以克服劳力、畜力和耕具的困难；适应战争环境，“劳武结合”，坚持生产；发展家庭副业，增加收益；开展生产大竞赛，评选劳动英模和生产模范村、模范区、模范县等。正是广大农民这种高度的生产热忱，才能使边区持久抗战的物质基础得以保障。

第四，动员了广大农民自觉地支援和参加抗战，为边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直接的巨大的贡献。

农民占边区人口百分之九十，无疑是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八年中，边区抗日部队猛烈扩大，主要是成千上万农民踊跃参军的结果。各地农民还直接参加战斗。一九四〇年春季的反“扫荡”中，边区十七个县有二万多农会会员参战、配合作战、扰敌三百余次。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二年间，冀中民兵作战牺牲者达一千六百余人。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正太路沿线民兵二万多人，组成五十多个大队参战。冀中一次即动员了民兵三万多人，大破石德路三百里。冀东组织了八万多农民，把日伪在七、八个县内

的公路电线破坏得干干净净。八年抗战中，边区民兵发展到六十余万，他们所创造的地道战、地雷战等，曾使日伪军胆战心惊。由于边区土地政策的实施，使农民获得实际利益，这是他们积极支援和参加抗战的经济原动力。

第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地占有关系及阶级关系的变化，增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力量。

八年中，土地政策的贯彻执行，引起边区土地占有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一些变化。这种变化的总特点是：两极（贫雇农和地主）缩小，中间（中农）扩大，土地由集中趋势转变为分散趋势。

我们仅以北岳巩固区部分村庄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的调查材料来分析：

雇农占有土地的比例数，由百分之一点一八降为百分之零点七五，户数和人口的比例数，分别由百分之七点六和百分之四点八二降为百分之三点二三和百分之二点四一。雇农中约有三分之一强转为贫农，约有十分之一强转为中农，还有小部分转而经营小商业。

贫农占有土地的比例数，由百分之十七点九二上升为百分之十九点三七，户数和人口的比例数，分别由百分之四十点四七和百分之三十五点七一降为百分之三十七点七二和百分之三十三点九四。贫农中约有五分之四弱保持原有地位，约有五分之一强升为中农。

中农占有土地的比例数，由百分之四十一·九六上升为百分之四十九·一四，户数和人口的比例数，分别由百分之三十五点四二和百分之四十点五七上升为百分之四十

四点三一和百分之四十七点四七。中农中绝大部分保持原有地位，只有少数下降或上升。

富农占有土地的比例数，由百分之二十一点九三降为百分之十九点五六，户数和人口的比例数，分别由百分之五点九一和百分之八点四五降为百分之五点八和百分之七点八八。富农中约有十分之九强保持原来地位，其余的一部分降为中农，少数上升为地主。

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数，由百分之十六点四三降为百分之十点一七，户数和人口的比例数，分别由百分之二点四二和百分之三点六一降为百分之一点九一和百分之二点五一。地主中约有十分之一强降为中农、贫农或小商人，另约十分之一强转为富农。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雇农的土地、户数和人口都大为减少，其地位上升者比重很大。贫农的土地增加，而户数和人口则明显减少。中农的土地、户数和人口增加比重最大。雇农、贫农和中农中，除有一部分地位上升外，保持原地位者，在经济实力上也加强了。富农的土地、户数和人口都有些下降，由于边区富农带有浓厚的封建性，所以初期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一九四二年后又有所上升。地主则是全面下降的，特别是其土地减少的比例最大。

边区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变化，除了主要表现为上升或下降，即雇农、贫农、中农的上升和地主阶级的下降外，还有一部分转变了生产方式。促成边区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土地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一般农民来说，减租减息大大削弱了封建剥削，

废除杂税苛捐及合理统累税又大大减轻了他们的负担，因而刺激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并使之有能力抽回过去被地主阶级巧取豪夺去的土地，或买进与典进土地，或垦荒扩大耕地，这是上升的基本原因。相反，由于地主阶级所凭籍的高额地租和利率大为减少，一切额外附加及超经济剥削被取消，同时，又对他们征收了较重的税收，因而他们便生产消极，并为逃避减租和负担，大量出卖、出典土地，或分家分散土地财产，这是下降的基本原因。边区政府为吸引资金，鼓励工商业与合作事业的发展，采取免税或只征轻微税的政策，促使一部分认为出租土地或放债无利可图的地主及个别富裕农民，利用土地和资金投资于工商业，这又成了转变生产方式的一个基本原因。无论上升、下降或转变生产方式，都是对地主阶级经济和政治的削弱，进而增加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力量。

阵中日记(摘录)

编者说明

东北人民解放军（一九四七年以前称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记下的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的《阵中日记》，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它历史地详细地记载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军事方面的有关指示，各纵、各师的来往电报，我军的战略方针、战术原则以及行动部署，敌情的变化，敌我双方的地理位置等，并附有大量草图。这本日记对中共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以及对军事理论的研究，都有着较高的价值。

这本《阵中日记》已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军委档案馆编辑出版。本期节录刊登的是《阵中日记》中四保临江、三下江南部分。

一九四六年十月间，国民党军确定对东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集中九个师十万兵力，分三路向我南满解放区进攻。十月三十日，南满我军发起新开岭战役，全歼敌二十五师共八千九百人，活捉该师师长李正谊。这次胜利，虽然给了敌人以迎头痛击，但并未阻止住敌人推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方针。敌人继续调集兵力，准备大举向我南满进攻。十一月间，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开始了战役准备。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整个战役从十二月十七日开始，

到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结束。具体战斗时间，现在还其说不一，这本日记提供了一些根据，现还是按一般的说法：一保临江，从十二月十七日至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三纵在四纵配合下，歼敌五千余人。二保临江，从一月三十日至二月八日，南满我军于高丽城子、三源浦前后共歼敌四千余人。三保临江，从二月十三日至二月二十三日，我军于通沟、大北岔地区歼敌七千余人，收复辑安、金川、辉南等重要城镇。四保临江，从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三日，我军于红石砬子歼敌八千余人。南满我军，前后粉碎了敌人四次对临江的进攻。为配合南满部队作战，北满我军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至十七日，一下江南作战，歼敌四千余人；于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二下江南作战，歼敌一个团；于三月八日至三月十六日，三下江南作战，歼敌八十八师全部和八十七师大部。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整个战役历时近四个月的艰苦斗争和连续作战，我军先后共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收复城市十一座，坚持了南满根据地，巩固了北满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从此，东北敌军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转入守势，我军则完全转入主动，从而扭转了东北的整个战局。

一 九 四 六 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于程家窝棚

南满情况及部署〔据南满二十二日报〕：

(一)敌新二十二师于清河城、新开岭、碱场一带，各控制一个团清剿宽〔甸〕、桓〔仁〕以西地区。五十二军二师一部守备安东〔今辽宁丹东〕，主力于宽〔甸〕、桓〔仁〕带；一部配合由灌水进至柏林川之北占八河滩之九十一师一个团，打通宽桓路并配合二十二师与我主力决战。一九五师

守备通化，其分布于也亩地、大泉源（通化）之五八三团各一部南犯，分占西江甸子、小苇沙河，图犯头道崴子（通化南）。三十师分布于柳河、海龙、金川、孤山子、三源浦一带。兴京、永陵驻一九五师二七一团。通化敌对我暂采取守势，但也有可能待宽桓敌与我主力作战，乘隙南犯辑安，切断我主力退路。新十四师除主力于辽南一、五分区清剿外，四一四团配合一八四师残部向新金、复县地区压缩。

（二）根据以上情况，敌人目前正积极清剿，在已占领区修筑公路，安设据点，实行军事政治清剿，并以宽桓间地区为目标，集中主力寻找我主力报复^①作战，通化〔敌〕可能以一部南犯，乘机抢占辑安。故我目前方针，不利对敌举行大的攻坚战，尚应以主力一部分散，结合党政民与敌展开反清剿斗争，坚持地区，提高支持群众信心，打击敌人薄弱部，歼灭敌人出击部队及土匪、警察、大团^②、特务，逼敌主力收缩守备点线，使敌孤立。我主力集结于机动位置，仍寻求在运动中歼灭向辑安南犯之敌，兹布置如下：

（1）四纵除以十二师一部精干武装挺入宽甸、凤城、赛草河口安奉线两侧地区，以高度之机动灵活性，破敌交通，打敌小股出犯部队及薄弱点，分散敌之注意力，策应辽南作战外，该师主力应坚持宽桓间活动，打击由宽甸向北进攻薄弱之敌。纵率主力迅速转移至桓仁以东地区价甸

① 指南满我军十月三十日发起新开岭战役全歼敌二十五师后，敌企图对我军还击。

② 地主武装。

子、黑瞎子川带隐蔽集结待机，配合三纵主力打击一九五师可能向南进犯辑安之敌，并以一个团接替八师二十四团防务，积极向桓仁活动，使二十四团归还建制。

(2)三纵八师主力隐蔽集结铁厂子及其以南地区，并以二十四团伸至二道崴子附近迟滞通化可能南犯之敌，掩护主力集中。七师于原地不动，以小部队逼近二道江带活动，监视通化之敌。九师以一个团带机动〔电〕台挺入通化以西地区，恢复工作，破坏交通，与独二师保持联络。

(3)独二师由解沛然^①同志率领挺入孤山子以北地区活动，打击敌之薄弱部，配合二十四旅破击吉海路之行动，并继续查明金川、辉南敌调动情况。

(4)独三师布于新宾、营盘、清源之间地区，破坏铁路，打敌运输，袭击薄弱据点。

(5)独一师按前军区指示执行。

(三) 注意事项：

(1)各挺入敌区部队应轻装精干，补足弹药，机动灵活，作突然积极游击活动，打敌弱点，兴奋群众，镇压特务、反动地主、打击清剿小部队与地方团队，破交通，破电话线，进行大翻身^②断敌运输、联络，支持地方，收集粮食，恢复地方工作。

(2)主力积极补充并加紧争取俘虏的教育。

(3)各部行动常驻地力求隐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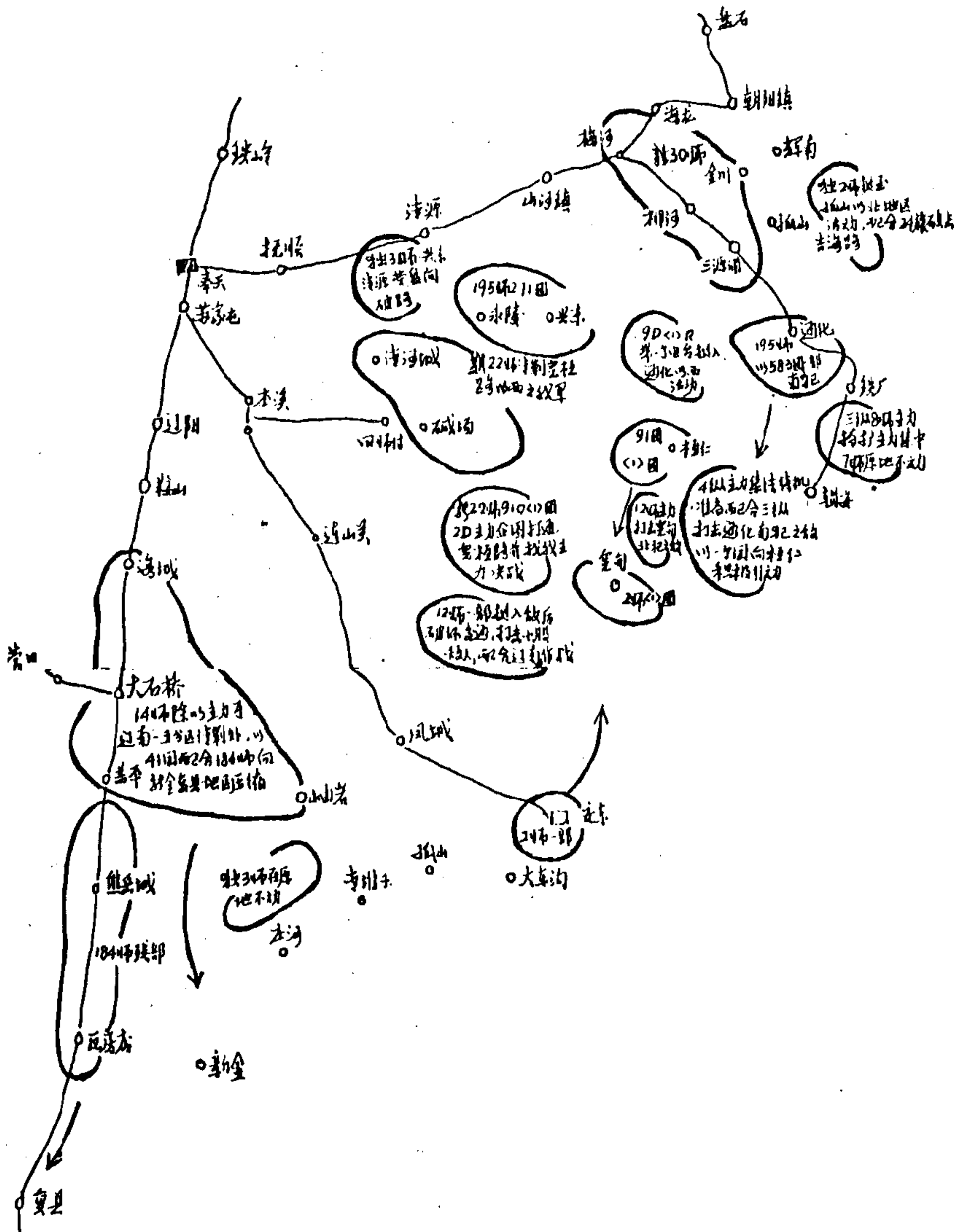
(4)派出地方工作队，协助当地政府恢复工作，征集

① 即解方，当时为辽宁军区副司令员。

② 指破坏铁路时，把铁轨枕木大翻个。

粮食。

南满十一月二十二日部署:



十一月二十八日 于卡伦房子

拟打靠山屯增援。

钟王王^①二十日报：敌二、三十人渡河，被我侦察连逐回。现敌在靠山屯与万金塔之间积极活动，并在三处辽西渡口企图渡河，估计敌敢于渡河时，兵力最少在一个团左右。建议一、二师随时配合作战，在作战方案上，最好是我们今晚撤离靠山屯，运用渡河，然后以两个师插到河南截断其归路，再以两个师配合全部枪兵歼敌，另一个师箝制农安之敌，如何请示。

军委二十二日电：全国情况与关内敌军分布：

(甲)冀东、冀中及晋察绥共十二个军三十四师二十六万人。九十三军军部及暂编十八师、二十二师分驻赤峰及其西北地区，暂编一二一师〔驻〕叶柏寿，六十二军及军部、新二军军部以及一五一师驻天津，九十五师〔驻〕北平，一五七师驻唐山，九十二军军部及二十一师驻蓟县，一四二师〔驻〕玉田，五十六师〔驻〕通县，十三军军部及五十四师驻承德，八十九师及四师驻延庆至怀柔段，九十四军军部及五师驻涿县，四十三师驻桃花堡，五十三军军部及一一六师驻涑水以北之石亭，一三〇师〔驻〕涑水，十六军军部及二十二师、九十四师驻蔚县，一〇九师驻怀来以西之下花园土木堡，三十一军（青年军）军部及二〇八师、二〇九师驻北平及其近郊，三军军部及七师〔驻〕石家庄，三十二师〔驻〕新集，傅作义之三十五军军部及新编三十一师、新

^① 指二纵五师师长钟伟、政委王风吾、参谋长王良太。

编三十二师驻蔚县以北郑家沙窝地区，暂编三军军部驻集宁，暂编十师〔驻〕归绥，暂编十一师〔驻〕丰镇、宣化，马占山之东北挺进军军部及新编骑兵五师〔驻〕阳高，新编骑兵六师〔驻〕天镇，新编二十六师〔驻〕萨拉齐，新编骑兵四师及上两师均直属十二战区指挥驻蔚县以北。

(乙)山西晋阎共五个军，十五个师八万人。(分布情况略)

(丙)晋冀鲁豫共十五个军，三十七个师，三十四万人。〔分布情况略〕

(丁)山东计十二个军，三十三个师，二十五万人。〔分布情况略〕

(戊)陕甘宁边区，计十八个军，二十六个师，十八万人。〔分布情况略〕

(己)整个华北包括陕甘宁边区，国民党使用总兵力计五十二个军，一百四十五个师，一百七十一万人。

十二月一日 于两家子

南满〔报〕：敌五十二军五团六团，由该师副师长平尔鸣指挥，自永甸河向松北太平哨、沙尖子进攻，占沙尖子后，留一部兵力守该地，主力配合九十一师扫荡宽〔甸〕桓〔仁〕路南及浑江一线我军，以作实现第二步进攻准备，第四团仍在安奉线守备，并不时出动一部兵力扫荡凤城以东我军。又电：九十一师两个团，二十八日向白菜地扫荡，尔后向浑江前进。赵公武^①二十八日早调查桓仁至辑安道

^① 国民党东北第三绥靖区司令兼五十二军军长。

路地形。杜聿明^①为扫清安奉路^②东我军及凤城、宽、桓间我军，巩固该地区，令十四师由岫岩逐步向凤城以北协同二师、二十二师扫荡宽甸以东、桓仁（不含）平顶山（不含）以南地区，并与二师主力相配合。

十二月四日 于两家子

二纵报：古店、拉拉屯、小辛店敌二千余，汽车五辆，装甲车二辆，二道沟、房身沟敌未动。六师已到，我们决心以四师六师于五日向拉拉屯、古店之敌实行大胆包围佯攻，并求得歼敌之一点，此行动更能调动敌人，有利我主力作战。

肖^③报：杜聿明上月二十五日令二十二师主力向官园集结，由十四师、九十一师负责平顶山、葺子峪一带清剿，二十八日令三十师向公主岭集结。敌十四师师部率一个团由岫岩北撤凤城，有全部集结凤城息，二师防务交二十五师。现二十五师师部于安东，二师全部有集结宽甸、太平哨息。又电：马占山^④带一个师上月底到辽南岫岩。

程罗唐肖^⑤报：上月三十日，敌一九五师集结通化至沙尖子，二师集结宽甸至太平哨，二十五师集结安东，十四师集结凤城，一八四师集结复县附近，二十二师集结本

① 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

② 安东（今丹东）至沈阳铁路。

③ 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劲光。

④ 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

⑤ 即指辽东军区副司令员程世才、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罗舜初、副政委唐凯、副司令兼副政委肖华。

溪。根据当前情况，敌一面清剿，巩固其已占区与对我正面实行侦察性进攻，一面正准备新的作战。望四纵电台告祝^①，于路西配合独一师积极行动，乘机恢复乡村，告三团五团查明凤城、宽甸敌人动向，三分区应查明碱场、清河城敌人动向，并向敌区积极活动，独三师一团须按前电示，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挺进敌后。

十二月七日 于两家子

一纵报：我们率二师于本日下午到达新店、马家烧锅及其以北地区。

六纵报：部队新的部署如下：十六师归还建制，电到后即取捷径向拉林河北、双城西南，以厢红旗头屯为中心，及到正红旗厢红旗各村庄；十七师八日黄昏由现地出发，以拉林河北（铁路以东）之高家窝棚及周围八里路以内村庄；十八师八日黄昏由现地出发，移双城东正兰旗各屯；纵队移双城，高家窝棚、三岔河兵站移双城南厢兰旗五屯。望各部自取捷径到达指定地点，并注意防空，保守秘密。

二纵报：我们现抵孤立营子西北五十里之查干庄，我们均于明天下午二时以后出发进到指定地点，并注意长岭情况，在行军中应随时准备与敌遭遇。

周陈^②报：警二旅应全部进入江西地区积极行动，造成对桦甸及吉海线之严重威胁，有效地牵制敌人北援，并

① 即安东军区二分区司令员祝顺鹏。

② 即吉林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

组织数人短小精悍的爆破组与破坏工具，进入磐石南北地区，积极进行反复的偷破，以配合北面我大兵团之作战，掩护破路部队之行动。主力应在正面积极活动，集中兵力消灭薄弱据点，多打小胜仗，提高士气。

十二月八日 于两家子

北满地区我军主力仍于江北待机。

吉北部队开始南渡。

沿江群众因得到土地，参战十分踊跃，各种工作做得很好。

十二月九日 于两家子

南满六日〔报〕：据审俘悉，东北保安第四纵队（系北满收编之土匪），现改为新九师，由长春出发于大石桥下车。师部驻岫岩，师团部带一个营驻孤山，有两个连驻龙王庙，二营驻白旗，三营驻岫岩，全部有六百人。十一团在长春可能未动。十二团于海城下车，去向不明。新调辽南之敌，全系杂乱队伍。

十二月十一日 于双城

六纵十日十时报：三岔河到双城铁道，拟于十二日开始破坏，拉林桥待三岔河物资北运后，再行炸毁。存三岔河之粮食，应责成粮食局负责北运或运往侧翼。

三五九旅十日十八时报：旅直于本日已到达五棵树一东之刘家店与七、九两团会合，现部队加紧动员整训。

南满方面，敌继续扫荡，并作进攻准备。

郑洞国^①已赴通化。赵琳^②率军直属队及十七师主力，守备桓仁。十七师一个营在大清沟门，二十七团由新宾向火石咀子扫荡，并有一部进驻峭岭以西，拟九日向下湾子扫荡。

二师已于八日占沙尖子。杜聿明着正住〔在〕桓仁之七十一军（赵琳）〔以〕有力一部驱逐石河子我军，并逐出石龙附近，与二军取得联络，准备大攻势。

杜〔聿明〕三日令二师扫荡浑河两岸，然后开往桓仁集中，九十一师扫荡桓仁以南，相机向浑江以南扫荡，一九五师扫荡通化周围，相机前进，扫荡通化以南。

十二月十四日 于双城

南满方面：敌作进攻辑安准备。二十二师调梅河。

九十一师（欠一个团），因道路困难，仅到达大西岔（桓仁）。

二〇七师一个团在新宾，一个团在下湾子以西，师部及一个团（欠一个营）在平顶山、沙尖子，一个营在营盘。

十七师（欠一个营）守备桓仁，一个团在大青沟门，另一个团及九十一师一个团扫荡大城子、拐屠子地区。军部及直属队在桓仁，二兵团在永陵。

确息：二十二师（欠六十六团）全部于十二日可到梅

① 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

② 国民党军九十一师师长。

河口、海龙。李涛^①问杜〔聿明〕：是否接梅河、海龙防务？

赵公武十二日电刘玉章^②，着二师准备进攻辑安。沙秦子桥已架好。

十二月十七日 于双城

北满方面：六十军有南调消息。其塔木为三十八师一一三团，该团有两个营驻九台。六十军二十一师驻大岗。乌拉街防务交第三保安区队。

南满方面：敌拟向辑安进攻。

九十一师（原九十一师一个团）十七日扫荡猪胡子沟以西后，经东尖刀岭、西岔沟前进，军主力之二十七师（九十一师之一一个团）经里岔路子、拐磨子、霸五槽前进，其余部队经黄甸子向辑安扫荡前进。

十二月十八日 于双城

北满方面：五师十七日二十二时报：五家站确无敌军。其以南之马场滩有匪四百余，靠山屯有敌军六百人，德惠约有敌三千人，新里站南之新打井，昨到土匪五、六十人，抢劫四十多分钟后南窜。

六纵十七日报：十六日午，匪骑二百余突袭新站与公刘油房，绑走农会会长、民兵等数十人，十四时南窜过江。敌在新站、五家站也捕人经“教育”后放回建立特务关系，侦察我区情况

① 国民党军新六军军长。

② 国民党军52军第二师师长。

东满方面：三师调离东满后，开始破坏蛟(河)敦(化)铁路，蛟河群众很恐慌，物价突涨，市场拒绝使用我票子，特务较前活动积极。

西满方面：十六日杜聿明处的赵琳称，座命六十四号实施时间改为二十日，各部于此时间内应彻底肃清防区之“奸匪”。

顽第三快速部队(二〇七师)欠一个旅，在关内的部队十七日向沈阳运送。

十二月十九日 于双城

北满方面：敌调集长农。另似积极准备北进。吉林现集结六个保安团，每团千人，敌正向德惠、吉林运送粮、药。据长春四纵队传息，蒋[介石]令杜[聿明]三个月接收哈市，杜因时间短促，要求五个月内接收哈市。

南满方面：十四师集结，似有新行动。

后情^①十九日报：潘玉昆^②致杨军长称，李红光支队等万余人，由大道江以东北窜，六三四团并一部向四十四团前进。遵照十三日电，指挥八十八团及某师一个团进剿。

十二月廿日 于双城

北满方面：敌加强吉林防务。

东满方面：周[保中]陈[正人]十八日报：我们郑重讨论了十四日电示，认为所示多项，完全正确，并初步地检

① 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司令部情报处。

② 国民党新一军五十师师长。

讨了军区及各部军事指挥中的问题。大家认为，省委几月来确定的军事方针，即：积极向外发展的方针，尚末完全执行。主要原因是我们对各方面缺乏及时督促检查，部分指挥人员存在单纯防守偏向。对此，我们缺乏及时指责与纠正，致使某些部队消极无力，影响任务的完成。为克服缺点，特作如下决定：

一、在干部中，特别是在军队干部中，开展反对单纯的防守思想教育与斗争，从政治上、军事上查找这种思想产生的原因（害怕敌人、害怕困难、思想保守等）及其害处，以坚定斗争的信心，提高政治思想，认真贯彻积极向外发展的方针。

二、为了有力地配合南满斗争，争取冬季开辟江西路面游击区，决定二十四旅、二旅，除以小部巩固江东外，两个旅的主力应在江西地区积极活动（包括伊双地区），寻找机会，勇敢地打击敌人，以多打小胜仗为原则。

三、组织坚强灵活之游击队，配合地方，深入伊〔通〕双〔阳〕地区，生根立脚，创造游击区，必要时，以主力一部集结该地区以协助之。

四、坚持与发展桦南焦石之游击区后，建立与巩固伊〔通〕双〔阳〕地区的联系，并直接配合江东斗争。

五、为加强与统一前方军事指挥，决定暂以天际、人仿^①同志配以少数人员，先到吉南（昨日已动身）。

十二月廿一日 于双城

^① 即吉林军区副政委唐天际、副参谋长钟人仿。

北满地区：敌利用地主、土匪向江北推进。

五师二十一日十五时报：本日来农安、哈拉海、伏龙泉等处，情况无变化。王府以南胡匪活动猖狂，地方武装叛变，王姚区队一个班被消灭。今日三井区多家地主暴动。

西满地区：邓陶高^①二十日晚报：骑〔兵〕支〔队〕不日出发，先协同五分区部队收复舍伯图，然后进入奈曼打击进攻之敌，稳定路西，进而与一分区骑兵去法库。

敌人欲策动收复开鲁。请即告刘吴^②纵队，接替太平川保一旅防务，使其早日西去。

长岭、保康之敌，约一个营与几百编匪，虽已完成工事，但兵力不足；可以采取打敌方针。

十二月廿二日 于双城

南满方面：敌全面进攻南满。二十一日，敌向辑安临〔江〕蒙〔江〕开始全面进攻，以先占辑安为目标。

九十一师师部率二七一团大部由桓仁向东南四道岭子前进。二七二团二十日至霸王槽，二七三团至影壁山。

敌二师二十日以五团为右纵队爬窑山奔向三岔甸子，六团由东刀尖子为左纵队向东进犯中。四团主力仍在沙尖子、红石砬子一带。

一九五师五八四团二十日由通化二道江向东进犯。五八三团二十日晨由头道崴子向东进至夹皮沟、杨木桥子、大蛟子沟、双岔河、通天沟、榆树林一带。

① 即辽吉军区司令邓华，政委陶铸，参谋长高鹏；

② 即二纵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

敌十四师四十二团集结于凤城,有向安奉线移动迹象。

十二月廿四日 于双城

总的方面,敌拟向东北增调三个军。

北平二十一日电:沪美舰挂商局旗运三个军到东北。

沈阳北运军车极繁忙。东北二十五万敌军已取得美国防寒装备。根据上述情况,敌军在冬季有新行动,须注意。

军委二十一日电:新六军即扩为第六总队,各师扩为军,各团扩为师。

新六军之二十二师、十四师及七十一军之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均已伤亡十分之一。东北各军干部不满,多混水摸鱼,下级约有十分之七、八也如此。

南满方面:九十一师继续攻击前进。

后情二十三日报:唐守治二十一日抵朝阳镇,二十一师之九十六团、三三〇团由朝阳开往桦南,九十一师直属及十七师于三道阳岔及下四平以北,二十七师于万龙菜园,七十一师于蜜蜂沟。

二十日二师已于当晚赴宝山、横路沟、大泉眼之线。

新六军运输师拟南集,由李梅、景进中使用。

十二月廿五、廿六日 于双城

敌继续调集兵力进攻南满。

二十五日二十二师六十六团仍集结梅〔河口〕海〔龙〕,小部在梅河口,正准备出动。三十师八十八团集结金川,二十三日一部向蒙江方向出犯,当日返回辉南,二十一师

(由吉林方向开来的一个团)二十三日一部向南出犯。梅河以东之孤山子为潘部叛变者约三百人。三源浦为二十一师部队守备。

二十三日付宗良着七十八团运输师围剿上下肥地、红土庙子(凌沅西北)之我军。唐守治(原卅师师长)二十三日到金川。

十二月廿七日 于双城

南满之敌，正布置清剿与进攻。

总情^①二十七日报：

一、赵琳部已于二十六日进至杨木桥子、欢垚岭地区。二十一师正从土口子和大蚊子沟向四道江扫荡前进。同日，杜聿明率军占领四道沟之后，即固守该地，掩护二三部北运。

二、十四师一部扫荡新宾以东四十里地区，主力置于通化，策应二三五部战斗。

三、三十军(新三十师)之八十八师及新二十二军等扫荡队集结海龙，统由李涛(新六军军长)指挥，即日动身〔前往〕通化以东地区扫荡。

四、廖^②正布置赛马、承吉河、平顶山、四平子、石头沟及老李山等地区之反复扫荡。

十二月二十八日 于双城

① 即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情报处。

② 即国民党东北保安第四兵团司令廖耀湘。

东满二十八日报：十四日盘石增桦甸之敌，系七支部十九团千人(内有日本人四百)，服装整齐。确否待验。

盘石之敌，十四日增三千人，扬言进攻蒙江。

十九日由朝阳镇增舍民屯之敌三百余。同日，吉林敌千余至旺起屯，二十日又至常山屯。另有一炮兵团驻常山屯东南半拉窝棚，有敌八百余。旺起屯以东之江东大山富河附近，有土匪七百余。

南满地区：九十一军军部及十七师驻扬木桥子、欢垚岭一带；二十七师达大蛟子沟附近，工兵团及十□师之五十一团守备桓仁。

十二月廿九日 于双城

北满地区：我军积极备战。

曹^①二十八日报：至今，各部均派队伍向敌游击，麻痹敌人。

一纵根据总部指示，经研究决定目前主要工作：

一、立即出动作战，并编写作战教材在干部中组织学习，进行政治教育工作。作战以主力运动为主。

二、统一后勤组织，统一供应，调整干部。全纵各师后方，全部逐渐集中。

十二月三十日 于双城

二纵二十八日二十二时报：敌对南满进攻如何？总部

① 即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属独立师师长兼吉北分区司令员曹里怀。

如决心在北满发动攻势，以配合南满作战，主力尚未确定时，我建议根据目前情况，以长岭、郑〔家屯〕白〔城子〕地区，先组织一战役，确实有利。此间为敌薄弱之突出部分，且为战斗力较差之八十七师驻守。如能集中二纵全部（五师在内）与保一旅，再配属以炮兵团，估计可能歼灭敌一个团或两个团。但必须有充分准备，特别是粮草动员。在一月十日前后开始战斗，时间预计一星期，长〔春〕农〔安〕线、长〔春〕白〔城子〕可以少数部队进行牵制，配合这一战斗。打的好，可能调动敌后一部分兵力，相机再扩大战果，你们是否同意。

林彭高^①三十日复电意见：敌仍在南满进攻，我北满部队先打，你们以战役配合，然后再将一、六纵队进行德惠方面之作战。五师归你们指挥。

一 九 四 七 年

一月一、二日 于双城

一纵一日十二时报：根据敌五十师仍驻德惠、五松屯及其两侧地区，三十八师除一个团驻长春，一个团驻老爷岭外，其一一三团分驻其塔木一个营（工事甚坚固），其余分驻乌拉街等处。二十一师在吉林天岗之线。

我纵拟首先歼灭其塔木之敌，并扑灭其第一次任何增援。各师均于明日由现驻地出发，以两天行程进到下列位

^① 即东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政委彭真，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高岗。

置集结进行攻击准备：第三师立即进到秀水甸子附近，第一师集结榆树南之夏家屯、兴隆店一带，第二师集结炮手屯、赵家屯及其以南地区。曹〔里怀〕伍^①部除一部分散担任边防坚持外，其机动力量集结黑林子。纵队指挥部进到曹家屯。

一月三日 于双城

北满：五师原地待命，一纵、独一师进到准备位置。

南满三日报：九十一师今日开始由六道沟门向桓仁西去，一九五师两个团已向四、五道江进攻。

现决定三纵主力先消灭四、五道江之敌，并准备在通〔化〕辑〔安〕线上，连续作战，破坏其封锁计划。

因三纵集中作战，蒙江兵力薄弱，东满之二十四旅、警二旅已到蒙江北地区。如有情况，建议该部及时以一部协助参加保卫蒙江作战，并与我们互取电台联络。

一月五日 于双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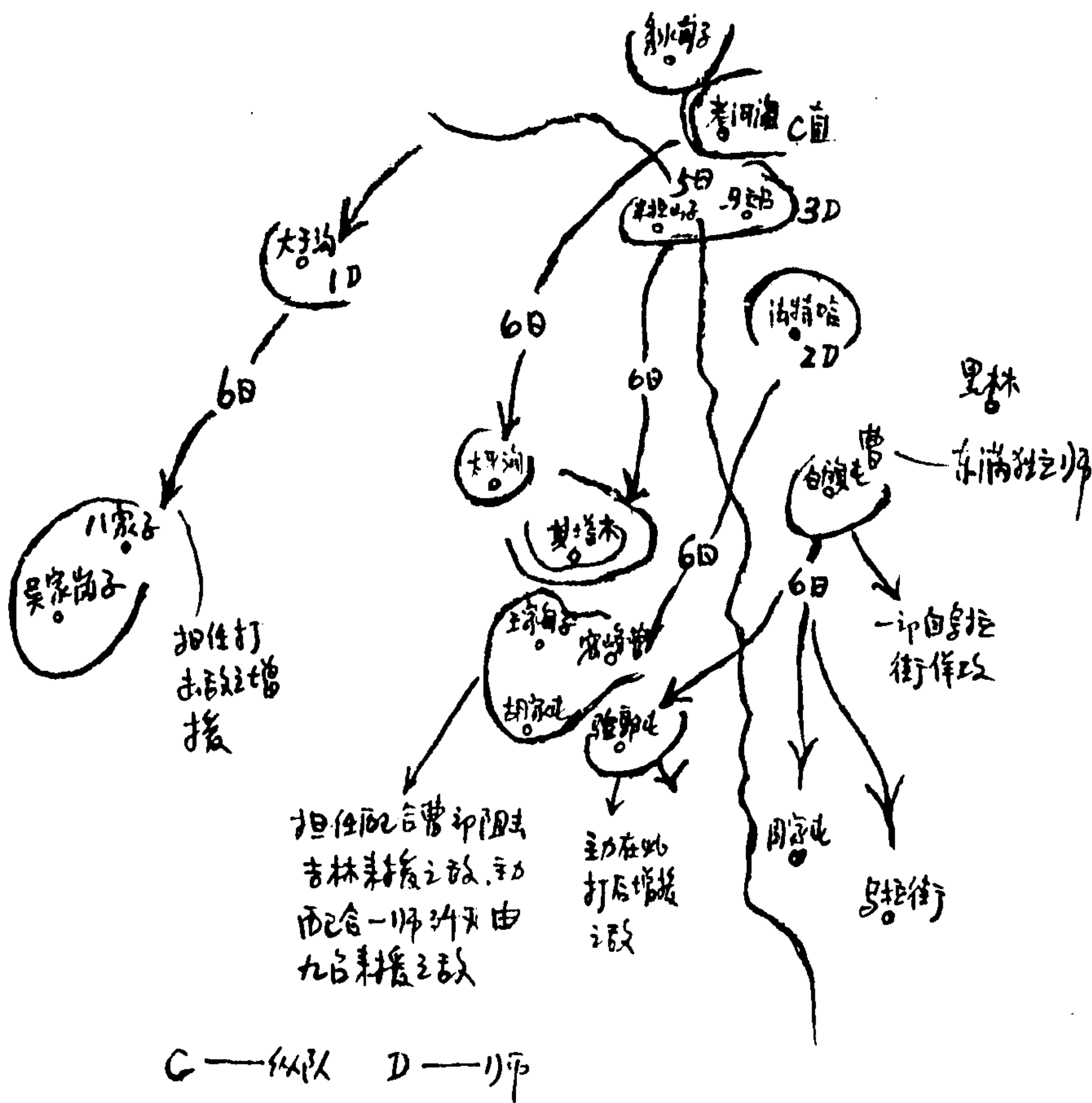
万^②纵四日二十一时报：五日到达位置及进攻部署：
(见下页图)

辽吉三日报：舍伯图敌步兵八百，降队土匪九百余，今日军骑兵师到钱家店附近。一分区二十五团及蒙一、二师围舍伯图，打降队，最好保一旅来歼灭该敌。

东满四日报：警二旅及二十四旅一部决于五日攻击桦树林子，一切已准备就绪，攻击得手后，将二十四旅转向

① 即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属独立三师政委兼吉北分区政委伍晋南。

② 即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万毅。



蒙江行动，配合南满部队作战。二十四旅已留一部及县大队，在黑石镇、朝阳方向积极行动，吸引牵制敌人，该部行动不变动，亦可策应蒙江部队。

南满三十一日报：敌正转移主力扫荡清剿。我敌后部队，必须根据分局〔辽东分局〕指示，开展广泛游击战争。敌后活动注意事项如下：

- (1) 以相当兵力乘敌正面进攻或扫荡之际，迅速相机

拔除分散薄弱孤立之据点，坚决消灭敌地方团队与分散清剿之小部队，以打开局面。

(2)要根据自身周围情况，主动的打与走，声东击西，避强击虚，与敌主力换防，推磨战法。

(3)当敌主力合围时，我应查明情况与敌之战术特点，适时(过早尤其过迟都不利)主动跳出合击圈，而转移攻击方向(防敌诱伏部队)打击敌人或转入敌侧后活动。万一被敌合击，则应在数路之间，选择敌弱点，集中主力死打硬拼，打垮一路，乘机突围。

(4)受过锻炼的地方武装与武工队，应以一部主力为骨干，配合发展游击活动，主要采取灵活、奔袭、扰击、伏击、破路，避免打硬仗，并以作战次数多少为战绩。

(5)每个部队视敌情、任务、自己兵力大小，应有适当回旋地区，切不可对自己束缚于狭窄囚笼，尤其主力兵团，回旋地区要大，才有宽广战场。

(6)加强侦察警戒，熟悉周围地形，各兵团皆要有强的侦察部队，连应设侦察小组。

(7)冬季活动特别防止冻伤，应买乌拉鞋，解决棉手套、棉袜，加强冬季作战教育。

(8)加强群众工作，严格纪律，大家动手，到一地即进行宣传，坚定群众对我信心与表明我军与辽东人民共生死决心。

一月六日 于双城

南满：敌为对付我活动之四纵，已定暂缓攻临江等地。

二十二师六十六团于上月二十九日自梅河口车运，准备以两个营至抚顺，下车后向南满扫荡，经清河城直出碱场。一个营附炮四门，车运海城待命。其师部率两个团，正集结海龙、梅河待车运官原，准备以主力控制于官原、本溪，并以某团主力，即由官原桥头向东扫荡。九十一师已于二日开桓仁集结后，向赛马碱场地区扫荡。一九五师集结通化、头道崴子、二道江、白铁厂子，其一个团向四道江出犯，掩护九十一师西调。

一月七日 于双城

钟〔伟〕六日二十一时报：我们于八日进到新站、王家站之线，以便攻击靠山屯或支援主力作战。

万〔毅〕李^①六日二十二时半报：三师攻击部队已经进其塔木，继续在巷战中。

一纵七日四时报：昨晚三师对其塔木之攻击，仅占碉堡四座及一部分房屋，歼敌一个连，其余敌仍在顽抗中。因白天不能发展，决拟本晚再攻。据俘供，内驻敌一个加强营，每连轻机十二，六〇炮三，重机八、迫炮二，山炮二及一个战防排。

一月八日 于双城

一纵七日十二时报：三师对其塔木之敌攻击，上半夜发展甚好，歼灭敌人一个连，占碉堡四座，缴重机二、轻

① 即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李作鹏。

机四、六〇炮二、冲锋枪十余、步枪一批。因敌利用每一房屋及碉堡，下半夜无大进展。拂晓敌人集中火力兵力反击，将我打入之一个团全部驱出，我共伤亡四百余人，抵近射击之山炮，因大部人员伤亡，遗失一门。如情况无大变化，本晚再强攻。

九台来援之敌千余，刻已到张麻子沟，一师已全部出动，决心歼灭该敌。

一师十八时报：三十八师一一三团二、三两营，今十时到张麻子沟，十二时将其包围总攻，战三小时全歼。

一纵七日十八时电二师：一师已将敌消灭，望你们两部密切配合，歼灭由吉林来援之敌，根据一师运动战经验，越猛越好。

一纵八日八时报：三师昨晚继续对其塔木强攻，现又将南门到北门地区控制，占碉堡十余座。敌人死伤过半，但仍顽抗。我亦伤亡颇大，决心继续打下去。

六纵八日十时电十六师：对上河湾、焦家岭之敌，无论如何要将他包围起来，不可让敌切断我后方联络线。

六纵八日十二时报：敌八百正与十六师激战于焦家岭。十七、十八师注意德惠侦察警戒，准备迎击援兵。我北面侧翼暴露，德惠汽车直达岔路口，望松江部队南下至大房身以东地区，保我侧翼安全。

十六师八日十六时报：据守于焦家岭线敌，完全被我包围。敌反冲锋被打退，我们决心今晚歼灭该敌。

又报：敌占有利地形，我完全仰攻，经一天一夜猛攻，伤亡三百余，无大进展，单独解决该敌很困难。

炮兵八日一时报：我部本日全部赶到其塔木。因路过远，难于赶到□□，故先派三个野炮连，于本日四时轻装出发，速赶参战，其余部队随后赶上。派往六纵的四个连（山炮三、野炮一），于本日六时出发，赶到长太河。

一月九日 于双城

万〔毅〕李〔作鹏〕九日一时报：其塔木敌连日强攻、除死伤及少数就俘外，大部于本晚分散突围，现战斗结束。如石屯敌两个营不逃，拟以一、二师及曹〔里怀〕雷^①部队合力歼灭之。

曹〔里怀〕九日十时报：石屯敌于今日拂晓前向吉林逃走。

六纵杨刘^②九日十时报：因十六师平分兵力火器与分散逐次进攻，屡未奏效，至报时仍未歼敌。现十八师已参加作战，敌盘据焦家岭三个家屋顽抗。该敌系五十师一五〇团四个连、团部冲锋排及一个保安中队。

九日十三时又报：经激战后，已将焦家岭占领，歼敌一半，残敌压在山沟内及一小村庄中，正组织集歼。

李^③九日十八时报：由德惠东进之敌两个营到一个团，十六时进到石虎沟，与十七师对战中。松江及九旅部队，准备配合十七师消灭石虎沟之敌和打击可能从大房身东进之敌。

① 即吉北军分区副司令员雷震。

② 即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杨国夫，副政委刘其人。

③ 即松江军区司令员李天佑。

东满：七、八日攻克桦树林子，九日早克韩大坡，击退二十一师增援桦树林子之两个营。

一月十日 于双城

十八师九日二十三时报：焦家岭之敌黄昏后全部解决。敌四百余利用十八、十六师接合部突围，现各部正截击。午后德惠援敌约一个团抵五台，与十七师先头警戒部队接触，战一小时，黄昏向西窜去。

一月十一日 于双城

独立师十一日九时报：长春岭之敌，已于昨晨撤退，大房身之敌亦于昨日下午六时全部窜回德惠。九旅一个营已进占大房身。今后要调敌外出，估计要准备打一个团以上的兵力（一个团以下不敢外出）。我们积极出击佯攻敌之驻兵，而调动敌人，但在南满敌人未到前两三天以内〔敌〕不会出击。温^①师部向前推至大房身东南宋家屯、马家屯、高台子，以一个营附骑兵及侦察部队向德惠活动，破坏德惠及长春之铁路，九旅一个营进占大房身，向德惠以北达家沟积极侦察，破坏四马架之铁路，主力仍在现地集结。

一纵十一日十三时报：据捕敌谍报员称，木石河驻三十师八十九团约一千五百余，同保安队五百余。该团系十日由长春到九台，十日到木石河。城子街系该团之一个营。

① 即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属独立二师师长温玉成。

九十团一个营在长春，另两个营去向不明。如我围攻城子街，由九台、木石河来援之敌，可能有五个营左右，建议由六纵派出一个师攻城子街，我纵全部及曹〔里怀〕雷〔震〕部专门负责歼灭由木石河、九台来援之敌，这样可能打个好仗。

南满方面：九十一师〔敌〕北调增援。

一月十二日 于双城

拟打木石河〔位九台以东〕。

万〔毅〕、李〔作鹏〕十二日十七时报：城子街敌保安第九团约六百余，本午向九台逃窜，在四家子遭遇，一、二两师已将该敌全部解决。估计木石河敌约有一个团，九台可能是三十师之主力。为给三十师更大打击，以造成今后各个击破敌人之更有利条件，建议以六纵一个师及炮兵全部包围歼灭木石河之敌，六纵主力为统一预备队，我纵全部担任打九台来援之敌。同时，为使我军深入，无后顾之忧，独一、二师及五师担任由德惠及江岸敌五十师之箝制。曹〔里怀〕、雷〔震〕则全力破坏德惠、九台间之铁路，断敌交通。

南满方面报：三纵第一步除留一个团于金辉地区〔外〕，已集结打通化外围敌人。今日已将米家子（头道崴子东）敌人两个营围歼中，并以一部打援。如能将通化敌人歼灭一、二个团，则我们以后行动少受拘束，更有利于向金辉或辑安、通化行动。

四纵十二师已转入辽南，十一师已转入宽〔甸〕桓〔仁〕

地区，十师正向兴乐地区转进中，已令金辉部队积极行动。

一月十三日 于双城

十三日十三时二师报：木石河敌系保安第四十三团，已于十二时全部歼灭。

六师十二日报：为打击与肃清天岗、老爷岭以南长白地区之敌，开辟该地工作，并与常山屯地区连接一片，造成对老爷岭敌孤立，形成一个配合万纵吉林部队行动，请将蛟河警卫团为基础，由一旅再派有力的部队，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区队，配予适当的地方干部，深到天岗以南、旺超屯以东、蚂螺河口子以北地区活动，以机动灵活的战术，专打击长白区匪部，掩护开进工作，以准备春化后，能在两岸立脚，二旅在常山屯以东，部队注意相互连络、策应。

一月十五日 于双城

北满方面，一纵十五日二十三时报：九台敌千余，本晚进到靠山屯，估计该敌明可能向木石河继进，我决心集中二师、三师歼灭该敌。因一师东去未回，望令五师明日向八颗树、曹家屯前进，准备参加作战。

西满方面，四、六师开始行动。

六师十四日十四时报：伏龙泉之敌闻风而逃，大部向双城逃去，我们现在双城堡子及其附近。

四师十五日二十时报：师主力十四日晚进保康东南四十里胡家窝棚、八叠来仗一带。此地及以南地区土顽不少，

部队行动无法秘密，故意暴露企图，所以我们多采取夜间行动。十一团昨晚袭击茂林，无大结果。

东满方面，敌对我全线进攻小丰满、吉林等地情况，反映颇多，现正调整六十军及三十师之防务，加强守备，并准备积极作战中。一八二师五四四团十三日已开小丰满。

伍〔晋南〕十四日报：目前乌拉街〔位九站北面〕、吉林以东敌力薄弱，建议曹〔里怀〕、雷〔震〕率警一团及我保团骑兵团，攻夺尤家屯。

一月十六日 于双城

北满方面，敌报复出动，我军各部后撤，待机作战。

万〔毅〕、李〔作鹏〕十六日十四时报：（1）估计日内敌八十八师、九十一师、三十师、七十八师主力均可集结完毕，分路报复出击，驱逐我离开江南山地，恢复江防。

（2）进到靠山屯之敌约一个团，本日向北向东出动，但进展甚慢，稳打稳扎，且木石河与九台之间地区狭小，不利大兵团作战。

（3）为诱敌深入，尤其准备歼灭由吉林出动之敌，本晚我们部署调整如下：一师移其塔木以南之胡家屯、小号屯、周家屯、江石磊子一带；二师移大张庄子、蟒卡屯、哈什；三师移其塔木、陈家瓦房等以北；五师移八家子、吴家岗子、郑家屯、冯家屯一带；曹〔里怀〕雷〔震〕部继续进行破路任务，并查明情况；炮兵移其塔木以北之二、三

道沟；纵直移口家沟。各部均于十七日上午调整完毕，如何望即示。

南满方面，敌九十一师守桓仁部队（工兵团及五十一团）于十六日开始向营盘集结，遗防由敌五十二军接替，未交代前，暂留一个连守备。敌十四师一个团轮番扫荡李家堡子、大洼地区。敌二〇七师加强各据点守备兵力，抽出两个营扫荡沈阳附近、沈〔阳〕海〔城〕路以北地区。

一月十七日 于双城

北满方面，一、六纵集结其塔木、上河湾，诱敌深入。

独三师十六日十四时报：昨晚三团一部攻敌桥堡未下。城子街以西之兴明子、秀明窝棚，九台以北之朝阳厂，到敌八十八师二六二团。十二日由长春开九台火车一列，三个车皮。同日，由公主岭开长春一个团与开吉林一个团。十四日，北开列车两列：一列开布海以南，一列开九台。

西满方面，六师逼近华家桥。

六师十七日报：六师全力于今日以进逼长〔春〕农〔安〕线（北华家）为目标，求得诱敌出笼而歼灭之，并尽一切力量破路。

东满〔军区报〕，为配合长〔春〕〔以〕北作战，关于开辟松花江两岸的工作部署：

（一）以三团二营、吉蛟游击队、蛟〔警〕戒团两个连，组成松花江支队，从十七日开始出动，深入蛟河以南吉林、蛟河、常山屯地区活动，打击长白山匪部，开辟工作，造

成老爷岭孤立形势。

(二)以双阳、伊通县委和县政府及地方武装，加派七团第一连，组成挺进支队，于最近深入吉〔林〕海〔龙〕线双阳、伊通地区活动。

(三)拟于最近以三个团兵力，攻击常山屯敌人据点，重点放在打援，正在侦察布置中。

一月十八日 于双城

北满方面，二师报：木石河附近地形：该敌在街上村边沿及西岭山，刚修了二十来座碉堡，地堡三、六尺高的均被我拆毁。在西岭上及村东、村西北和腊腰子西北，均摆了些树枝。木石河村中的烧锅搁边，还有小炮楼未拆。村处地形较低，与腊腰子实隔一条河，公路相连，而腊腰子高于木石河。敌原来之防守设施，以腊腰子为一支撑点，有八十户人家，东西南北似长形。通九台公路横贯其中。另一支撑点为木石河西岭，其余为木石河本村的碉堡。敌在围墙大院，均设有机枪掩体。

如攻击时，由西南及正西较易接近，并先夺取腊腰子及木石河西岭为有利。

李天佑十八日十九时半报：根据近日情况变化，敌将以八十八师为核心，占领大房身后，一种可能〔向〕豹虎山、安山堡前进，掩护德惠之敌，沿山边向北推进。另一种可能占领大房身后暂时不进。

松江部队占领豹虎山后，大房身附近靠有利地形，压制敌人向北推进，迫使敌过早展开，必要时放弃大房身，

扩大暴露翼侧〔便〕我军歼灭。在达家沟之我九旅部队，一部控制其正面，主力集结十二马架及其以南地区。

西满方面，四师歼敌一个连，六师破路未成。

南满方面，敌为解除我对通化之威胁，敌二师的四、五个营及通化敌主力，今日正向头道崴子进攻。我们正调四纵主力配合三纵，准备消灭此股敌人，如便利作战，则三纵主力向金辉、柳（河）梅（河口）转移，展开攻势。

一月十九日 于双城

北满方面，梁、梁、江^①十九日八时报：师主力七时移替僧屯、范家姆子、大芦葫头、谭家岗子集结。三团留其塔木西之八家子带，节节抗敌。

西满方面，确息敌八十七师二六〇团一个连于大杨屯被歼，该团主力似相机向茂林推进。

南满方面，后总十九日确息：（1）敌新二十二师（师长李涛）之六十四团十八日在平顶山，二营在拦道河子，三营在二道河子，另一个团似在桓仁西南二十里之老漫子一带。（2）敌即刻又布置在沙尖子与铁岭东南鸡寇山一带以及兴乐、桓仁间等地区之新扫荡。

① 即东北民主联军一纵第一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副师长江拥挥。

一月二十日 于双城

北满方面，王陈黄^①十九日十五时报：下午三点多在芦家屯〔敌〕与我警戒连接触，战一时。大部分敌人已进至安家沟。敌仍在继续北犯。我阵亡连长一名。

西满方面，吴冯席^②十九日十九时报：昨晚在农安南十里之六间房破路二里，毁铁轨四十根。由农安南开火车一列全部翻车。

南满方面，肖陈肖^③十九日十四时报：自击退头道崴子后，敌为解除我对通化之威胁，十四日敌二师五个营由辑安北上，于十六日进至横路及头道崴子。同日，敌一九五师两个团亦南下占头道崴子及哈塘沟，企图沟通通辑公路。敌估计我将攻辑安。敌二师于十八日南下，于十时在蛟子沟附近被我四纵十一师侧击，三纵两个团之尾击，该敌当夜全部向辑安逃去，我稍有俘获。

东满方面，小丰满通奉天〔即沈阳〕之高压电线之铁架为我吉蛟大队于十六日夜三时炸毁一座，高压线已断，现正准备继续破坏中。

一月二十一日 于双城

梁〔兴初〕江〔拥挥〕二十日十九时报：我师一个团十九日留八家子〔其塔木以西〕，节节抗敌。今日敌分三路

① 即东北民主联军第十八师师长王兆相政委陈德副师长黄荣海。

② 即东北民主联军第六师政委吴信泉、副师长冯志湘、参谋长席庶民。

③ 即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劲光，政委陈云，副司令员兼副政委肖华。

向东。各路均在十一时出发，下午五时到达八家子、大平沟。敌各路相距五里，分头并进。兵力均在一千余，今午已占其塔木。长春派出大批特务，出动轻装，进行严密搜索，遇我抵抗即展开战斗队形，用炮火向我轰击。

确息：韩增栋^①所部八十八师进占上中下台子、崔家沟、宋家沟；二十六师进占石虎沟，分头向五台前进，军部进抵蒋家店。

一月二十二日 于双城

北线：

白旗屯敌增其塔木，大房身增敌一个团。

王〔兆相〕陈〔德〕报：二十日敌分三路占五台，约一个团兵力迂回至沙石岭，南路敌进至双顶子，向上河湾前进。

刘晏^②报：部队二十一日十六时先后到达三岔河宿营。

曹〔里怀〕雷〔震〕报：（一）乌拉街进犯白旗屯约一个团以上兵力，现在修白乌公路。溪浪河赶修工事。（二）、我已派一部兵力插到溪浪河至乌拉街间，主力仍在沈家屯与库沟及以东阻敌东进。又电：溪浪河有敌一个营及保安队四千余人。

西线：

哈拉海敌弃点东窜。

确息，敌十九军确已由营盘转沿中长路北上，二十二

① 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八十八师师长。

② 即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属独立一师师长刘转连、政委晏福生。

日该军部及十七师驻公主岭〔现称怀德〕，敌九十一师已抵长春，敌二十七师位四平，十七师之五十一团约达沈阳。

吴〔信泉〕冯〔志湘〕席〔庶民〕报：哈拉海为敌嫩江支队四百余人驻守，今九时我以一部前往进击。该敌闻风逃向东南，我正平毁工事，建议在哈拉海附近休整几日。

白城子高〔鹏〕蔡^①报：各部位置：保一旅（二团在瞻榆整编中）及一分区十三团、十四团在舍伯图附近；保二旅旅直于平安镇，四团在乾安附近，六团在洮南；二分区直在道字井（开通东），五团在太平山（道字井东南约九十里），六团在老铁沟一带；四分区直在洮南，二十五团由突泉来洮南途中，二十四团在瓦房，骑兵团现于达拉山昭（洮南西北十里）；军区骑兵支队于八仙洞配合一分区骑兵团及蒙骑十五团活动。

一月二十三日 于双城

北线：

敌决向秀水、卡路河一带搜剿。

杨〔国夫〕刘〔其人〕报：（一）靠山屯编匪三百余，其西二道沟、三盛永张青山骑兵三百余。（二）十六日夜，德惠顽敌一个连增靠山。

确息，敌为肃清松花江右岸我军，骑二师以朝阳为基

① 即辽吉军区副政委蔡斯烈。

地，向秀水至卡路河方搜索，三十师一个团之主力于其塔木及四台附近，持有主力部队巩固松花江岸，肃清岔路口（含）以西至其塔木地区。

万〔毅〕李〔作鹏〕报：（一）二十一日上河湾到敌，下午一部进到大干沟子与我侦察部队接触。（二）二十日由溪浪河北犯敌千余，走至乌金屯后未动。（三）其塔木及其周围之成家瓦房、双庙子、发家林子一带共有敌二千余，不时以小股渡河游击活动。（四）敌在石屯、溪浪河、八家子（其塔木东北谭家岗子以东）沿江修据点，并修乌拉街至白旗屯公路。

松江李〔天佑〕报：派去敌后活动之七团一个营今夜可派出。

李熊^①报：松花江站今日到敌六百余，五棵树、罗圈坨子也到敌数百，系由大房身来的。

东满：

东参^②报：此次吉南收复肇东自横道河子以东、半拉窝棚以西、二十家子以南、金沙以北纵横约百里，共六七个部落，人口三万左右（桦甸收复还不在于内）。此次遭我攻击之吉南敌军死守之决心下降，攻击锐气更落。

一月二十四日 于双城

北线：

松花江站增敌三个连，今日敌老少沟一个营、四家子

① 即松江军区副司令员李寿轩，参谋长熊伯涛。

② 指吉林军区司令部参谋处。

二个营、松花江桥一个营向我进攻。

万〔毅〕李〔作鹏〕报：侦悉，进至其塔木周围敌为新三十师八十九团、九十团及八十八团一部，共三千余人，木石河为该师一个团，上河湾五十师一四八团两个营及保安队一部。

密息，三十师直二十二日至九台，八十八团至堡子午，八十九团抵上河湾某家厂，九十团调长春，其所指挥之八十四团同日到二道沟。

温〔玉成〕张^①报：老少沟到敌百余并汽车二辆至桥头堡。我三团一个营昨晚再过江击退松花江站之敌，毙伤敌二十余，我伤八亡一，部队于今日十三时返回。罗圈坨子今日十二时到敌正规军一个营另匪团三百余人，炮击我乌金屯阵地。

万〔毅〕李〔作鹏〕报：若敌无大动作，我纵拟移下列位置：纵直炮手屯，一师秀水以东，二师黑林子，三师新立，炮兵兴隆店。

确息，敌一四一军×师（团）拟去吉林另有任务，一四一师（团）仍在其塔木，另一个师（团）拟从朝阳向秀水、岔路河方向搜索。吉北发现第十军番号〔此番号在敌正规军序列里没有，是东北地方匪特武装自称的番号，当时此种情况很多〕，该军二十三日拟进至上下龙王庙之线，尔后分头向五棵树、陶赖昭前进。

曹〔里怀〕雷〔震〕报：溪浪河敌昨日由五家子向石

① 即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属独二师政委张池明。

屯方向走去。白旗屯、溪浪河现无敌。

一月二十五日 于双城

熊〔伯涛〕报：松花江站敌自晨进行一小时的轻重机枪射击，继以重火器向我轰击，掩护其一个营向我江桥一个排之小堡进攻，战至下午四时，该小堡被敌攻占焚毁，夜以一个连据守，其余进至桥头据点。我三团当即出击，已于五时将该堡夺回，并追过江去，查江南四家子到敌一部。

钟〔伟〕王〔凤吾〕王〔良太〕报：（一）敌一个营附骑一个连，今日由罗圈坨子西南之上童王庙进到董家坨子，一部渡江，被我警戒部队击溃退原地，毙伤人马各七。俘人枪各三十一。

一月二十六日 于双城

梁〔兴初〕梁〔必业〕江〔拥挥〕报：据我在二道沟便衣亲见，昨日十三时其塔木敌约二个营一千余人，附山炮三门、汽车三辆、马百余匹，经二道沟北开，其一个营向大干沟方向开去，另四百余人进至侯家岗、吴家油房一带，一部到小河里。其塔木敌除北开外，主力已向成家瓦房及八家子撤去，其塔木仅少数敌。

杨〔国夫〕刘〔其人〕报：敌三十师八十九团一营一连，附重机枪三挺及小电台，二十二日到鲁边口子（四台东）。岔路口有敌步骑三百余。二十四日晨一部进至张家屯，十二时三百余到小岗，黄昏退向岔路口。又电：大房身驻

敌一四九团一个营，一部伸花家窝棚。

肖〔劲光〕陈〔云〕肖〔华〕报：敌九十一师于二十五日自公主岭、长春向辽源前进，敌三十师九十团、八十八团已车运长春，敌三十八师一一四团在其塔木附近。

万〔毅〕李〔作鹏〕报：（一）二十四日经二道沟至孙家油房、侯家岗敌四百余（骑兵一部），今日骑兵一百余，于大河里与我接触，当即窜回原地。（二）二十五日十时其塔木至大荒地敌骑兵一个团，十五时经大干沟抵半拉山子敌七百余，骑兵一部。

熊〔伯涛〕报：七团昨日十八时出发，今早二时到朝家屯（岔路口东北），岔路口有匪三百余，内骑兵九十余。花家窝棚一带据报已无敌。

杨〔国夫〕刘〔其人〕报：驻上河湾敌八十九团二十二日西移大房身，接防据称由九台开来。八十九团二十五日以骑兵一百余进至朝阳屯、朱家船口。二十五日由德惠进岔路口敌七百余，内骑兵一百余，称七十一军八十八师。同日由德惠开岔路口汽车四辆，内装美兵四人，当晚返。岔路口西之花家窝棚驻敌五百余，内骑兵一百余，该敌系大房身派出。贾家窝棚，于家窝棚，罗圈坨子均驻敌。二十一日上午敌由东南正南正西数路六千七百余人集大房身。城子街之敌估计移大房身。江南小部侦察难以活动，即组织一坚强营掌握情况，打击敌人少数部队。

钟〔伟〕王〔凤吾〕王〔良太〕报：六师移王家站东榆树沟，我师最好集中靠拢。

一月二十七日 于双城

熊〔伯涛〕报：(一) 松花江站及达家沟驻一四九团全部，七家子驻二个连，靠山驻匪二百余。(二) 据传，大房身驻八十八师，姚家岗、罗圈坨子、王家坨子、莲花泡一带均驻八十八师部队。

钟〔伟〕王〔凤吾〕电：昨日由龙王庙铁大桥出动匪四五百约一个营占领地形（到罗圈坨子），企图构筑据点。岔路口无敌。

梁〔兴初〕梁〔必业〕江〔拥挥〕报：(一) 二十四日午，其塔木北来敌三十师八十八团二个营千余人，山炮三门，骑兵五百余，当日进到张家岗。牛圈窝棚骑兵进到朝阳屯。(二) 二十五日，上河湾敌一千余，山炮二门、迫炮四门，经大干沟、半拉山北到朱家船口六百余人，一股五百进到朝阳屯。(三) 现三十师八十九团二营三营驻上河湾，一营驻大干沟，该敌正在上河湾、高丽房修碉堡。(四) 其塔木驻三十师九十团两个营，正修碉堡，一个营驻木石河。

一月二十八日 于双城

北线：

原驻大林子〔扶余东〕之匪被我骑兵团击退。

王〔凤吾〕王〔良太〕报：我师二十八日移三岔河北二十五号、坝墙子、姚家沟地区。

后情报：五十师一五〇团驻德惠，一四七团主力在小八家子、老少沟，一部在松花江屯及江北桥头阵地，一四

八团驻农安。

杨〔国夫〕刘〔其人〕报：（一）上河湾、长亭河、朝阳屯一线敌兵力一个团，其一个营在长亭河，以少数骑兵活动于朝阳屯至双城子一线。（二）岔路口现无敌，东西花家窝棚有敌七百，汽车四辆，城子街现驻敌保安队三十人，石虎沟、五六台均无敌。

西线：

白城子〔辽吉军区〕报：（一）通辽、开鲁一带由七十一师五十九团（降队）担任守备，师长彭锷（原八十七师副师长）下辖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个团。师部及二十七团驻通辽，二十五团驻钱家店，二十六团驻敖保营子。（二）通辽东北三十里之立德堂驻八十七师二六一团一个营及保安队一百人。（三）原驻大林之（降队）四团，十七日被我蒙骑兵团击退，俘副团长以下二十人。十九日，敌二十余人带枪马向我投诚，现通辽外围降队已开始瓦解。（四）热辽边区独立支队包善一^①部骑兵三路，经我打击后窜逃。长岭、保康情况无变化。

东线：

东满参〔谋处〕报：（一）我江西部队原拟围攻常山屯，以配合吉长路以北动作，敌于十八日后增援小丰满二千余人，常山屯之地形亦对攻击不利，改于二十四日围攻吕大房子（即金沙河子），打桦甸来援之敌。五四四团一个连于当日夜十二时来援，二十五日被我七十一团及四团将

^① 当时为国民党军东北保安骑兵第四支队司令官。

该敌全歼，我仅伤亡六人。我六团二营一个连昨日向常山屯东之太平庄偷袭，敌窜逃。

南线：

敌似重新布置对通化江北地区扫荡。

辽东情^①报：郑洞国令二师接通化至头道崴子防务。一九五师一部二十七日向通化北大小荒沟扫荡，该师主力在通化以北地区集结，准备新的进攻。九十一师在公主岭、四平集结，归长春指挥所郑洞国指挥。赵公武二十五日去沈，即转通化布置新的作战。

一月三十日 于双城

刘〔震〕吴〔法宪〕报：我部队集结位置：五师位于榆树沟及其东北白麦厂六大户一带，六师位于集厂子以北通顺街前后万宝山附近地区，纵直位于集厂子。

李〔寿轩〕熊〔伯涛〕报：松花江站到敌十五辆卡车，估计一个营。

一月三十一日 于双城

确息：敌七十一军八十八师拟即经农安西向扫荡优龙泉、三盛玉地区至长岭即行归建。

二月一日 于双城

^① 即辽东军区情报处。

确息，敌为防我再度进攻其塔木、乌拉街，调三十八师之一一四团主力移驻石屯、打渔楼，其塔木仅留一个连，全团移驻焦家岭与曾团（三十八师八十九团）切取联络，向半拉子江东搜剿。

肖〔劲光〕陈〔云〕肖〔华〕报：敌七十一军驻四平，八十七师及二六一团驻辽源，二五九团驻大林、通辽，二六〇团驻卧虎屯（其二营驻茂林、保康，三营新集厂、长岭），九十一师以一个团驻公主岭，其余于四平整训，八十八师归还七十一军指挥。

二月二日 于双城

敌九十一师二个加强营扫荡开原、长岭以东地区。

确息，赵公武称，通化桓仁辑安地区我方集结兵力，转二十五师、一九五师为优，为确保该区及减除今后接收困难，计划正请求将九十一师转开于该方。据此情况，估计二十五师、一九五师似已布置于通化地区，赵公武司令部已移通化。

八十八师一日车运八面城。

二月三日 于双城

温〔玉成〕张〔池明〕报：敌八十八师二六四团原驻上下龙王庙及其以南地区，团部驻大房身，已于昨下午开达家沟，向太平庄方向开去。上下龙王庙敌筑有坚固工事，已派侦察部队拆毁并至大房身一带活动。松花江站一线仍为五十师一四九团。

炮司刘^①报：我们明日自腑店移榆树弓棚子间之呱房身，炮司住新发屯。

肖〔劲光〕陈〔云〕肖〔华〕报：三十一日罗又伦^②称，本部第二十六师直属队驻永陵，一一二旅主力驻五风楼，唐团驻火石咀子，一二四旅主力驻永陵，两个团在红庙子。

二月四日 于双城

温〔玉成〕张〔池明〕报：侦悉，松花江站敌正规军已于一日晚十一时许乘火车向德惠开去，该地仅有匪团张孟两大队，四马架、大房身均为正规军。据张大队士兵称，三日后有正规军来接防。另德惠之敌现正征集大车，靠山屯要一百二十辆，企图不明。

二月五日 于双城

后总^③报：第三绥靖区赵公武于通化设立指挥所，现通化周围集有二师、一九五师、新二十二师等部队，搜集通化、辑安、临江方向之情况，拟最近对该地进行扫荡。

二月六日 于双城

温〔玉成〕张〔池明〕报：据俘供，松花江系一四九团，老少沟、松花江站驻该团第一营。五十师师部在德

① 即我炮兵司令部副政委刘登瀛。

② 国民党军第二〇七师师长。

③ 后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总部。

惠。

确息，敌第五师向通化以北大龙费以东地区进击。一九五师集结兵力向通化进攻。第二军（真番号不明）五日到达湾口沟，六日再次向小城子、钓鱼台我军攻击。

二月八日 于双城

后总报：敌似调新三十八师一个团接替老爷岭、江密峰、九台等地防务，加强小丰满外围防御，以防我第三次冬季攻势。

后情报：敌九十一师七日仍控制四平、公主岭地区，以便策应四、五绥靖区。孙立人^①拟调长春，决暂缓执行。其二七二团似仍在长春地区。保安十一团一个营六日接碱厂第六师（似即保三总队陈天喜部）防务，该师仍在碱厂担任增援与堵截任务，暂缓他调。二十五师一部五日占领太平哨。六十军一个加强团五日可抵柳河。二〇七师一部决全力扫荡钓鱼台地区。

中情部^②电：东北蒋军上月之分布情形为：（一）新一军新三十八师一个团（附保七团）驻永吉，一个团驻九台，一个团驻农安。（二）新六军一个师驻蒙江、临江、通化〔地区〕，一个师分驻抚顺至大连间。（三）七十一军在辽北。（四）五十二军一个团驻安东（改为二师），一个师在抚顺，二十五师被歼后其番号仍保留，现拨一个保安团补充，在安东整训。（五）六十军军部驻磐石。一八二师师部驻口

^① 国民党东北第四绥靖区司令、新一军军长。

^② 即中央军委情报部

前车站，其五五四团一营驻小丰满，二营从小丰满到桦甸，三营驻口前，五五八团任磐石到梅河口沿线守备，五五六驻桦甸。暂二十一师驻凤凰城到磐石间。据息小丰满到桦甸三百里只一个营守备，每据点相距五十余里，每据点驻一班或一排人，若被攻则抽兵增援，若攻小丰满，敌至多只能集中一个团死守，但欲攻占则不易，可攻占小丰满松花江东面之高地，炮击小丰满电厂及镇压小岛上之强固工事。

二月九日 于双城

南满五日于通化北消灭一九五师大部，毙伤敌五八四团团团长以下百余，俘五八五团团团长以下千余人。

后情报：敌九十一师部署：六十师（即原第一旅）欠一二三旅（团）七日由抚顺车运苍石后，主力复进至清原，九日主力附山炮二门由清原向大小东河尖山子扫荡，尔后向旺清进击，其三团（营）主力附迫炮两门由苍石经大庙子四沟向桥头腰堡扫荡，尔后向新宾进剿。另俞团（营）附山炮两门九日晚东进至英额门，十日晨向南山城子扫荡，其一二三旅驻苍石亦有行动。

中情部电：潘朔端^①部一八四师副师长杨朝伦拖走之部队投降蒋军后，即开入新一军防地，为新三十师缴械。六十军仍想要回原部，杜聿明未准后曾泽生^②又要求与杨

① 潘朔端原为国民党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师长，一九四六年五月率部在海城起义。

② 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

一谈，亦未准，现该部已调沈阳，名义是独立师，由某特务任师长，杨任副职，团长亦降为副团长，另提拔一些叛军官编入该部。六十军现被监视，每次作战以该军一个团或一个营夹在新一军、新六军中使用。此次杨朝伦回去后，该军许多人更认识到中央军不相信杂〔牌军〕，并说既投中共就不要再回来。但有人说以后不要再投八路军。

肖〔劲光〕肖〔华〕报：高丽城子敌经我一天激战，于昨日向干沟方向突围，经我进击，将其大部消灭，除一九五师师长陈林达等千余向通化败退外，据初步战果，毙伤五八四团团团长以下百余，俘敌五八五团团团长以下五百余，缴野炮三门、山炮两门、汽车九辆、弹药车百余辆。此刻我八、九两师各一部正追击中。

肖〔劲光〕肖〔华〕报：甲、一九五师残部溃窜通化，二〇七师一个团昨已进抵三源浦，柳河敌出动一部到四五道沟，第二师本日可能到通化城。依据目前情况，一九五师溃窜后，第二次向临江进攻计划遭受打击，敌现有兵力无力进攻，可能暂取守势，巩固通化，待重新增兵后即进行进攻。乙、为扩张战果，打开局面，以准备今后作战之有力条件，已决定三纵七师九师继续乘机消灭三源浦之敌（一个团），全部控制通化柳河间地区，协同地方恢复通化西北地区，待这一着得手后，第二步以主力转向通化东南作战，以三纵一个师接替鸭周四道江正面防务，集四纵十师十一师主力及三十六团夺取辑安，望彭韩^①部加紧侦察工作，准备攻城器材与进行攻坚教育。丙、敌向通化增兵，估计九十

^① 即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政委彭嘉庆、副司令员韩先楚。

一师团我北满集结兵力，返回南满可能性要小，最大可能将进攻辽南之二十二师一部或全部调集通化，十四师主力可能来援，因此辽南对新六军之调动要特别注意，并随时准备让敌区主力调动后乘机恢复地区工作。

二月十日 于双城

南满地区：消灭二〇七师第三团，九十一师正面增援中，

二月十一日 于双城

松江独立师报：德惠驻五十师师直及一五〇团团部及一四九团二个营，并有工兵团一部，另近有光林调来新编骑兵三师一部约一千人；达家沟为一四九团二营部及二个连，并有降队百余，有调回德惠说，该营一个连驻桥头堡；松花江站驻翁大队二个中队；七家子驻匪一个队约百余；大房身驻匪刘大队五百余，另由德惠来援兵百余。潘玉昆二日曾到四马架车站，企图修桥，但苦无材料。

六纵报：上河湾无敌，城子街新一军一个团，正备鹿柴筑工事，烧锅屯、五六台有骑三百任外围警戒。

二月十二日 于双城

五师报：七日保匪骑兵特务排长等称，靠山屯无敌正规军，仅通辽保安队三十余人，匪陈团四百人（步兵），张团三百余（骑兵）驻大孤山附近及三盛玉、青山口、红石磊等地。陈团近有补充新一军讯。

一师报：据捕获配属第三十师八十九团之骑二师十人称，八十九团二月四日由上河湾开城子街及其以西村庄，至今未动，八十八团一月二十三日由上河湾开张家湾，一月三十一日乘车东开，现大房身以东城子街东北无敌正规部队，仅有三、五十不等之土匪骑兵活动。骑二师师长乌封东，驻怀德共五个连，每连六十人。

二纵报：三盛玉有大排^①二百余，白天到街上活动，伏龙泉东二道沟有降队二百余，白天到街上活动，夜回农安。农安、怀德有一八四师二个营，又说是新六军新二十二师二个团共千余人。

二月十三日 于双城

东满独立师配合作战部署：

东满〔军区〕报：接十一日电后，当即令独立师配合行动，现第一步拟以四团由横道河子西进至双河镇东，破坏该段桥梁、隧道。在四团出动后，以七十一团破击团林子至靠山屯之铁路，另以独立师二个团包围靠山屯，打援，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以达到四团突然破击之目的。

二月十四日 于双城

东满〔军区〕报：吉南七十一团向吉〔林〕海〔龙〕路挺进，盘石游击队十三日十三时出动，明日可到蛤蚂沟，预计十六日开始破路。独立师炸药到后经过敌区一两天行程，十九日开始破击。

^① 即地主武装。

〔总部给东满军区电〕：已令邓〔华〕部六团抽派兵力与吉蛟大队合组挺进队，积极向旺起屯、小丰满方向袭扰，并破坏高压线。

二月十六日 于双城

赖^①唐〔天际〕十五日十三时报：七十一团路东挺进队归吉南分区张政委^②率领，十八日破击朝阳至盘石铁道。盘石以北之破击正侯炸药赶到，在十九日晚至二十日晚可完成任务。

邓华十五日报：我当尽一切努力配合主力作战，并尽力取得一定战果。因我保二旅刚组成，由于准备工作的关系，明日才能开始行动，由乾安至舍伯图须一周行程，故我的动作要二十五日左右才能开始。

二月十八日 于双城

北满情况(据二纵十八日二十四时报)：根据报告，达家沟增敌近千，松江站、大房身各到敌两个营。在此情况下，我们建议独二师不打大房身，集中全力打达家沟。独二师抽一个团协助独一师攻达家沟，该师主力则协同五、六师打援，对大房身、松江站之敌暂不打。

南满地区：敌开始三次进攻临江。

一九五师驻通化城防及以东以北地区。

二师除五团主力守辑安外，师率四、六两团于通化集

① 即吉林军区副司令员赖传珠。

② 即张百春。

结后，十四日进到通化以北之干沟子、马鹿沟地区，策应九十一师行动。

二十五师除七十五团主力进至太平哨一带，其余仍驻安东、凤城铁路及安凤公路沿线及以南守备。

二十二师直及六十六团守桓仁，二营于二道岭子，六十四团分驻桓仁东北霸王桥、飘光江口、拐磨子等地。

十四师四十团主力配合二十二师，一部近日向桓仁南沙尖子地区扫荡，并暂归李涛指挥，四十一团向桓仁前进，有接二十二师防息。该团一部配合二十五师一部，正扫荡太平哨、沙尖子地区。

九十一师主力八日到达梅河口，十五日占三源浦，其派往清〔原〕抚〔顺〕线以北鸡冠山地区扫荡之。二七二团已归建，现正向大荒沟东进中。

六十军二十一师二团十四日进到梅河以南地区，配合九十一师行动，该师主力仍分驻海梅金^①等地。

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及六十六团一个营，十四师两个团，一八四师仍分布于辽南，近来防务无大变动。开原、东丰、西丰、各驻青二师一个团，驻开原二〇七师主力仍在抚〔顺〕梅〔河口〕段及其两侧。岫岩、草河口敌由新九师守备，赛马、草河口敌，公路沿线由新十一支队守备，碱场为保六师。

南满十八日十时半报：

敌对临江第三次进攻已开始，九十一师主力昨已进驻闹枝子沟，二七三团主力进到大北家，一个营进到五、六

^① 即辽宁的海龙、梅河口、金川。

道沟，今日向东西高丽子老岭进攻，第二师主力昨进到大坝道河子、马塘沟，今日向果枣沟进攻，二十一师一个营进到驮胜岭，另两个营到小通沟，企图南犯孤山子，已被我包围。二十二师主力由桓仁东进，第一步到通化南之大小苇沙河、蛟子河线。

我们以八及十师在四道江至大荒沟线进行防御，争取于五日内敌不能占八道江。三纵在金川以南地区；进攻敌之侧翼作战。

二月十九日 于双城

北满情况：

六纵十九日十时报：我纵二十日十四时开动，二十一日拂晓前进至上河湾（十八师）、二泉眼（十七师）、恒兴顺（十六师）、拉拉屯（纵直）。二十二日继续前进，十六师当日到达城子街以西之前后二泉眼，十七师十四时到达前后秀水沟，十八师十四时到达铍子炉、孙家甸一带，纵直在二道沟。

刘〔震〕吴〔法宪〕十九日十七时报：独二师的位置仍照林〔彪〕刘^①十八日二十四时电令执行，以一个团切断大房身敌之退路，并监视佯攻，主力协同独一师攻击达家沟。攻击达家沟时，以刘〔转连〕晏〔福生〕统一指挥，其他不变。

二月二十日 于双城

敌情（据林〔彪〕刘〔亚楼〕十九日九时电）：农安、德惠、

① 即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

松江共有五十师(二)团加(一)营,而一四八团在农安,故德惠、达家沟、大房身、松江站一带亦有敌(一)团及(一营),因此松江站、大房身决不会每处各二营,增援部队亦决不会超过一个团。

决心:围歼城子街之敌,并打九台、德惠之增援。

布置:(综合林[彪]刘[亚楼]十九日、二十日两天电令)

六纵二十日进至江北岸适当地点宿营,不要过江,以免暴露目标。

二纵、独一师、独二师于二十二日到达歼敌位置,以便与城子街战斗同时配合,德惠以南二十三日以后开始破桥,对大房身之敌务必切断其退路,以便在德惠以外尽量消灭更多敌人。

一纵为避免暴露,本日只应进至松花江东岸宿营,二十一日晚再进至城子街东南三十里以外地区,对大房身、达家沟之敌二十二日十二时以前完成包围,黄昏开始攻击。

六纵二十日十五时报:预定各师二十日进至江北岸隐蔽,二十一日晚进至上河湾,二十二日十二时左右开始包围城子街。

二月二十一日

林[彪]刘[亚楼]二十一日九时电:

1、敌已知我大部队进驻其塔木,则城子街之敌有逃跑可能。

2、二师不惜疲劳，立即轻装出发，务须于本夜到达城子街西南之五房沟、西长春岭堵击敌人。

3、十六师立即轻装出发进至后秀水沟、南泉子、双阳堡，必须本夜到达。

4、其他各师行动照原定计划大体不变，请各队首长酌于修改。

林〔彪〕刘〔亚楼〕二十日九时三十分电：十六师、六纵如果到城子街西之前后双泉眼一带太远，则可派一个先头团今日赶到前双泉眼，其他明天跟上。

二月二十二日

林〔彪〕刘〔亚楼〕二十二日十时电一纵：着二师一个团进到孙家店、瓦房沟一带，向敌侦察警卫顽强抗击。

林〔彪〕刘〔亚楼〕二十二日十五时电一纵：二师任务打援变为直接攻击城子街之敌，即开始猛攻。

林〔彪〕刘〔亚楼〕二十二日十七时电二纵：即由现地移瓦房店东二尖咀子（大房身西南十五里）堵截敌人。

林〔彪〕刘〔亚楼〕二十二日十六时电六纵：估计本晚敌必突围，你们速猛攻。

林〔彪〕刘〔亚楼〕二十二日二十三时电六纵：十六师主要任务堵击径前尖厂、同姓沟、瓦房沟突围之敌。

林〔彪〕刘〔亚楼〕二十二日二十三时电六纵：十七师应以一个团左右兵力到孙家店、同姓沟堵截敌人。

林〔彪〕刘〔亚楼〕二十二日四时电独三师：木石河有敌一个营，你们向木石河前进，切断其退路，包围该敌。如

单独则歼灭之，否则围困之。

林〔彪〕刘〔亚楼〕二十二日十三时电独一师、独二师：
今日下午或黄昏总攻大房身及德惠。

二月二十三日

敌情：城子街敌八十九团已被我歼灭。

决心：逼近德惠、九台了解情况后再行攻击之。

布置：二十三日二十二时林〔彪〕刘〔亚楼〕电一、二、六纵及各师、独立一、二、三师：

1、城子街之敌本日黄昏前已全部解决。

2、为阻击向九台、德惠增援之敌，一纵派出一个师进到九台以西通长春道上之三家子、后河阳堡一带，须于明日九时前到达。

3、独一师应明天八时以前到达德惠以南之拉拉屯、尚家店一带阻击敌人（长春北援之敌）。

4、明日各部（其余）上午注意搜索溃兵，准备明午后十六时移动。

〔林刘〕二十三日二十二时三十分电一纵：九台以西之师明日必须以二个团逼近九台，查明最近两天以来敌情变化。

〔林刘〕二十四日一时四十分电炮纵：你们进到九台外待命。

二月二十四日

敌情：敌七十一军八十八师自八面城增援已到长春。

决心：城子街〔敌〕被歼后，我仍似围歼德惠、农安之敌，并先歼九台未归之敌。

布置：

〔总部〕二十四日二时电一纵：向靠山屯、偏脸城增援之敌，下午或夜间或明晨可能退回九台。

一师接电后应即出发，以不怕扑空、疲劳和受敌夹击的精神，迅速、坚决插入九台以北之头道咀子、双桥子一带或更西南地点，务须切断由九台出援之敌归路，望即令先头团轻装出发，主力跟上。

三师接电后立即出发，插到靠山屯、火石岭子以南，坚决切敌归路。

二师立即出发，开到偏脸城以西之泡子沿堵击敌人。

只要你们二处切断敌人退路，其余我八个师皆能赶上应战。

又二十四日十三时电：相机歼敌并破坏饮马河铁桥，并吸引敌人，准备打向德惠增援敌人。

行动：

一纵二十四日二十三时电〔一、二、三师〕：为机动歼敌便于执行破路破桥及西去打向德惠援敌，变更部署如下：

一师移双桥子、头道咀子、二道咀子、梨树园子。

二师过饮马河到先后三家子、朝阳川、张家油房。

三师进到现一师位置之张家大院。

一师报：敌八十八团于本月二十二日十一时，由长春乘三个列车出发，晚二十四时到九台后随即开拉拉屯泡（九台北十二里）。现八十八团之三营驻拉拉屯泡，一、二

营驻拉拉屯泡以东。据系供三十师师部亦在九台。

二纵报：纵率五、六两师及独一、独二师等，转到德惠以南地区准备作战。

（六纵解决城子街战斗后今天休整中）

独一师二十四日十九日报：拉拉屯、尚家店一带阵地，经两小时战斗后被我占领，铁桥已破坏，布海敌六百余人已包围。

独三师二十四日二十二日报：今黄昏前，我以一营兵力攻占土门岭山洞。

二月二十五日

敌情：敌八十八师两个团已到哈拉哈，九台敌昨二十四时已撤长春。

决心：我军拟歼灭该敌。

布置：〔总部〕二十五日十五时电：

四师立即出发，切断哈拉哈之敌归路，于本日进到哈拉哈以南之关家店、老郭家一带，向南向北布置阵地顽强抗击，阻敌增援并切断敌退路。

二师立即出发，占领瓦盆窑（哈拉哈南十里）及其附近地区，切敌退路。

一纵全部即移至哈拉哈东南之永立庄一带、水泉眼、窠家窝棚地区。

六纵全部及炮兵即〔移〕哈拉哈以东之前后二十家子、朝阳地区。

独二师逼近德惠，向敌佯攻，箝制、吸引敌人。

独三师仅留一部在土门岭附近破击，其余到达九台以西向敌佯攻。

一纵二十五日二十一时报：九团由黄带领去九台。

十六时三师报：火石岭子敌向九台撤退，同时该敌深夜撤退长春。

独二师报：下午四时土门岭战斗中我已占领河湾子铁桥，碉堡已炸毁。

松江部队二十五日二十时报：准备明天拂晓炮击桥头堡。

二月二十六日

敌情：九台、哈拉哈、农安之敌先后退回长春。

决心：防止德惠敌突围并坚决围歼之，准备打长春援兵。

布置：

〔总部〕二十六日十三时电六纵：全部、十二个炮团即出发，进至德惠附近，围歼该敌。具体时间和部署自定。我其他各部在原地准备打援。

〔总部〕二十六日十六时电二师、四师、六师、独一师：明天二十七日破击二十里内之铁路桥、碉堡，各部休息，准备打援。

二月二十七日

敌情：杜〔聿明〕令现驻桓仁之敌二十二师，待九十一师开桓仁后即开向营盘前进，估计必来长春向德惠增援。

决心：为了在战局上各个击破敌人，六纵必须迅速而严格地组织对德惠的坚决进攻，将德惠之敌歼灭，以便空出力量打北上之敌。

布置：1. 为加强对攻德惠敌之炮火，指定一、二纵队之炮兵及五、六师、独一师炮兵统于本日下午四时出发，由六纵指挥。

2. 独二师参加攻德惠之战，归六纵指挥。

3. 宜充分准备对德惠之攻击，应在三月一日拂晓或下午为宜。

行动：六纵二十七日六时报：二十七日四时全部到达德惠城外，准备明日下午总攻外围据点，各部所得情况，有敌五千余，工事巩固，城周围三、四里村庄皆筑有工事。

炮纵二十八日一时报：此次集炮兵计三十个团（山炮以上）九十门。

二月二十八日

敌情：无变化。

决心：坚决攻下德惠，准备打长春援兵。

布置：〔总部〕二十八日九时电六纵、炮纵：已令德惠以南之八个师，顽强抗击敌人以争取十天时间，掩护你们攻下德惠和准备会合你们与独二师歼灭北上之敌，总攻时间由你们自定。

〔总部〕电一纵、二纵及各师、独一独二师：德惠城内约有敌五千人，工事较多，需较长时间才能解决战斗。已令纵、师各部、独二师全部，集中山野炮九十门，坚决攻

下德惠。

长春之敌必北上增援，为掩护德惠之攻击和准备歼北上之敌，我一、二纵队应坚决给敌以严重打击、杀伤和局部歼灭，以打击其士气和消耗其力量，无论出动多少兵力，皆应顽强抗击，利用沿途村落进行顽抗，最后将敌引至布海附近而歼灭之。预计时间为十天，沿铁路及其以西由二纵负责担任抗击；铁路以东一纵担任抗击。独一师作预备队，独三师暂在九台担任破铁桥与山洞，尔后直接参加大战。各部皆应大胆打，切勿顾虑多端。

行动：六纵二十八日八时报：经昨晚与今拂晓，已占领薛家屯东龙凤山、高家屯、黑坎子，现外围仅有望问堡、多富堡正攻取中。如外围据点扫清后不疲劳，则今午后总攻击，否则延至明日十六时总攻。

攻城四路突击，各师一路，独二师〔担〕任攻西北角，在十六、十八师之间，昨晚已令温〔玉成〕张〔池明〕部负责。

〔六纵〕二十八日十六时又报：我们主攻在西南、西北二方向，把尖刀杀入每一方面，有炮兵一个团此刻正猛烈炮击步兵。

二纵报：根据二十八日林〔彪〕令，拟以四师担任节节抗击任务，协同一纵打击前援之敌。以一个团的兵力在布海以西，哈拉海以西北之东刘家街、郭家沟、侯家窝棚、魏家窝棚、五家沟一线，主力则运于上述地址之西北地区。

一纵报：二十八日九时调整部署完毕，纵直在元家油房，与各师均已架通电话。

三月一日

敌情：敌七十八师以十二团之兵力向德惠分三路增援，德惠巷战激烈，尚未攻下。

决心：我军决使敌扑空，然后伺隙回击，各部即摆脱敌人向松花江北岸转移

行动：六纵一日一时报：经一天激战，从西北角已突入城内，两个团夺下四个碉堡，现正向纵深发展。

地堡多、敌顽强，我每进一步必须猛烈争夺，进展很慢。已突入城内的部队有独一师一个团，十六师两个营，其它均逼近城下。

城外，只有南门外小邢家窝棚未占领，其余村屯均被我占领。我没有强烈的炮火，要歼灭该敌困难。

一纵一日十三时报：一日拂晓前，西面独二师、十八师、十六师攻入的七个营，已到五道街附近，今晨，战斗甚激烈。敌集中炮火向我处房屋轰击并冲锋，房屋大部起火。四十九团已占车站以北之旧楼。

一纵一日十九时报：我昨晚攻入城内之部队，因所占区内草房多、碉堡多，开展困难（我占领区不大）。今晨敌集中一切炮火向我占领区猛烈炮击，房屋燃烧。我实行反击战，激战到下午二时，部队退出城外。敌六〇炮多，炮队转移容易，我重炮炮弹不足，压制敌方困难。

三月二日

敌情：敌调集到郑家屯、八面城一带之八十八师，通化及其以北之八十七师，于二十七日集结长春，二十八日

会同新一军退集到长春的三十师两个团、五十师之一四八团向北出动，一日进至万宝山、米砂子、太平桥之线，现正继续推进中。新二十二师已于二十七日集结营盘向北增援。

一师二日一时报：三师九团于二十六日进驻九台后，即破坏了十八孔饮马铁桥。

独三师二日十五时报：由白旗来人谈，江冰上确已有水，但可经无水处绕过。

三月四日

〔总部〕三日二十四时电：我军正准备趁敌在运动中展开反击，各纵如发现敌一个师或以下兵力时，则以一个师箝制敌两个团，而集中六、七个团歼灭敌一个团；在打敌一个团时，可以一、两个团箝制敌两个营，而首先集中兵力歼敌一个营，并在该营阵地上选择弱点打击之，如此打法，必然胜利。

三月五日

德惠敌四日下午占大房身。五日晨，先头部队约一个营附骑兵二师四团三百余人，已到花家窝棚、夏家窝棚、三家子。另，该城北之敌配合刘家屯、万金塔之敌四日占领靠山屯。并传，有一部向城子街开去。

新二十二师仍在东丰、梅河口。

一纵五日二十三时电〔一、二、三师〕：〔为〕便于休整与乘机反击，更换布置如下：一师移秀水甸子至大于屯之线；二师秀水甸子（不含）以东至赵家屯、曹家屯；三师移

闵家屯、杨木屯附近。

二纵五日二十一时十五分报：四师于五家站以北之沈阳窝棚堡；五师于小弓棚子；六师（少一个团）于大三家子；六师（缺一个团）和四个骑兵连仍在江南农安以北地区活动。

〔总部〕电：六纵、独一师、二师，原地休整待命。

三月六日

敌情：敌八十七师两个团，本日到青山口，八十八师到靠山屯。

决心：我军决心灭敌于青山口，箝制靠山屯之敌。

部署：〔总部〕电：本晚各部均应移动，明日八时以前到下列位置隐蔽：五师五家站西北之万发屯；二纵加强二师五家屯以东之杨家窝棚；十六师陶赖昭西北之杨家窝棚；四师、六师不动；一纵兴隆堡、高家窝棚。

以上各部须在明日下午出发，于十六时到达青山口并开始攻击。各攻击部队均归二纵统一指挥。

三月七日

敌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的具体位置不明。

林〔彪〕刘〔亚楼〕七日十九时电：

十八师与独一师有顽强箝制八十八师的任务，应于本晚二十三时出发。十八师应进至靠山屯以北之陈家烧锅、靠山屯、后岭一带；独一师向靠山屯前进，如有敌则箝制之。

陶赖昭的工事，由独一师的两个连守备之。

二纵加十六、十七师，明日十六时以后开始攻击五家站之敌。

三师于本晚出发，明日八时前占领岔路口，并准备明十六时后向大房身西北二十里的十二马架、朝阳一带前进，箝制德惠之敌。

独立三师移其塔木附近之红旗屯牵制敌人。

六师移至五家站。

三月八日

敌情：靠山屯敌八十八师、八十七师自七日黄昏过江后，采取逐渐紧缩的方式，于今拂晓时偷偷撤回江西青山口一带，下午又撤至靠山屯。

决心：八十八师与八十七师靠拢。我军拟监视靠山屯之敌，移主力于陶赖昭方向，准备歼灭五棵树一南之敌。

部署：林〔彪〕、刘〔亚楼〕八日二十四时电：独二师陶赖昭，六师大家子，四师大三家子东南之曹家堡，一纵五家站东南之新官地，十七师陶赖昭以东之小孤榆树，六纵之十八师、十六师，独一师本晚原地休息整备，明日待命东进歼灭陶赖昭以南之敌。

行动：

二纵八日九时报：已令五师迅速进到江南靠山屯西北之八黑营子、三台子线，向大榆树、靠山屯推进，以配合十八师、独一师截断敌退路，压缩敌人于靠山屯以北，青山口以南之地区围歼之。

〔二纵〕八日十三时又报：五家站南江湾（江南岸）山

头仍有敌一个营兵力，青山口炮声甚烈。

一纵八日一时二十分报：三师于昨日追击大于屯之敌正南窜。现由八团向团林子以东对战中，七团由苟家坨子向南包围，九团由朝阳屯、米姐沟子向北包围，争取歼灭该敌。

一师八日二十一时报：现进到岔路口、腰坨子、莲花泡，准备今晚二十四时开始攻击。纵直已达岔路口，三师与我并肩作战，二师除一个团在秀水甸子外，主力向岔路口运动中。

六纵八日十九时报：我十六师已向靠山屯以南挺进，截敌之退路。十八师向靠山屯堵击陈家烧锅之敌，该师现已到卧虎屯。亦令十七师靠近十八师，我已靠独一师，共同包围靠山屯之敌。

独一师八日一团先头之三营，将拉马营子降队四百人赶走，随即打入靠山屯一角，后因腹背受敌攻击又撤出来。现一团在拉马营子、排木，正与靠山屯之敌对峙中。其他团已先后到达战地。

独二师四团于十七时进占五家站南之钱家粉房，我主力奉命原地待命。

独三师两个团七日夜晚进到白旗屯附近。我侦察部队在大荒地与新三十八师（两个团）的后尾接触。

三月九日

敌情：顷获密息：敌新三十八师主力（两个团）在大房身一带。

决心：靠山屯之敌，已集中约四个团，我不好打，需

改变部署，决以一部箝制靠山屯之敌，集中主力歼灭大房身之敌。

行动：一纵九日八时报：三师昨将岔路口一一四团一个排之敌全部歼灭。现一师向二道咀子前进，三师主力在贾家窝棚搜索敌人，二师主力在岔路口正准备继续西进。敌在我东西压迫下，似以德惠为中心缩去。

一纵九日二十四时报：可于明日黄昏前赶到大房身、高召子和马家屯。

四师于十二时到达指定地点曹家窝棚。

五师于八时到达朝阳川、王魁店。多方证实，敌八十七师由靠山屯分两路向农安撤去。昨日尚在高家店、万金塔。

五师九日十一时报：靠山屯方向炮声甚烈。有敌一部向我阵地西南活动，正与我前哨接触中。

五师九日十九时又报：靠山屯及其附近之敌，开始南撤，我师即行出击。

三月十日

十七时一纵报：达家沟、四马架、五树沟均有敌人。五师曾报，德惠敌分两路向我靠山屯增援，正与我交战中。

二十二时一师报：大房身只有敌八十八团。鸡旦沟以北山岭均有敌人，并有地堡。

二十二时二师报：大房身敌八十八团、新三十师和三十八师一个团十日十五时向德惠逃窜。

我一师九时到达下李家桥、桓兴隆(东外)、新主屯。

一、二两团十七时先后到达高台子、北岭鸡旦沟。进占高台子时，俘敌四十余人，缴六〇大炮两门。

五师于一时占领靠山屯之北平安堡，俘敌营长以下二百余人。靠山屯尚有未进去的五连被我包围，拟歼灭之。

十八时，德惠增援之敌约一个团已被我击溃。

二十四时，已将靠山屯之敌全部歼灭，俘人枪千余。

十六师今十六时三十分到达五、六家子与朝阳堡之敌接触，将其击溃并击毁坦克三辆。

十八师至达家沟与敌遭遇，我已占领达家沟以南之高地，部队暂停六家子。

三月十一日 今日大雪

敌情：靠山屯敌五个连被围。八十九师由万金塔向大小苇子沟前进，企图增援靠山屯。

决心：二十四时决定对大房身、朝阳堡之敌，采取佯攻，转移二、六纵主力，歼灭八十七师。歼灭八十七师之战斗，由刘〔震〕吴〔法宪〕指挥。

部署：一纵二、三师在大房身以南佯攻该敌并监视之。

一师到达农安以北之好来宝营子配合二、六纵截断八十七师退路。

独一师经靠山屯以南之平安堡、马家城子，进至火神庙、财神庙一带担任迂迴敌的侧背。

独二师进至靠山屯以南之罗家堡子，向德惠派出远距离侦察警戒，保证六纵侧翼安全。

独三师移瓦房沟配合二、三师威胁德惠之敌。

六纵十六、十八师由洪^①扬〔国夫〕、刘〔其人〕率领、经前后腰子到达靠山屯西南之十里堡、平安堡一带，伺机歼敌。

行动：一纵一师于十三时到达李家船口、二青咀子休息，十五时半继续西进。从黄昏开始越过铁路、公路时，面遇北来的敌汽车十余辆，交战十分钟后敌退德惠。

二师二十时进到卧虎屯、郭家窝棚。四团黄昏在四家子遇敌，战俘十余人，敌退德惠。

二纵六师九时到拉拉屯，迂迴八十七师，现在八家子交战中。

六纵十六师于十三时轻装出发，十八师随跟进，不顾一切，截敌后路。

十三时西进的十六师四十八团已占领欢垚岭，右侧敌人向我猛攻，继进困难。

十八师随十六师之后西进时，与德惠北援之敌接触，现在交战中。

三月十二日

敌情：增援靠山屯之敌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已被我全部击溃。昨日黄昏，分两路逃窜。八十七师经万金塔沿公路向农安城退去。该师退经卧虎屯、郭家屯时，遭我截击，溃不成军的残敌退守农安。

决心：昨二十一时决定以一纵之二、三师改向兴隆山、

① 即我六纵队司令员洪学智

苏家店前进，协助六纵歼灭八十八师及八十七师。独三师通夜佯攻德惠。

部署：十四时三十分，令各部向郭家屯急进，围歼退却之敌，并乘机占领农安。

行动：一纵昨夜在行进中与敌交战四次。今七时在四道沟西部与敌之八十八师(全部)、八十七师师直、七十一军特务团、工兵营等相遇，战斗到十八时三十分，将敌人歼灭一部，俘二六三团正副团长以下千余人，残敌向农安城退去。我除留一个团打扫战场外，主力向农安东南之右间房、长安堡前进，截敌后路。

二师拂晓经王家车铺附近遇敌后即投入战斗，下午十五时才结束。计俘八十七、八十八师南窜残敌及保安队约千余人。其五团已向兴隆山，苏家店方向前进。

三师今午于凤家屯歼敌八十八师二六四团，俘敌营长以下五百余人。今晚向农安南龙安堡前进中。

独三师的主力已进到三青咀子一带，一部向德惠以东佯攻。

三月十三日

敌情：农安除八十七师残部窜回外，原有留守该城之二五九团全部。由长春开万宝山之敌，为二十二师二个团，有增援农安之任务。

决心：二十二时决以六纵、独一师加炮兵攻农安。十九时各部严密监视敌人动向，敌突围时则坚决追击歼灭之。

布置：令五师向农安前进，二纵进到农安以北之八里堡

地区。六纵向农安东南之华塘沟前进，担任攻城。炮兵归六纵指挥，独一、二师继佯攻德惠。一纵进至农安以南地区。

行动：一师向指定地点移动时，十三时于农安以南长安堡，截获由万宝山援助农安十七辆弹药车的先头三辆，其余南窜。独一、二师进逼德惠，攻占德惠城郊地堡十余处。

三月十四日

敌情：农安敌仍被围中。万宝山敌沿铁路、公路两路北进，在老口窝棚、苇子站以南与我接触。杜聿明令九十一师于十六日前集结营盘，车运长春。新二十二师已于十三日向桓仁、梅河口北调。

决心：令六纵、独一师加炮司围攻农安，其他各部准备打援。

布置：六纵、独一师、炮司担任攻城，由洪〔学智〕杨〔国夫〕刘〔其人〕指挥。一、二纵担任打援。一纵应集结农安东南十里外之诸村庄，向长春、九台派出侦察，二纵集结于农安东北十里外，向德惠派之侦察。

三月十五日

敌情：新二十二师已于十三日自海龙调农安以南。原拟调梅河口之五十四师亦已调农安东南苇塘沟一带。九十一师桓仁防务已交五十二军，估计二三日内可能北调。北援之敌一八〇团已进至我二团阵地，激战正进行中。农安一个营十九时向西及西南出击。

决心与布置：二十二时令开放农安西南一带之围，让

敌进出然后消灭之。集中力量先歼灭增援之敌。除三师箝制苇塘沟之敌和独一师监视农安之敌外，其余部队应歼新二十二师。攻击时间及作战布署由万〔毅〕、周〔保中〕、李〔作鹏〕统一规定指挥。

行动：一师已与万宝山北援之敌一个团接触，正备歼灭之。五师在农安西五里堡击溃敌一个营。十六师在前后边岗子与敌接触，正备歼灭中。

三月十六日

敌情：北援之敌，除新二十二师和五十四师两路向我前进外，新一军三个师已自布海向郭家屯前进。

决心：决〔定〕另寻作战机会，目前向江北转移，各部接电后立即出发。力求在开江〔解冻〕前，诱敌北进，造成有利时机再歼敌一部。各部应恢复体力，酝酿士气与研究战术。

布置与行动：为掩护部队北移，三师在德惠西南扰乱敌人后方，独一师在农安以东抗击农安出击之敌。独二师进郭家屯东北，大胆袭击敌侧背，尔后以运动防御与敌对峙一段时间。二纵对老边岗、华家街之敌进行局部攻击，力求歼敌一部，掩护一、六纵北移。下午四时后移农安西北娘娘庙，尔后向哈拉海以北转移。独三师对靠山屯，五师对哈拉海，三师对万金塔均应拆毁工事。

三月十七日

敌情：综合当前敌已集中或正在向北满集中的兵力、

计有新一军之全部六个师，在农安、德惠、布海间；新六军之二十二师，在农安附近；十三军之五十四师，在农安以东；九十三军之暂二十师、二十二师，位置不详；七十一军之三个师，八十八师已被歼大部，八十七师在农安，九十一师于上月进攻辑安被歼五个营以上。除热河调来之三个师及新六军之二十二师外，均于最近期间部分或大部分遭到我歼灭性打击。号称精锐之新二十二师刚进入战斗即被我第一师俘其百余。

决心：各部仍按指定地点集结休整，以便诱敌深入再歼其一部，各地工事继续拆毁。

行动：一纵二十四时到达大房身。二纵直及四、六师原地未动休息待命，五师到达哈拉海。六纵于二十三时前进至老关家、赵家屯、三盛永、财神庙地区。独一师在原地休息。独二师仍在棋盘街一带行动，监视东路之敌。独三师已将靠山屯工事拆毁。

三月十八日

敌情：今天上午敌北进先头一个团已过火石岭，并有后续部队。十一时敌经太平桥向万金塔进犯。大房身方向发现敌人，数目不明，正向我陈家堡子、周家堡子攻击。闵家屯一带也发现敌人，十二时占我吕家大壕、刘家屯之线，天台山亦发现敌人。

决心：为诱敌北进，令我军继续北移，以便反击敌人。

布置与行动：一纵移新站马家烧锅、万发屯一带，二纵以一天多行程移社里站一带，六纵移五家站以北诸村庄，

炮司移社里站以东之朝阳堡、太平川一带，独一师移社里站东南三十里蔡杞窝棚，独二师移五家站，独三师暂不移动。

三月十九日

敌情：敌新三十八师经九台车运反回吉林，五十四师停止北进，新二十二师昨到哈拉海以北的程家坨子，当晚撤回火石岭子。

决心与布置：诱敌北进尔后歼灭之，部队按昨晚令执行。

行动：一纵于午前到达下列位置，纵直到马家烧锅，一师到万发屯、杨家窝棚，二师到新站七家子，三师到杨家窝棚。二纵纵直到江北二家子，四师到王府屯，五师到江北雷家屯，六师到七家子西北之线。六纵纵直到五家站东北德发成杨家窝棚，十六师到沙河堡、潘家窝棚，十七师到十六户，十八师到榆树沟。炮司到太平川，独一师到孙家窝棚，独二师到五家站，朱家城子，独三师到大三家。

编后说明：从三月二十日至四月十四日，共二十五天，日记原本不全，缺第四次临江保卫战材料，特此说明。

《阵中日记》编辑组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二十辑

作者 =

页数 = 258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